中国农工民主党党史

第一章酝酿组党

第一节组党的缘起

一、国民右派阴谋反共

　 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统治，结束了中国二千余年的封建帝制，这是一个伟大的功绩。但是“革命尚未成功”，中国近百年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仍然没有改变；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依然没有完成；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屡遭挫折，前途暗淡。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国革命进入一个新的时期。孙中山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于1924年1月在广州召开了国共合作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重新解释“三民主义”为反帝反封建的三民主义，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

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组成，推动了以黄埔军校为基础的革命武装建立和工农群众运动的开展，壮大了革命声势，加速了革命步伐。这必然使敌人感到恐慌与仇恨。1925年孙中山逝世，国民党极右集团“西山会议派”乘机分裂国民党，破坏革命统一战线。1926年1月，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团结合作，挫败了国民党极右集团的猖狂进攻，维护了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革命继续向前发展。

国民党“二大”以后，蒋介石看到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群众革命力量的增长，心怀忌妒，日益加紧同国内外反动势力相勾结，于1926年3月阴谋制造“中山舰事件”，并处心积虑篡夺革命的领导权。

1926年底，北伐军占领武汉、南昌、福州等重要城市，乘胜向长江下游进军，蒋介石在南昌公然违背国民党中央“迁都武汉”的决定，擅自主张迁都南昌，图谋将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置于其总司令部的控制之下，并扣留到达南昌前往武汉的国民党中央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挑起“迁都之争”。对此，武汉方面采取坚决斗争的方针，由吴玉章、邓演达等五人组成中国国民党行动委员会，提出“实现民主，反对独裁，提高党权，扶助工农运动”的主张。

1927年3月10日，中国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在汉口开幕。会议由于共产党人毛泽东、董必武、吴玉章、林伯渠等和国民党左派宋庆龄、邓演达、彭泽民等的共同努力，使蒋介石受到抑制，削弱了他在党政军财各方面的控制力量。

二、“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1927年3月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闭幕以后，蒋介石凶残地发动和实施了一连串的反共暴行，同时使用挑拨拉拢手法，对武汉方面进行分化。

3月24日，北伐军占领南京，英帝国主义停在下关江面的炮舰疯狂地向南京猛烈轰击，对中国革命进行赤裸裸的武装干涉，蒋介石公开叛变革命。他在帝国主义、买办阶级和帮会流氓的合作下，于4月12日凌晨，发出大屠杀命令，在上海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和工人群众。接着，在国民党右派势力所及之处，如广州、南京、无锡、宁波、杭州、福州、厦门等城市实行“清党”，疯狂屠杀共产党人、革命群众和国民党左派，其手段之残酷，历史上绝无仅有。东南各省弥漫在腥风血雨之中。

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19日“国民政府”发布第一号命令，通缉鲍罗廷、陈独秀、毛泽东、吴玉章、邓演达等197名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迅速发展的北伐战争突然遭到挫折。

蒋介石的血腥政变，激起革命人民的无比愤慨。4月中旬，武汉国民党中央和武汉国民政府专门讨论惩治蒋介石的问题。决议开除蒋介石的国民党党籍，撤销其本兼各职，并下令通缉。毛泽东、董必武、恽代英、林伯渠、吴玉章、宋庆龄、邓演达、何香凝等联名发出通电，严厉声讨蒋介石的反革命罪行。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在南京成立了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 “国民政府”，同武汉的革命政府相对抗。于此，大革命运动遭到了局部的失败。

三、大革命失败

蒋介石公开叛变革命后，武汉遭到反革命势力的军事攻击和经济封锁，武汉政府的内部危机日渐暴露，国民党内的反动派和假左派都纷纷亮相，反革命气焰十分嚣张。5月17日，驻武汉西部的夏斗寅叛变，向武汉发动进攻；5月21日，许克祥在长沙发动“马日事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6月5日，蒋介石以“煽动暴乱”的罪名下令通缉邓演达、鲍罗廷等人。汪精卫也于同日解除鲍罗廷的“国民政府最高顾问”合同；6月6日，朱培德叛变，在江西驱逐共产党人和革命分子出境；6月10日，汪精卫在郑州召开会议，预谋反共；6月19日，蒋介石召开徐州会议，协议反共反苏；6月29日，何键发出反共“训令”，残酷捕杀共产党人；6月30日，蒋介石派兵溯江而上，声言“解决武汉”。此时，武汉上空黑云压城，国共分裂迫在眉睫。

国民党左派领导人邓演达本想极力维护武汉国共合作的局面，此时他见局势已无法控制，决定暂时摆脱一切。6月29日，他发表《辞职宣言》，陈述“中国革命之目的，在以三民主义为基础，而期完成农工政策。不意同志中有故意对此曲解者；有无视此旨而对农工阶级加以压迫者；……有向蒋图谋妥协并与共产党分离，而残杀农工者。……而欲使国民党终于化为反革命集团。”6月30日，邓演达又给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留下一封信，于当晚化装成工人，怀着沉痛的心情，从汉口经陕、甘、内蒙的大戈壁，于8月15日到达莫斯科。他在《告别中国国民党的同志们》信中强烈指责蒋介石、汪精卫集团曲解孙中山的革命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屠杀工农群众和忠实党员的罪行。他说，这样下去，必然招致反革命的结果。

7月14日晚，武汉国民党中央由汪精卫主持举行“分共会议”，宣布同共产党分裂。宋庆龄拒绝出席会议，并发表正气凛然的《为抗议违反孙中山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谴责武汉国民党右派违背孙中山的意思和理想，驳斥了汪精卫反对三大政策所作的诡辩，表示同国民党右派彻底决裂。7月17日，宋庆龄离开汉口回到上海，于8月下旬同陈友仁等一道在吴淞口登上一艘苏联货船，9月6日抵达莫斯科。

7月15日以后，汪精卫继蒋介石之后凶狠地举起屠刀，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大肆捕杀。至此，从1924年起国共合作所形成的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遂告失败。

第二节 酝酿组党的经过

一、暴雨欲来之时的组党之议

1927年蒋介石“四一二”叛变后，武汉形势十分险恶。邓演达针对“马日事变”的反革命风暴，发表了著名的《我们现在又应该注意什么呢？》一文。文章阐述了三民主主义的革命及其与革命群众、铁别是与农民问题的关系，尖锐地提出了“中国国民党的生死问题，革命的生死问题”，号召“中国国民党的信徒，革命的党徒，要紧紧拿着真正的青天白日的旗子，革命的旗子”。

5月间，宋庆龄同邓演达、陈友仁、彭泽民、徐谦、陈其瑗等交换意见，相约“集合同志，为继承孙中山的遗教而奋斗到底”。邓演达同谭平山就组党问题多次交谈，都主张建立一个新的组织，继续领导国民革命，但他们的用意各不相同。邓演达是要集合革命的力量，统一革命的领导，确立执行党的政策所必须的权力。因而打算将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联合起来，沿用国民党的名称，纳入共产党的纲领。提出“解散共产党，改组国民党”。谭平山由于对陈独秀和第三国际都不满意，对国共分裂的危险深感忧虑，因而打算合并国共两党，建立一个适合中国国情而不受第三国际控制的新党。所以提出解散国共两党，成立一个“广义的无产阶级（平民）”政党。

邓演达等的组党活动正在进行，大革命失败的厄运已无法挽回，邓演达不得不离开汉口，为复兴中国革命而去苏联。大革命失败后，坚持革命的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在反动派的刀光剑影下陆续离开武汉，向九江、南昌汇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挽救中国革命发动了“八一”南昌起义，打响了以革命武装反抗反革命武装的第一枪。 8月1日，起义部队以国民党中央委员名义，发表了有宋庆龄、邓演达、谭平山、彭泽民、毛泽东、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等22人联名的《中央委员宣言》，痛斥蒋介石、汪精卫反革命集团，已成为军阀的工具，曲解三民主义，毁弃三大政策，为总理之罪人，国民革命之罪人”。

二、《莫斯科宣言》的发表及其影响

“八一”南昌起义失败后，已先后到达莫斯科的邓演达、宋庆龄、陈友仁虽然身在异国，却仍就复兴中国革命的问题进行讨论。他们认为，中国革命不能中断，在目前情况下，有成立作为临时性的革命领导机构之必要。这个组织应当是一个独立的、中国式的、贯彻孙中山三大政策的革命团体。它愿意同第三国际合作，同中国共产党携手。为此，邓演达一方面函促在上海的谭平山等人，要他们在国内尽量团结国民党左派和一切革命分子；一方面给在香港的彭泽民、何香凝等人写信征求共同发起建立革命组织的意见。

1927年11月1日，宋庆龄、邓演达、陈友仁在莫斯科以“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的名义发表了由邓演达起草的《对中国及世界革命民众宣言》（莫斯科宣言）。指出：三民主义的真正意义，就是反对帝国主义到底，推翻封建特权阶级和一切少数宰割多数的反动势力，推翻少数剥削多数的经济制度。这就是孙中山先生根据中国环境所拟定的革命大纲，也就是他的党徒行动奋斗的准绳和大多数民众的希望。《宣言》说：“现在已证明本党的上层领导，已完全违背且背叛本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付托，革命民众的希望。他们——无论为南京为武汉，皆窃取中国国民党之旗号，曲解及假托革命的三民主义之内容．其实已为旧势力之化身，军阀之工具，民众之仇敌。”《宣言》指出：“中国受压迫弱削的革命民众为：工人、农民、手工业者，小商人及青年学生。其对抗的仇敌为：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地主豪绅及其与他们相结合之高利贷资本家。”《宣言》说：中国革命之结果，其政权主要地掌握在工农为中心的平民群众手上；其经济建设，必超越资本主义之毒害，向社会主义前进。”“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即本此使命，在其伟大领袖中山先生精神领导下，去领导被压迫剥削的革命民众，向一切反动仇敌进攻，得到最后的胜利，把三民主义的革命完全实现。”

《莫斯科宣言》的发表，给国内许多政治上彷徨苦闷，生活上贫困拮据的爱国者以极大的鼓舞。当时汇集在上海的国民党左派和一部分因故脱离共产党组织的人士以及一部分爱国知识分子，如谭平山、章伯钧、张曙时、郑太朴、邓初民、朱蕴山等。他们在《莫斯科宣言》的影响下，积极发起组建新党。

三、邓演达在国外的活动

邓演达到苏联后，对社会主义苏联的情况作了一些调查考察，同苏联领导人斯大林、布哈林等和第三国际的拉狄克等都有接触，并多次就中国革命问题交换意见。其时，斯大林已经提出了“中国革命的三阶段论”。斯大林认为，中国革命从“八一”南昌起义开始，即进入第三阶段，是无产阶级、农民两个阶级联合的苏维埃革命阶段。斯大林的“三段论”，其要害即在把民族资产阶级甚至于小资产阶级排斥于革命联合阵营之外。所以，苏联方面对邓演达所强调的“中国革命有民族革命的特殊性和解决农民问题的必要性，仍须恢复国共合作的国民革命”的主张报以冷峭的批评。邓演达深感中国革命在苏联已得不到同情和支持，遂于12月匆匆离开苏联前往德国。

邓演达到德国住在柏林，1928年首先是总结了中国革命特别是大革命失败的教训，同时考虑重建新党以及党的纲领等问题，在艰苦的生活条件下做了大量工作。 1929年1月起，他意识到建党的基本要素之一，必须具备一个中心的思想体系，便开始闭门读书，做有关经济、政治、哲学、历史等方面的理论研究，攻读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各家名著，如世界史、经济学和经济史、政治学和政治史、哲学、社会学等许多书籍，还用通信方式同国内外的朋友和专家学者交换学习心得，研究革命问题，探索中国革命的道理。 1929年8月，以石生登化名，先后到英国、法国、意大利、挪威、保加利亚、土耳其、伊拉克、印度等各种不同类型（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殖民地）的欧亚国家，考察这些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情况，以及他们国家的工人、农民、市民等的生产和生活状况，记下了大量的笔记，获得了丰富的知识。其目的，就是要从中得到“关于中国问题的解释”。

邓演达是一位思想敏锐、精力充沛、务实力行的民主革命战士，他说：“我只承认相对的真理。因为一切规律无不受时间及空间的约束和限制。”他离国将近三年，日夜为中国民族的解放艰苦斗争，锲而不舍。通过读书和考察，形成了他的一套民主革命的思想体系，那就是：1．中国社会结构的分析。这是他解决中国问题的依据。 2．中国革命的方针策略。这是他解决中国问题的手段。 3．中国革命的发展前程——社会主义。这是他解决中国问题的归宿。

第三节 以中华革命党名义顶风而出

一、中华革命党的出现

1927年冬至1928年春，从武汉出走或参加“八一”南昌起义下来的许多国民党左派、脱离共产党组织的人士，以及爱国知识分子谭平山、章伯钧、张曙时、朱蕴山、李世璋、郑太朴、马哲民、邓初民、肖炳章、鲍惠生、江董琴、陈启修等陆续来到上海，他们反对国民党反动派背叛革命，实行屠杀政策，也不赞同共产党的“左倾”关门主义的做法。但在《莫斯科宣言》的影响下，都有组织起来的迫切愿望。尤其是谭平山和章伯钧，为此积极奔走，多方联络，几乎每个周六都邀集同志在英租界的同孚路谭平山寓所，或在法租界的萨坡赛路黎锦辉住宅秘密集会，商议组建新党的问题。当时对《莫斯科宣言》的原则精神，大家都表示赞成，惟涉及党的名称意见则不一致。 1928年初，联系的人数逐渐增多，谭平山等认为“只是这样下去不行，需要正式成立一个新党”。于是出现了对新党名称的争议。章伯钧主张叫“中国农工党”，朱蕴山提出叫“中国工农民众革命委员会”，张曙时建议沿用（莫斯科宣言》用过的“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谭平山提出：我们应仿效孙中山在民国二年“毁党造党，恢复革命”的做法，成立“中华革命党”。其时多数人觉得，国民党的名称已经很臭，标榜“工农”又没有工农群众的基础，但又想不出恰当的名称，所以对谭平山提出的“中华革命党”，既无人表示反对，也无人表示赞同。于是“中华革命党”这个名称，就被谭平山认为是大家默认了。随后，谭平山又草拟了《中华革命党党纲》和《中华革命党政纲》，并以“中华革命党”名义，在上海进行组织活动和政治活动。外界不明底细，把它看成是“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右派的混合体”，称之为“第三党”。

中华革命党是一个未经正式成立的松散政治组织，他与1930年由邓演达主持正式成立的“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的关系，恰似一个“胎儿”。

二、中华革命党的《党纲》和《政纲》

1928年初，谭平山为中华革命党提出了《党纲》和《政纲》（草案）。谭平山透露，目前，暂时还是用武汉政府时期的政治纲领，把脱离共产党的同志和与邓演达有关系的人士都重新组织起来，团结在中华革命党内，作为过渡。

《中华国民党党纲》共分七章。首先提出“党的使命”，就是“团结孙中山的真实信徒，去接受三民主义的斗争使命向前奋斗。”接着说明了中国革命和世界的关系，认为中国问题，已成为世界政治问题中的重要部分，现因中国人民的努力奋斗，在世界舞台上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影响。《纲领》分析中国的现状，说中国目前是一个农业手工业社会，它的政治是反动的封建势力与帝国主义的联合统治，中国民众痛苦的原因，是帝国主义经济的文化的侵略和束缚，是本国封建势力及宗法势力压破和剥削的结果。所以中国革命的性质，目前对外需要一个民族革命，对内需要一个平民的社会革命。中国目前不是单纯的民族革命，不是哪一个阶级的革命，而应当是一个民族的社会革命。革命胜利之后，即建立平民政权，就是建设政治上的新的平民政治与经济上的超资本主义。《纲领》宣称：“本党是一个代表平民利益的政党，反对一切与平民利益相反的政党”。视中国国民党现时的统治者为仇敌，反对“改组派”的主张及其鬼鬼祟祟的行动，批评共产党以主观意识去盲动。

谭平山根据《党纲》的精神，同时提出《中华革命党政纲》。《政纲》确定对外政策的总原则是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凡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尤其是被压迫民族，皆与之结成亲密关系并互相援助；在政治上反对官僚主义，主张在经济平等的原则下上，构成真正能代表生产部门的人民利益而促进民族全体利益的政治制度；在经济上主要是建设超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同时极力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在文化和社会方面，也都提出了具体的政策和措施。《政纲》分对外政策、政治制度、经济政策、文化政策和社会政策五个方面共152项。

《党纲》和《政纲》（草案）由谭平山草拟提出后，在有限的范围内进行讨论，有些人提出异议，讨论没有结果。是年夏季，适郑太朴随太虚法师去德国，谭平山托郑将《中华革命党党纲》带交邓演达征求意见。

三、邓演达和谭平山

1927年，谭平山参加“八一”南昌起义失败后，随军南撤到广东潮汕，经香港于11月到达上海。其时，谭已被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以“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开除党籍，也被隔断了同中共的一切联系。谭平山在上海，与在柏林的邓演达常通讯联系，交换有关复兴中国革命的意见。邓也总是满腔热情地从政治上乃至有限的经济上支持谭平山。

1928年，邓演达看到谭平山草拟的《中华革命党党纲》之后，告诉郑太仆，总的印象是认为“行不通”，并认为“中华革命党”这个名称也还需要考虑。邓演达说，目前第一大事，确实是要决定一个纲领他要郑太仆回国后，将他的意见转告谭平山。于是，邓演达自己拟出了一个建党的《纲领》和《宣言》，于11月6日复印，12月18日分别寄给邱萼华、彭泽民和季方，请他们转给谭平山，并嘱咐最好由谭平山负责征集各人的意见汇总告诉他，“好做以后的商量”。

邓演达对谭平山在国内的活动是大力支持的。邓演达考虑到谭平山的艰难处境，多次致函郭冠杰、季方、邱萼华、丘学训等人，说：“谭平山的意见和我不是原则上的不同而是策略上的分别。这是大家应该明白的，盼望不要错认了这一点，并且要帮助他，谅解他，听从他解决一切目前的问题。”“我与谭平山原则上永远不会分离，但在目前的工作进行上，我的意思是应该重视在文化工作上下功夫。此外，是难在最近的将来获得效果。”邓演达还多次催促季方等在国内的同志把书店、印刷所办起来。邓的用意是要在革命爆发之前大造革命舆论。

从1928年开始，谭平山等在国内以“中华革命党”的名义进行组织活动和政治活动。邓演达在热情支持的同时还十分关心建党的问题。他认为建党的事问题十分重大。目前最重要的问题，是可靠同志之集结和团结以及对他们的生活安排问题。邓演达认为：。团体的基本要素现时还未具备：第一是中心的思想体系；第二是构成在那个系统上的干部。两者具备之后，才能着手建党。我近日的一切用功，都是在‘中心思想体系上用力’。”

第四节 中华革命党的作为

一、中华革命党的组织状况

中华革命党始终没有正式成立，1928年起一直是处于萌芽状态，组织松散，行动秘密，内部事务多由谭平山、章伯钧、张曙时、朱蕴山、李世璋、郑太朴、丘学训、邓初民、马哲民等碰头商谈。他们中也曾推举谭平山、章伯钧、张曙时等组成以谭平山为首的中央主席团，但并未起到核心作用。中央联络机关在上海福煦路国民里14号。中华革命党的工作计划提出：建立中国革命的理论以指导革命行动；在各省市建立据点，恢复当地原有国民党左派组织；向文化教育界突破发展组织，推动救师和学生开展反蒋斗争；利用军阀混战，策动反蒋部队的反蒋运动。

大革命失败后，在各地潜伏下来的一部分反蒋人士、爱国知识分子、北伐军总政治部的政工人员受到《莫斯科宣言》的鼓舞，从1928年春季开始，中华革命党陆续在一些省市建立了组织活动和政治活动的据点。上海有邓初民、马哲民等，北京有周惠生、周新民等，江苏有张曙时、王仙舟等，四川有黄子谷、吕一峰等，山东有何世琨、张含清等，江西有李小青、胡兰畦等，福建有余遇时、裘朝慎等，安徽有王仲新、杨克礼等，天津有连瑞琦、刘清扬等，他们所领导的中华革命党活动，主要是在大学、中学开展青年教师和学生运动，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国民党反动派和改组派的斗争。他们在上海的暨南、大夏、远东、光华、同济、劳动、大陆、东亚、群治等大学，北京的师大、中国、清华、燕京等大学，四川的泯江大学，山东的泰安三中、江西的党务学校、南昌中学等，都发展了一批教师和学生，建立了基层的核心组织，造成了一定的声势。北京等地主要是贴标语，撒传单，反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山东、江西、四川等地都组织学生发动学潮，同国民党反动当局进行面对面的斗争。

中华革命党除重视学生运动，还深入农村、工厂，进行工衣群众运动，也着手军事运动．准备建立革命武装。在上海吸收了黄雍、余洒度等一批黄埔生加入组织；在北京打入商震的保安团教导队建立“军人小组”。在山西打入阎锡山的司令部建立了“太原小组”；在四川龙溪开展农民运动，准备发动农民起义；在天津联络华北驻军的军长高桂滋和旅长郑思成，策动他们参加反蒋；张作霖在皇姑屯被炸死后，曾利用杨宇霆、常荫槐与张学良的矛盾，派连瑞琦到奉天联络杨字霆和常荫槐，商谈联合反蒋的问题。但这些都是只有活动，未见成效。

二、中华革命党的宣传工作

谭平山提出组建中华革命党，首先以“科学的三民主义”进行宣传。“科学的三民主义”，就是要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来解释三民主义。其基本内容是唤起工农平民群众，进行民族的社会革命，经过非资本主义到达社会主义。这种宣传“科学的三民主义”小册子，在知识分子中秘密流传，产生过一定的影响。

1928年夏季，中华革命党在上海一些大学进行青年学生运动，取得了初步成效，也受到外界的猛烈攻击。在国民党新旧军阀的报刊上，在《贡献》、《战线》、《布尔什维克》、《再造》、《革命评论》等所登出的一些文章中，几乎都集中对中华革命党的立场和主张方面进行尖锐的攻击。指责它是“既非国民党又非共产党的中间党”，谩骂、诬蔑，必欲把它“掐死在摇篮里”而后已。甚至在第三国际执委会的《决议》中，也攻击第三党是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将会变成反动派的工具。中华革命党为了回笞外界的攻击和加强青运工作，于5月26日创刊《突击》。6月1日创刊《灯塔》两个周刊，意在对“围攻者”进行“突击”，对广大青年澄清是非，照明方向，以团结争取广大青年。这两个周刊在国内秘密发行，收到了较好的效果。地方的刊物，上海有《星》、《现代青年》。北京有《絮茜》、四川有《庸报》，江西有《平民日报》o这些刊物在当地宣传主张，揭露敌人，团结群众，发展组织都发挥了较好的作用。

6月间，谭平山认为“公开发表我们的政见的时候到了”，提出了《中华革命党宣言》（草案），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他的政治主张o《宣言》说，中国革命的特质是反帝革命、土地革命和超资本主义革命。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新旧军阀和封建资产阶级联合的反动统治阶级。革命阶级是广大的平民阶级，是由产业工人、手工业工人、雇农、佃农、店员、小贩所形成的一个伟大的革命阶级（广义的无产阶级）。中华革命党就是这个劳动平民阶级的政党。中华革命党的主义，就是站在劳动平民阶级的立场上，以实现民族平等、政治平等和经济平等的主义，也可说是劳动平民阶级的三民主义。它的民族主义是要劳动平民阶级夺取政权，达到民族解放和民族平等；民权主义是建立劳动平民专政及与小资产阶级的敢治同盟；民生主义是要废除私有财产，也就是社会主义。

《宣言》重申了《中华革命党政纲》中的外交政策，说明与中国共产党、欧洲的劳动党以及民族主义政党的不同。

谭平山的《宣言》（草案）是为阐明中华革命党的政治主张，消除外界纷纷扬扬的误解。由于内部意见不能统一，没有公开发表。

1929年3月，中华革命党为反对军阀之间的“蒋桂战争”，发表了《对时局宣言》。提出“中国的革命势力有急速集中以促进中国革命运动复兴之必要”，“希望建立革命同盟，推翻反动统治阶级，完成中国革命现阶段之使命”。

三、中华革命党的的尾声

1929年下半年，中华革命党的境况已渐趋复杂而混乱，步履维艰。内部的主要骨干之间对谭平山的主张和做法感到不满，领导层内部不团结，马哲民、邓初民、张曙时等陆续离开了组织；活动经费没有来源，谭平山很少有筹措的办法；军事活动打不开局面，各方面的压力越来越大，谭平山束手无策。反动当局的压迫日益严重，有些地方组织遭到破坏。从1928年下半年起，安徽的反动势力十分猖獗，组织的负责人何世琨被迫离开了安徽，组织活动受到打击；山东组织因发动了声势浩大的爱国学生运动，遭到反动当局的野蛮镇压，郑灿文等4名负责人被捕，薛毓奎等10名学生骨干被开除学籍，组织处于瘫痪状态；四川组织因组织龙溪农民武装起义，遭到邓锡侯的残酷镇压，起义领导人和骨干分子文光甫、王建凡等以及岷江大学的二十多名学生被捕，私立岷江大学和《南报》被查封，组织负责人黄子谷、吕一峰被迫逃离成都，四川组织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在上述情况下，谭平山已无法应付这支离破碎的局面，章伯钧等也不同意谭平山再搞下去。章伯钧、朱蕴山、李世璋、郑太朴、肖秉章、王枕心6人多次举行密谈，商定劝谭平山离休，请邓演达回国主持党务。但谭平山拒绝离休，1930年5月，邓演达在章伯钧等的敦促下，从欧洲秘密回到上海。他同谭平山多次交谈，谭采取了合作态度，表示愿意作暂时休息离开了组织。

中华革命党从1927年冬到1930年春延续近两年半，虽然有名称、有纲领、有组织、有活动，但一直是非正式的、松散的、脆弱的，属于筹备阶段的政治团体。可是，它为1930年邓演达主持成立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打下了组织基础。

　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成立

第一节 临委会的成立及其纲领

一、邓演达回国建党

1930年1月，邓演达由伦敦启程回国。他当时考虑，中国革命虽然处于低潮。但革命潜力很大。因为广大劳动群众已经活不下去了，只要领导得好，并不难打开新革命局面。所以他回国取道南亚沿途参观考察，经巴尔于出土耳其而至印度，于5月初从加尔各答到达香港，与彭泽民、丘萼华见面，初步交换了组党的意见，旋即秘密回到上海。

邓演达到上海后，白天在寓所和同志们研究问题，起草纲领，夜间则外出联络旧友新朋，探讨如何开展反蒋斗争和组建新党的人事安排。他同大家接触，议论最多的是党的名称和党的指导思想问题，诸如“党的名称要不要同国民党‘绝缘’”，“党是以三民主义还是以马列主义为指导”等等。此外，也涉及到中国的社会结构、中国的革命性质、未来的政权性质以及土地、资本、外交等问题。邓演达认为，要领导好中国革命，必先解决理论上的一些问题，制定恰当的方针策略，最重要的是要解决中国革命的性质，应当走什么样的道路，国内问题和国际关系等一些带根本性的问题。在六七月间，邓演达每逢周六都邀集一些同志在拉斐德路翁洲饭店进行讨论，常参加讨论的有郑太朴、章伯钧、李世璋、朱蕴山、谢树英、季方、万灿、罗任一等，有时也邀请陈翰笙、杨杏佛等参加。对于有争论的问题，通过反复讨论，一般都能接受邓演达的阐释，最后达到共识。邓演达说，党的名称沿用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以下简称临委会），这是因为国民革命的任务尚未完成，我们要继承孙中山的旗帜，就要继承孙中山的组织，而且当务之急是反蒋，需要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国民党”这块旧招牌还是有一定作用的，对于以什么为指导的问题，邓演达说，我们对马列主义还不熟悉。对三民主义的解释，我以为愈少愈好，因为多了，则有冲突及附会的嫌疑与误会。通过邓演达的阐释，总的结论是：中国现阶段的社会结构是处于前资本主义时期，是在帝国主义、封建势力的压迫剥削下不断挣扎而日趋腐朽破碎的社会，这种社会就规定了现阶段的革命性质，是带有民族性的平民革命。革命胜利后必须是建立以农工为重心的平民政权，通过节制资本和实行耕者有其田去完成到达社会主义的任务。在国际上，苏联是依靠木上的，利用列强的矛盾将是引狼入室，只有联合世界上的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阶级才是最重要的。

政治纲领经过多次讨论，五易其稿，意见基本上得到统一。中央领导机构的人事问题，特别是领导核心的人选，也大体上得到认可。诸事初定后，便决定在上海召开党的成立大会。

二、第一次全国干部会议

1930年8月9日，邓演达在上海法租界萨坡赛路290号主持召开有10个省市代表参加的第一次全国干部会议。出席会议的有黄琪翔、章伯钧、郑太朴、朱蕴山、李世璋、季方、郭冠杰、丘哲、陈启修等三十余人。邓演达首先致开幕词说：“中国革命已经到了绝续关头，继往开来的重任落在我们肩上。在座各位都是在革命战线上奋斗过来的同志，更感责无旁贷，所以挺身而出，重上战场。今天是我们战斗的开始，是继续孙中山先生革命事业向前奋进、恢复中国革命整齐步伐的第一步。”会上全体起立，向孙中山先生遗像静默1分钟，接着全体宣读《我们的信条》：1．我们的哲学观点是历史唯物主义；2．我们的事业是继续孙中山革命；3．我们的任务是实现中国平民革命，解放全中国．向社会主义大道前进；4．为实现中国革命联合世界上被压迫民族共同奋斗； 5．我们是信仰一致，组织一致，行动一致的政治结合昀战斗团体；6．我们采取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会议一致通过了由邓演达起草的政治纲领——《我们的政治主张》，全体起立互行一鞠躬。会议最后选举中央领导机构，邓演达、黄琪翔、章伯钧、彭泽民、季方、丘哲、郭冠杰、郑太朴、朱蕴山、李世璋、丘学训、陈启修、江董琴、肖秉章、丘萼华、潘震亚、詹显哲、杨逸棠、谢树英、万灿、罗任一、王枕心、杨树松、李毓九、邹兰甫25人当选为干事，组成中央干部会。邓演达被推选为总干事。

会上确定了中央机关各工作部门的负责人选。按民主集中制原则，中央机关设立7个工作委员会．每个工作委员会设主席委员1人（有的设副职），委员5至7人。计有组织委员会：主席委员郑太朴；宣传委员会：主席委员章伯钧；设计（实为军事）委员会：主席委员黄琪翔，季方副之；民运委员会：主席委员李世璋；财务委员会：主席委员季方，罗任一副之；侨务委员会：主席委员彭泽民；训练委员会：主席委员邓演达（兼）。

“一干会议”的召开，标志着临委会正式成立。 8月10日临委会中央发布第一号《通告》，宣告“民同十六年七月以后，整个的中国国民党已尽为反动势力所占据。”“现时南京的政治已明的投降帝国主义。”“改组派的改组，实在只是更换主人，去组织联合的反动政权。”“我们革命的孙中山主义者，应该加紧团结起来，去继续进行革命。”“本会受各省市革命同志的付托，已于本年8月9日重新集会，决定临时中央干部，并决定行动纲领。以后凡属本党忠实同志，应即本此行动纲领坚决向前奋斗。”

临委会成立后，中央秘密机关暂设在上海爱麦虞限路159号。

三、临委会的《政治主张》

临委会的纲领在8月9日的成立大会上是以《我们的政治主张》为题通过的。在8月16日中央各部门联席会议土，决议改称《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政治主张》。共分六章。

第一章是“中国社会的结构”。指出中国社会的经济，主要还是农业、手工业阶段；政治组织是封建官僚主义，是变形的封建统治；整个社会还滞留在封建势力支配的阶段，中国社会还是前资本主义时代。同时又受着帝国主义的支配，这就是使中国社会不能向前发展的大障碍。

第二章是“中国社会的历史前程”。认为中国较远的将来是社会主义社会。现阶段应着眼于，一般的经济条件和各阶段的力量，还不具备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中国资产阶级的政治意识是暗昧的，人数众多的平民群众特别是工农群众十二分需要解放斗争。只有平民群众掌握了政权才能进行经济解放的工作，向无剥削的社会前进。

第三章是“我们斗争的目的”。认定中国革命是以同时的三种革命对象，即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地主及依附前两者为生的反动资本阶级为对象，是一个具有民族、民权、民生三种革命性质，而以社会主义为归宿的斗争。

第四章是“我们斗争的手段”。肯定要到达斗争的目的，必须唤起并组织广大的民众，使其觉悟地参加反帝斗争，并与世界被压迫民族和阶级联合起来，做斗争的同盟。平民群众要夺取政权，必定要用平民群众的本身组织形成坚强的力量，去推翮干余年来传统的官僚政治。要实现社会主义，一定要以直接生产的工农为中心的平民政权巩固以后，运用政权去发展生产，统制生产，使生产组织化和社会化。

第五章是“我们的具体方案”。规定建立平民政权，必须是以农工为重心的斗争同盟，必须是以有组织的职业团体的代表构成中央和地方的政权，使参加生产的民众和政权接连而不发生隔离，以彻底铲除官僚制度。反对欧美流行的地域选举代议制和三权分立，由职业团体代表组成全国最高权力机关的国民大会，工人、农民的代表占60%。一切权力属于国民大会，在国民大会之下设立执行机关。

在外交政策方面，认定“帝国主义是我们的敌人”，“苏联客观上可以做朋友”但如果要干涉中国革命，则不能不拒绝它”；“各国社会党在他们的纲领上应该可以做朋友，但在实际的对外政策上是反对我们的要求的，我们应当提防它”；“被压迫民族是我们真实的朋友，应该联合起来，共同达到民族解放的目的。所以，具体的外交政策是：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对苏联以双方完全平等不干涉中国革命为限，与之恢复邦交；与各弱小民族建立反帝联盟。”

经济政策，在现阶段是国家资本主义，这是过渡到社会主义期间的经济结构。主要内容是把一切大产业、关键性产业和独占性产业由国家专营，并奖励公营企业；允许经营中小规模的私人企业。在集中与干涉两个原则下，建设国家资本主义。对外的经济政策是消除帝国主义在华的经济统治势力，设置国家特许的租营制度，在一定年限内，以完全遵守中国法律及有利干财政和工人为限，允许外国投资在本国经营企业。对内的经济政策是，在消极方面彻底肃清封建残余等不合理的限制；积极方面是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实行金融机构国有，控制私人资本，统一税收和币政等。实行耕者有其田，以此作为土地国有的过渡办法；用合作社的办法和金融、税收政策调剂城乡间的均衡发展。

社会政策，是在平民政权建立之后，从积极方面用种种方策，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的基础；在消极方面，应该实行种种社会政策，以救济社会上现存的弊病，为改善工人、警察、士兵的生活，实行社会保险，缩小劳力劳心者的薪俸差别等。

文化政策，为了消除士大夫阶级，解放平民群众，必须流通白话，普及注音符号，简化文字并统一读音，扫除文盲；必须推行义务教育，普及政治教育，举办农业教育，改善教师待遇，确立会考制度，收回教会学校。教育事业只由国家监督，不由国家包办。

第六章是“我们和共产党及改组派的分界”。为免混淆视听，从一些基本特点上说明临委会同共产党及改组派的区别。

这个纲领，按邓演达的高度概括，就是“解放中国民族，建立平民政权，实现社会主义”。这是邓演达的民主革命思想的集中体现。临委会在民主革命时期，随着形势与任务的变化曾经几度易名，但都以这个绸领作为基本纲领。

第二节 临委会的组织状况和宣传活动

一、组织路线和地方组织的情况

临委会成立后，提出组织工作“当前的重要任务”是建立：一个集结革命力量的组织，形成新的革命垫力；建立一个行动的组织，随时随地能发动起来去斗争：建立，一个短小精干的组织，每个分子都有勇往直前的精神和牺牲的决心。所以“发展组织，必须坚持宁缺毋滥的原则”。要求“团结真正的革命残部，吸收新进的革命分子”，“从斗争中去健全组织，扩大组织。”规定“党的成员，要以工农分子为主体，必须时刻努力去尽量吸收工农参加组织。”具体工作主要是以行动为主旨确立组织的基础，即整理原有组织（原中华革命党的组织），重新甄别党员，以确实能工作为原则建立新的组织，成立若干基本小组，按“忠实、决心、认识、能力”四个条件吸收一批基本党员。训练一批党务工作人员。

临委会的中央机关一建立，即有严格的工作制度。每周一由邓演达亲自主持，举行工作部门的联席会议，由组织、宣传、民运、设计、侨务、财务、训练7个委员会负责人汇报上周的工作执行情况，提出本周的工作安排，然后进行讨论做出决议。

临委会在中央之下，设立大区组织，每个大区按地域辖若干省市组织，省之下有县市组织，基层组织为小组。地方组织每月须书面向中央报告工作。中央用《通告》、《指令》指导地方工作。必耍时向地方派出通讯员或特派员传达命令，指导工作，使中央和地方之间建立密切的联系。

临委会十分重视组织建设，尤其重视对干部的选拔和培养。为了训练干部，中央设立了训练委员会，举办干部训练班，邓演达亲自主持其事。训练班的主要训练内容是：纲领解释，组织、宣传、民运等各种工作方法，斗争策略等。

地方组织分为两类，一类是在中华革命党组织基础上经过整理的“行动委员会”，一类是新建立的“筹备委员会”。其分布如下：中央区以上海为中心，辖上海、南京、江苏、浙江、安徽三省两市组织。北方区以北平为中心，辖北平、天津、山东、山西、河北、绥远、察哈尔、西安、兰州5省4市组织。南方区以广州为中心，辖广东、福建、江西、湖南、湖北、四川6省和香港地区组织。党员人数到邓演达被害时止约二千人。

二、宣传的手段和导向

临委会成立后，把宣传工作置于非常重要的地位。邓演达认为：“中国工农业都很落后，必须唤起广大民众。而又应以知识分子为核心，要着重向知识分子阶层作积极宣传。”中央宣传委员会制定的《宣传大纲》，就是把宣传党的《政治主张》作为最主要的宣传内容。经常性的宣传资料是《政治通报》，每期都有对“国内形势”、“国际形势”的扼要分析和评论，其目的是使全体党员“深切的了解国内外政治经济的转变形态，以便对任何政治或经济现象作有系统的讨论”。

中央机关刊物是《革命行动》半月刊。1930年9月1日创刊，是一个“发表平民的呼声与斗争的意志”的大16开杂志，由邓演达主编，其宗旨是“唤起全国被压迫被剥削的平民群众，在我们的革命纲领下面团结起来，准备向仇敌斗争”。主要内容是“阐明临委会的《政治主张》，评述国内外的政治事件”。由秘密设在愚园路612号的大同印刷所印刷发行。这个刊物出版后，“异军突起”，很受欢迎，影响极大，发行量递增。但发行到第四期，即被国民党当局勾结上海租界的帝国主义者予以查禁。到第五期则改用“银行周报”为封面继续出版，结果仍被查禁。 1931年4月，为继续展开宣传，在上海雷华路由李世璋创办了中央机关报《行动周报》。这个报纸主要是刊登国内外要闻和政治评论，宣传反帝反蒋，产生较大的影响；发行的数量和范围不断扩大，由500份、1000份、5000份增到了50000份，连南京政府的“立法院”、“监察院”都送到了。

各个大区都创办了地方刊物。上海有《絮茜》，北平有《低潮》、《飞瀑》，广州出版了油印宣传品，曾利用香港的《东方日报》、《天天日报》进行宣传。各地宣传的内容，都与中央紧密配合，主要是阐明党的纲领，鼓动反帝反蒋。

三、对国内重大政治事件的态度

临委会组建的使命，首先是打倒帝国主义，肃清封建势力，推翻国民党官僚独裁统治。所以，对于反帝、反封建、反蒋的斗争，总是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毫不放松对敌人的揭露和抨击，并借以唤起民众，去向仇敌开战。

1930年蒋阎冯中原大成之后，7月至9月，汪精卫、阎锡山、冯玉祥等在北平召开“国民党中央扩大会议”，选出了以汪精卫为首的“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和以阎锡山为首的“国民政府”。临委会于9月15日对这次所谓的“北方扩大会议”和“北方政府”的闹剧发表《对时局宣言》，指出“北方政府”是反动叛徒与最腐朽的北洋余孽及官僚政客相勾结的军阀官僚统治，是企图与南京政府作屠杀人民掠夺人民的比赛，它和南京政府一样是人民的仇敌，是革命的仇敌，必须根本推翻它人民才有出路。同时，邓演达还发表了‘中国到哪里去?》一文，揭露“北方扩大会议”的一伙都是革命的对象，我们决不能因为它反蒋而轻视了宽恕了它的反动性。

1930年11月，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决定于1931年5月5日召开“国民会议”。图谋以欺骗的手法粉饰其反动的军事独裁统治。对待这一骗局，邓演达于1931年1月5日发表《南京钦定的国民会议和我们所要求的国民会议》一文，深刻揭穿了“国民会议”的欺骗性与反动性，号召人民起来反对，推翻南京反动统治，召开劳动人民群众的真正民主的国民会议。4月间，临委会发表《反对南京伪国民会议宣言》。号召人民起来反对、揭露南京制造的“国民会议”是十足的反革命御用机关。中国现实惟一的出路，是由广大工农平民大众一齐起来，推翻现时的军事专政及官僚政治，以人民自己的力量构成平民政权。这个《宣言》，经广大党员的努力，大量投入到南京的许多邮箱，向全国的许多机关、团体和个人寄发。同时还通过出席会议的王寄一等趁深夜潜入大会会场，把《宣言》散放在每张座椅上，这是一次巧妙的斗争，使反动当局又恼又惊。

“九一八”事变发生时，邓演达被捕已有一个月，临委会正处在被国民党当局残酷迫害的劫难之中。到11月22日，临委会以极大的悲愤制定了《对时局的宣传大纲》，谴责中国统治阶级“勇于内战而怯于外敌”。声讨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东北领土。号召中国人民要自己起来解放自己。《宣传大纲》提出了“反蒋抗日”的政治口号和十条“反蒋抗日”的行动纲领。北平、广东等省市组织及时响应中央的号召，组织党员分三四人为一组，深夜出动到大街小巷发传单，写标语，进行反蒋抗日的宣传。

第三节 临委会的民运工作和军事运动

一、民运工作的指导思想和工作情况

邓演达认为，中国革命，必须由平民群众自己起来解放自己。要推翻蒋介石的政权，就要得到平民群众的支持。所以，临委会成立伊始，就十分重视民众运动，积极开展工运、农运、青运、妇运和商运工作。批判了“民众运动实际上与革命大业无关”的思想和“革命工作是军事工作，军事夺取了政权，一切革命问题就得到解决”的观点。邓演达说，中国革命之彻底完成，民主主义之彻底实现，都以民众力量为最后之决定因素。但是，在落后的中国，群众遭受政治压迫与文化剥夺的程度比任何国家为甚，故群众的兴起不是短时间所能完全达到的，这就意味着民众工作不但要主动积极地开展，而且要耐心细致地进行。临委会的《民运工作纲要》规定，目前群众运动的紧急任务之一，要积极向全国民众宣传中国革命运动，使民众认识和接受本党的政纲；要迅速着手民众的组织，成立各种社团；要准备最近的将来在50万人口以上的都市，发动本党所领导之平民的或民族的民众斗争。为了有领导有组织地开展民运工作，在中央建立了“现代青年社”、“全国农民解放同盟”、“全国工人俱乐部”、“全国商业协会”、“中国教育建设协会”、“现代学术研究社”和“国民会议期成会”等群众组织。并指示各地方组织，在党的组织发展到相当程度时，立即成立民运工作机构，组织和指导当地的民众运动，调查民众的生活情况。1931年“五一”国际劳动节，临委会发表了《“五一”纪念告工人书》。“九一八”事变之后，发出了《为抗日救国而加紧青年工作的训令》，都是为宣传、组织群众，加强民运工作的重要文告。

临委会的民运工作，都是同组织、宣传工作相互结合进行的，各个大区的民运工作都初有成效。上海的“现代青年社”开展了联络和组织青年的工作，成立了“青年支部竹，在暨南、复旦、中公、江南等大学建立了“青年小组”，进行爱国活动。江苏沿京沪线一带，开展了农运工作，宣传和组织农民反对压迫与剥削，并在一些县城同当地的教育会、商会建立了联系。北平的民运工作，直接或间接掌握大学、中学共12所，在各校分别建立了“读书会”、“读报组”和“时事座谈会”等，还建立了“中国青年文化协会”、“北平市妇女生活促进会”，等群众团体，“九一八”以后，发动青年学生组织了“抗日倒蒋同志会”、“中华抗日同盟会”，同时与城市的铁路工人、人力车工人以及郊区的农民，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在北新桥、地安门设有工人、农民培训学校，培训工农运动的骨干。山东在济南高中、女师、一师、一中、女中等校分别建立了学生组织，积极进行爱国反蒋活动，“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他们同中共地下组织紧密配合，组成了五千多人的“赴京请愿团”，通过宣传、卧轨、扣车等剧烈斗争，终于取得了赴京请愿的胜利。江西南昌市在法政专门学校等学校，联系发展了一批学生，几次掀起了“反CC”、“反复古”学潮，并通过学运发展了组织。香港主要是在海员中开展工人运动，组织海员数百人成立海员协会，为配合内地斗争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临委会的民运工作，由于在反动统治力星较强的城市中进行的一些局部的活动，缺乏深厚的群众基础和工作经验，也由于工作开展未及一年，邓演达即不幸被捕，党的组织遭到破坏。所以，尽管认识到民运工作在政治斗争中的重要性，实际上，这方面的工作基础一直是相当薄弱的。

二、邓演达的军事思想和军运活动

在临委会成立的第一次全国干部会议上，邓演达就提出了“军事第一”的口号。邓演达是一位卓越的军事家，在反帝反封建反军事独裁的中国革命斗争中，他深知军事斗争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他的革命军事思想，可概括为五点：一是坚持武装夺取政权。提出“革命一开始就必须进行革命民众本身的武装组织，以准备反抗反革命武装及消灭反革命武装。二是反对军事投机。认为“旧式军人本来就不认识革命，对他们可以利用但决不可以依靠。因为在政治上有机会的时候，不独我们会做军事投机，军人也会做政治投机，投机运动是不可靠的”。三是军事运动必须与群众运动相结合。因为“革命是为了民余，革命的基本力量，仍在民众”。四是军事必须听从政治。提出革命军事只是为政治服务，军事必须听从政治。五是开展军事运动要两手抓。“一方面要搞垮蒋介石的军队，一方面要建立平民群众本身的军队”。

根据上述观点，邓演达亲自拟定了《军事方针》。对现役军人、黄埔出身的、保定和各讲武堂出身的、各军事教育机关出身的以及土匪等等，都根据实际情况分别提出了具体对待的办法。对现实全国各个部队的种类、派别、实力、驻地、训练情况、装备情况，都做了切实的调查统计。邓演达从1930年回国时，即以其个人的关系和威望同各方面的军事将领进行联系，特别是因他高瞻远瞩地打起“国民党”的招牌，举起了“反蒋”的旗帜，对各方面的一些军事将领更具有吸引力。其中主要有邓的老部属十八军军长陈诚，西北的杨虎城、邓宝珊，山西的冯玉祥、阎锡山，河南的郜子举，四川的郭汝栋、孙震、邓锡侯、李家钰、杨秀春、李经东、冷寅东、刘湘，江西的陈铭枢，武汉的胡伯翰，福建的卢兴邦等。他们有的是亲自或派代表到上海同邓演达联系，有的表示愿响应、配合邓演达起义，有的还加入了临委会的组织。这一手，就是“搞垮蒋介石的军队”。

1930年11月，为了建立平民群众本身的军队，在邓演达亲自指导下，由余洒度、陈烈、黄雍等在上海成立了“黄浦革命同学会”。该会是在总会之下分长江流域为中央区，黄河流域为北方区，珠江流域为南方区。区之下的各省市为分会、分会之下为小组，为成立分会的叫支部。全国有北平、山西等6个分会，四川、南京、香港等12个支部，入会的有1至5期的黄埔毕业生计6000余人。他们有的是在冯玉祥、阎锡山、杨虎城、高桂滋、何成漕等的部队中服役，多数是在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中担任中下级军官。黄埔革命同学会成立之后，组织的发展相当迅速，黄埔同学发生了激烈的分化，打破了蒋介石对黄埔“子弟兵”的控制，动摇了蒋介石反动统治的柱石，蒋介石对此极为不安。

军事运动的开展，也为临委会开辟了经济来源。不少国民党的军政要员为了支持邓演达举兵反蒋，都慷慨解囊，在经济上予以资助。如邓演达回国不久，李济深一次就捐助10万元；孙科先后三次共捐助15万元，并答应邓演达一旦起兵反蒋，可助他100万元；冯玉祥二次共助邓2万元；杨虎城、陈诚，都按月各助邓5 000元。当时，临委会每月的开支约需3万元，如果没有各方面的经济支援，开展任何活动都是寸步难行的。

三、武装起义的部署与流产

1931年上半年，国内一方面由于蒋介石扣留胡汉民引起宁粤分裂，各地半独立状态的势力在酝酿割据，江西的“剿共”连遭失败，水旱暴政等天灾人祸闹得民不聊生，全国各地群情骚动；另一方面，临委会的组织发展和军事运动等都有一定基础，反蒋的各方面力量也都跃跃欲动，成望邓演达首先发难。在这种形势下，邓演达考虑到武装起义的问题。但是，起义的时机是否成熟，在哪里发动起义最好，如何组织和联络各方面响应等，是摆在临委会面前一个非常现实而又重要的问题。临委会为此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意见不得统一。

邓演达认为，目前的形势，我们纵然可以等待，处在水深火热中的老百姓是等不得了！革命总是有牺牲的。估计起义之后，可能形成割据，然后逐步发展。万一失败，就将队伍拉上山去，进行武装斗争，到时候可能与共产党重新合作。为了从政治思想上统一武装起义的认识，邓演达写了《我们夺取政权之直前及直后应该做的是什么？》一-文，说：“政党的行动目的在夺取政权及实现党的纲领”，“革命夺取政权的惟一办法，是发动群众与组织群众”，但“斗争却必然的要以武力抗争的形式展开出来”。文章列举了起义之前的准备工作及夺取政权之后应该立刻做的工作。

1931年8月，起兵的一般准备渐次就绪后，临委会决定：由邓演达率领一二名得力干部，亲自到江西指挥陈诚的十八军（该军的高级将领以及由邓演达派去的一批中上级军官如庄明远、邹华盖、徐烈等，都是临委会党员，部队可由临委会控制）在临川、清江地区发动起义，首先攻取南昌。同时通知在武汉、西安、四川、河南、福建、华北等地联系好的部队一齐响应。为此，特派余靖芳去四川联络孙震，瞳济华去西安联络杨虎城，何自坚去河南联络郜子举，叶粤秀去江西先与十八军的萧乾接头，王枕心去香港会同彭泽民策动华南的部队及时响应。为适应武装起义的需要-中央的设计委员会正式更名为军事委员会，由邓演达、黄琪翔、季方、邓宝珊、严重5人组成。邓演达担任武装起义总指挥，另派季方到北平，章伯钧到武汉，黄琪翔到广州．分别负责华北、华中和华南的军事联络工作。武装起义的部署基本就绪，只等邓演达到达江西之后，即全面发动。

8月中旬，邓演达在赴赣之前，特去看望了因病卧床的朱蕴山。邓对朱说：“我要穿草鞋去行动了，你留在上海，诸事你多负责任。”朱说：“外面风声很紧，你要多加警惕，倘有失处，则将瓦解全局。”邓说：“现在是一不做二不休，生死只有置之度外。”不料未及三日，邓演达赴赣领导起义尚未成行，不幸于17日在上海被捕；眼看即将发动的革命武装起义宣告“流产”了。

第四节 邓演达被害后的组织状况和主要活动

一、有重点的整顿组织

邓演达被捕，党的领导顿失核心，整个组织一时呈现出纷乱的状态。1931年11月，中央领导经过商议，推出黄琪翔主持党务，局面渐次稳定，逐步恢复活动。得悉邓演达殉难之后，领导层中的思想出现混乱，突出的问题是“究竟还要不要干下去？”一部分人如李世璋、李毓九等因失去邓演达而对党感到“没有希望”，觉得没有组织也可以革命，因而离开了组织。一部分人如章伯钧、郭冠杰等提出改变党的名称，章伯钧在北平提出不能再戴着国民党的帽子，应当改名“农工党”。一部分人如季方等力主继续按邓演达的遗志搞下去，并在北平同邓昊明等成立“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各省市联合办事处”。黄琪翔在上海以党务主持人身份继续按原有的局面主持工作，按大多数人出于对国民党的仇恨，党的名称暂叫“中国革命行动委员会”。

黄琪翔主持党务后，按实际情况有重意地整顿组织：一是调整中央区组织。1931年冬季改组上海市干部会，由漆其生负责，大力开展对文化界的活动。创办了《学术月刊》、《国际文化》、《平民学术》、《民众三日刊》、《演化》等等，以联络文化界人士和一般知识分子；宣传临委会的政治主张，同时编辑出版了《邓演达遗著》，以激励党员承邓演达遗教，继续革命。二是加强北方区组织。1931年冬，派周惠生到北平召开了北方区各省市负责人会议，以统一思想，统一行动。随后，黄琪翔亲临北平推动了工作的进一步开展。北方区从健全基层组织活动开始，坚持每两一次小组生活，学习《历史唯物论》，《《大众哲学》等革命理论，并着手进行军事活动，同苏体元、李旭东等将领建立了联系。三是重建南方区组织。南方区组织本来就比较薄弱，邓演达被捕后，又遭到严重打击。 1931年底，派郭冠杰、万灿、詹显哲等在广州成立南方委员会，一方面加强对原有党员的联络和教育，一方面在中山大学、岭南大学、执信女校建立党的小组，逐步壮大组织；创办了《学生报》，加强对青年学生的工作；吸收李伯球、郭翘然、黄桐华、曾伟等一批骨干分子入党，增强了党的活力。在福建的龙岩、漳州一带，开始进行了工农和青年工作，组织一部分民众武装。南方区组织重建之后，较快地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二、为“倒蒋抗日”而斗争

“九一八”事变后，临委会面对国民党当局对外退让对内残杀的祸国殃民政策，明确提出：“在这种内外斗争的旋涡中，我们最重要的政治口号就是“倒蒋抗日”。1931年11月15日，临委会发出第一号（新编）《训令》说：“我们主张，要抗日救国，必先倒蒋。蒋氏的政权一日不倒，中国民族一日不得解放。”当时，对于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略是抵抗还是退让，是全国上下同蒋介石政权进行斗争的焦点。11月22日，临委会正式颁布了倒蒋抗日的十条行动纲领，声称要同“全国广大的农工平民大众推翻南京的反动统治，以抗日救国为己任。”在全国此起彼伏的抗日运动中，临委会都以实际行动参加了主要的抗日战争。

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十九路军在上海奋起抵抗日本侵略者的武装进攻。临委会派余立奎等组织义勇军，编入十九路军补充一团参加抗战。淞沪抗战失败，临委会于3月2日发表《对上海事件紧急宣言》，谴责“南京统治阶级对内屠杀剥削民众，从事连年不断的野蛮内战，而对于帝国主义的侵略，不但无心抵抗，反至勾结招引”。

1933年上半年，日本帝国主义者在逼近平津的同时，又进犯察东。冯玉祥汇集各方的爱国武装部队，于5月26日在张家口成立“民众抗日同盟军”，在察哈尔同日本侵略者浴血奋战。临委会派周惠生、张云川率领华北一批干部和党员到张家口参加抗战，以实际行动支持同盟军抗日。

1933年11月，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以反蒋抗日为号召，在福建发动“福建事变”。临委会的负责人黄琪翔、章伯钧是这次事变的策动者和参加者，并在事变中提出了“联共”的建议。11月20日，参加事变的各方面代表在福州南校场召开“中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黄琪翔作为大会主席团主席主持大会。会上通过了由彭泽湘起草的《人民权力宣言》。临委会的干部和党员一百多人从全国各地汇集到福建参加大会，参加了“人民政府”的斗争和工作。

22日，福建人民革命政府正式成立，李济深当选为人民革命政府主席，黄琪翔等11人当选为人民革命政府委员，彭泽湘任人民政府秘书长，章伯钧任经济委员会委员兼土地委员会主任，丘哲住经济委员会委员兼贸易委员会主任，郭冠杰任延建省（福建人民革命政府下辖省之一）副省长。

福建人民革命政府一成立，蒋介石采取了“坚决消灭”的手段，出动大量陆海空军向福建攻来，人民革命政府的部队在参谋团主任黄琪翔的指挥下虽然奋力抵抗，终因力量悬殊归于失败。在这次事变中，临委会党员江董琴、翁慈星、颜卧云、周捷榜、冯峻五壮烈殉难。

三、临委会解散的前因后果

1933年，临委会在福建事中充分利用当时有利条件，在福州、厦门、闽北、闽西等地把开展群众工作和发展组织相结合，积极扩充组织，工作很有基础，建立了以马鸿兴为团长、邓次侯为指导员的一支武装部队，共二千余人。部队以连城为中心，控制了闽西各县，闽西各县的地方武装都由马鸿兴指挥。是年冬季，黄琪翔派吴建东、戴剑青潜赴北平，任命苏体元为“第四方面军总指挥”，令苏尽快集结在翼南豫北一带的旧部，迅速渡过黄河，到鄂皖边境待命。临委会的组织和军事活动，陈铭枢察觉后很不满意，他一面发起组织“生产人民党”，一面提出取消“第三党（临委会）。12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胡秋原的《何谓第三党》的社论，指责临委会不该继续存在。3日，《人民日报》又登出《非解散第三党不可》的文章，对临委会进行严厉的要挟。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刚刚成立，内部就出现了新的矛盾，引起了大家的不安。蔡廷锴多次同黄琪翔商谈，力劝黄“以团结内部，共赴时艰为重，免负分裂的政治责任”。对此，黄瑛翔召集在福州的干部和党员进行讨论并征求各方面的意见，与会党员几乎都是痛哭流涕拒不接受。在上海的罗任一、广州的李伯球等，也纷纷表示反对。经过反复磋商，受迫于形势，为顾全大局，终于“中华共和国元年（福建人民政府年号，即1933年）12月11日”，临委会以“中央干部会”名义，在《人民日报》登出了《中国革命行动委员会宣告解散启事》，说：“最近中国生产人民革命运动之发展，其《人民权力宣言》新揭载革命之基本原则，直与本党素所主张之政治原则根本相同。而一切革命势力之汇合，又为本党历年之志愿。因此，本党在极端慎重考虑之下，认为本党之革命精神既有所寄托，已无单独成立组织之必要，兹特正式宣告解散。中国革命行动委员会之原有组织，一致参加生产人民革命运动，以与其他政治主张相同之革命势力，共同担负中国革命之任务。”当时，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以及他们所率领的国民党党员，都已宣布脱离国民党，参加了由陈铭枢任总书记的“生产人民党”。随后，所有参“福建事变”的各党各派党员，也都参加了生产人民党。“生产人民党”由陈铭抠匆匆组成，也只是罢花一现，实际上无所作为，迨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失败也就解体了。

福建人民政府失败，临委会的人员先后在香港集中，一致提出了恢复组织的要求，1934年2月，黄琪翔、章伯钧、彭泽民、丘哲、彭泽湘、郭冠杰等在香港集会，经两次会议反复讨论，决定恢复临委会组织，按邓演达的政治纲领继续战斗。

福建人民政府失败，临委会又一次受到沉重的打击。

第三章　为抗日救亡改称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

第一节 执行“抗日联共反蒋”的方针

一、重振组织和响应中共《八一宣言》

1934年1月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失败，临委会的负责人暂作分散隐蔽，黄琪翔等西去德国，章伯钧等东渡日本，彭泽民等仍留香港，一般干部和党员，因受政治上和生活上的双重压迫，有的自谋生路，潜伏下来，有的消极畏缩，失去斗志，有的通过共产党的关系，继续参加战斗，少数人通过国民党的关系，混得了一官半职。这就是临委会创党以后所经历的艰苦过程。

1934年春季起，流亡到日本东京的章伯钧、李士豪、何世琨、郭冠杰、李伯球、何仲珉、黄农、李健生等十余人编为三个小组，每周集会一次，就国内和国际的政治经济情况交换意见。935年夏季，日本帝国主义向我华北发动新的攻势，国民党政府继续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并同日本侵略者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协定，残酷压制人民的爱国活动，激起了全国人民反蒋抗日浪潮的高涨。流亡到日本的章伯钧在形势的催促下，同李士豪、李伯球、何世琨以及所联系的中外友人郭沫若、田中忠夫等十余人，以避暑为名在伊东井子头公园集合，就如何重振组织，反动反蒋抗日等问题交换意见。一致认为，中国的情况很复杂，惟有共产党是革命的主力，但也需要各方面的力量去配合行动，这就是我们要重振组织的目的。集会之后，还吸收一些旅日的进步人士如朱程等加入了组织，在伊东办起了《解放》杂志。与此同时，在德国的黄琪翔、连瑞琦等也积极参加了由中共领导的“旅欧华侨抗日联合会德国分会”的爱国活动。当章伯钧将日本商议的情况函告黄琪翔时，黄复信说：“现在从斗争的实际情况来看，共产党是斗争的主力，要革命就必须与红军取得联系，必须同共产党合作。”，临委会的负责人在重大的根本问题上，有了有了共同的认识。

8月1日，共产党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临委会的负责人深受鼓舞，认为“反日反蒋，事有可为”。在日本的李士豪、何世琨等催章伯钧速回香港，重振组织参加民族抗日阵线。随后，发表了第一个《组织反日阵线提议的宣言》，建议组织反日阵线。说“中国反帝民族革命战争，应自对日宣战开始”。呼吁“一切的革命党派，在目前民族生死的最后关头中，应该放弃其宗派的偏见，在反帝反日战争和土地革命两大原则之下，形成巩固的联合战线，组织统一的行动指导机关。”这个《宣言》的发表，是率先对中共《八一宣言》的响应，表达了同共产党合作的诚意。

二、第二次全国干部会议

1935年秋，章伯钧从日本回到香港，经与彭泽民、丘哲、郭冠杰等初步商议，认为“我党向有社会基础和工作基础，抗日救国，应急起行动。要本着过去的精神，重振组织，为民族解放而奋斗到底。”黄琪翔也从德国来信赞成恢复组织活动，并汇来港币2000元作为行动的经费。

10月下旬，华北的张云川、广东的郭翘然以及在日本的李士豪、何世琨、李伯球等，都陆续抵达香港，同在香港彭泽民、丘哲、彭泽湘等，共同就重振组织的具体问题交换了意见。第一是党的路线方针问题。认为中共发表了《八一宣言》，第三国际也提出了“反法西斯人民阵线”的主张，我们都应当首先响应。目前中共在发过所作的国际统战工作颇有成效，国内的统一战线已能团结各个方面，趋于一致。我们应当同共产党合作共同奋斗。经过讨论，确定在过去的“反蒋抗日”主张的基础上，今后以“抗日、联共、反将”作为党的总方针，以推动抗日作为党的中心工作。第二是党的名称问题。认为党的名称必须改变，应当去掉“中国国民党”的帽子，以表示同国民党彻底决裂；又要适应革命形势的变化，应当以民族解放为己任，还要照顾到历史传统，保留“行动委员会”的称谓。一致同意改党名为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以下简称解委会）。第三是党的纲领问题。一致同意以邓演达的纲领作为党的基本纲领。根据新的历史任务提出具有现实意义的纲领，突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将建立平民政权的口号，改为建立抗日民主政权的口号。总得精神是“团结全国，对日宣战，土地革命，实行民主”。第四是党的指导思想问题。议论之初，有的鉴于过去教训，提出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来解释中国问题。有的主张只用马克思主义，不提列宁主义。争论结果，决定“以马列主义作为党的思想武器”。推章伯钧、彭泽湘、李伯球、张云川起草《临时行动纲领》和《告同志书》。

11月10日，在九龙大埔道召开第一次临时代表会议（后改称第二次全国干部会议），会期一周。出席会议的有：章伯钧、彭泽湘、丘哲、彭泽民、郭冠杰、张云川、李伯球、李士豪、杨逸棠、郭翘然、陈卓凡等十余人，由章伯钧、彭泽湘、彭泽民主持。会议决定改党名为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通过了《临时行动纲领》和《告同志书》。；确定以“抗日、联共、反蒋”为党的总方针，以马列主义为党的思想武器，以推动抗日为党的中心工作；选举了中央领导机构，黄琪翔、章伯钧、彭泽湘、丘哲、彭泽民、郭冠杰、李伯球、张云川、李士豪、季方等19人当选为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推选黄琪翔为总书记（在德国），彭泽湘为组织委员会书记，章伯钧为宣传委员会书记，丘哲为财务委员会书记，彭泽民为监察委员会书记，郭冠杰为总务委员会书记。决定在黄琪翔总书记回国之前，党务由彭泽湘、章伯钧、彭泽民、丘哲、郭冠杰集体领导。

这次会议的召开是解委会历史的一大转折，也是走上了同共产党合作的、富有生机活力的新里程的开始。

三、《临时行动纲领》和《告同志书》

为适应抗日的民族革命，解委会提出了《临时行动纲领》，指出“今日的国际形势，正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前夜。”“日本必然凭借武力，夷中国为其完全的殖民地。”“中国人民惟一的出路，便是立刻发动民族革命的战争，对日作战。”《纲领》对国民党统治下的“现实问题”，作了揭露与抨击。指出中国工农劳苦大众，特别是占人口最大多数的农民，要求生存解放之迫切。认为民族革命战争，没有广大的农民参加便无胜利的希望。因此，土地革命与反帝战争是绝对不可分离的。《纲领》说，中国革命的性质，是民主主义的革命，但中国现有的苏维埃政权和几十万红军的存在，这是一个为世所惊骇的事实。我们的任务，是承认苏维埃是其现有区域的政权形式，要敦促红军与全国反帝的军队和人民取得一致的行动，共同对日作战。《纲领》呼吁世界上的反帝国家和民众，应该结成联合战线，必须恢复联俄政策。《纲领》说，要彻底完成民族革命战争这个神圣任务，必须全国人民合作，不能奢望依赖现攻府或国民党单独来做。所以我们主张召集全国人民非常代表大会，由一切真正反日的组织和不带汉奸意味的各职业团体选出代表参加，并由大会宣布对日作战。

“二干会议”闭会后，发表了《告同志书》。这个文件阐明了党的基本理论和政治主张，说明了重振组织的意义和目的。其中关于中国革命的联合战线问题，对当时国内外形势及如何建立联合战线所应注意的问题，都有所论述。

《告同志书》说：“我们思想上的武器，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因为中国现时的革命，是的反帝国主义和土地革命的民主运动，但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反帝革命运动，如果彻底的进行，在客观上同样是反资本主义的，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而且我们目前的民族解放事业，亦即工农劳苦大众解放的事业，我们所代表的是工农劳苦大众的利益。所以，我们思想上的武器，应该毫无顾忌的使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告同志书》是一个重振组织的文告，是一个响应“中共号召抗日”的宣言。这个文件发出后，全体党员都受到极大的鼓舞。

第二节 以推动抗日为中心工作

一、重建地方组织

解委会根据“二干会议”精神，开展推动抗日的工作，在北平、上海、广州重建了华北局、华东局和华南局三个大区的组织机构。华北局先由周惠生后派何世琨任书记，同王一帆、张云川组成华北局委员会，领导北平、天津、山东、河北、河南、绥远、山西等省市工作团的工作。主要是恢复和建立组织，联络和发展党员，组织各种社团，开展工人、农民、青年学生、妇女和军事运动，出版《行动》、《草原》、《大学文艺》等刊物。一切是为了“壮大组织，鼓动抗日”。北平的许多党员，还参加了“一二·九”学生运动。华东局由李士豪任书记，同何仲珉、畅清源、欧阳平、施建中组成华东局委员会。领导上海、浙江、江西、安徽、福建等省市工作团的工作。除恢复、发展组织外，主要是开展青年学生和工人运动，出版《行动》， 《铁掌》等刊物，组织工人、青年开展群众性的救亡歌咏活动，同河南、福建的一部分地方团队建立了军事联系，积极为抗日作准备。华南的组织活动最初集中在广州，由李伯球以“中央代表”名义领导工作。广州市组织由裘朝慎任书记，和张觉初、陈伊林、李宏略、丘锷苍组成广州市工作团。主要工作是团结福建事变失败后留在广州的～部分老党员，通过工农学生运动吸收一部分新党员，建立了开展青运工作的“青年联络点”，创办了《南方青年》，积极开展反蒋和宣传抗日的活动。在梅县、汕头、惠州等地建立了少量的农民武装准备抗日。在汕头组织了“反日十人团”，对欺压中国人民的日本人进行暗中袭击，对侵略者有过严厉的惩罚。

“二干会议”以后，留在日本东京的一批党员，仍由李述中负责，继续坚持两周一次组织生活，讨论国际国内形势，学习党的《政治通报》；他们在中国留日学生中秘密发展组织，宣传抗日主张，同国民党在日本的瓜牙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联系旅日人士和学生，组织“国际问题研究会、“日本问题研究会”、“资本论学习会”、“南青学社”、“帝大同学会”、“法学研究会”等社团，通过社团活动宣传反蒋抗日。1936年夏，已有党员二十余人，正式成立东京支部。随着中日矛盾的日益尖锐，中日关系日益紧张，东京支部的成员纷纷离日回国准备参加抗日。启程较晚的陈炯煊、陈盛智受到日本当局的迫害，一直关押到南京沦陷的前一天被“驱逐出境”回到了祖国。东京支部在日本勇敢坚强地开展反蒋抗日活动，为解委会添上了鲜丽的色彩。

二、策动反蒋扒日

1935年至1936年，中国的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以“一二﹒九”学生运动为标志．蓬勃发展起来。上海、天津、青岛等市各日本纱厂的工人纷纷罢工，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爱国行动和力量0 1936年2月26日，日本少壮派军入发动政变，力主侵华的广田弘毅起而组阁，中华民族危在旦夕。解委会目击形势险恶，于2月底发表了《对时局宣言》，又一次提出了“组织反日阵线的建议”。《宣言》说，发动反日战争实为全中国人民一致的要求。“国内任何矛盾，都大不过日本帝国主义者与中国的矛盾，各党派间的任何分歧，都不能否认集中力量反日的必要。”《宣言》向全国各党各派各社团提议：以最快的速度，组成全国的反日阵线。

1936年，国际国内形势急剧变化，德意法西斯国家结成轴心，咄咄逼人，日本向中国加紧进攻，其势汹汹。6月1日，两广的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陈济棠等联合起来，发动“六一”事变，打起了反蒋抗日的旗号，宣布北上抗日。解委会负责人章伯钧、彭泽湘到南宁，参加这次反蒋抗日运动，在南宁举行的各党派团体联席会议上，一再发言，主张立即组成反蒋政府，发动抗日战争。“两广事变”发动不久，遭到蒋介石的破坏，章伯钧和彭泽湘被“礼送出境”回到香港。

三、从反蒋抗日到参加逼蒋抗日

1936年7月，蒋介石受国内外形势的逼迫，在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表现了对日态度的某些改变。为了推动抗日，中共中央于9月1日发出了《关于逼蒋抗日的指示》。指示目前中国人民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对蒋的政策，应从“抗日反蒋”改为“逼蒋抗日”。解委会为了在政治上同共产党密切配合，从“反蒋抗日”转为“逼蒋抗日”。

1936年10月，黄琪翔从德国回国，途经香港同章伯钧、彭泽湘、彭泽民、丘哲、郭冠杰、杨逸棠等会晤，着重研究了对时局的发展问题。一致认为：当前的首要问题，是如何推动全国联合进行抗战。以往连年内战，在党禁森严的情况下要搞联合是非常艰巨的。但在目前形势下，日本帝国主义疯狂的侵略，全国人民抗日高潮的汹涌，国民党内部有了分裂的暗流，共产党已经发出了联合抗日的号召，这就有可能促进联合抗日的实现。我们在国民党中间进行促进联合的工作，对时局的推进是有裨益的。

11月，解委会派中委罗任一为代表，到西安同杨虎城会晤，共商联合抗日的问题。罗到西安受到杨虎城的热情接待，并介绍罗同张学良会见，共商抗日问题。罗在西安几次同张、杨正式会谈，参加会谈的有张学良、杨虎城、罗任一、卢广绩、孙蔚如。会谈中都主张联合全国，实现武装抗日。罗在西安期间还应杨虎城邀请，先后在西安绥署步兵军官学校和在十七路军团以上军官大会上做了有关国际形势和团结抗日的报告，受到热烈欢迎。

1937年6月15日，解委会为要求国民党刷新政治，顺从民意，发动抗日，由彭泽民发出了《致各界领袖书》，提出“举国人民正于和平统一、团结御侮的最高原则下，期望中枢当局早定国是，予人民以共同努力之具体救亡方针。”“民主政治必须迅速确立；各政治党派必须平等合作；国民代表大会之召开，应以民主主义为原则；立即释放全国政治犯及终止阻碍民权发展之防范工作与一切紧急条例。”

1937年上半年，华北局势十分危急。彭泽湘到北平视察党务，并联络知识界策动抗日，发表了有数十位著名教授学者签名的抗日宣言。6月下旬，毛泽东通过李锡九邀彭泽湘访问延安。彭到延安后受到中共中央领导人张闻天等的盛情接待，下榻陕北饭店。毛泽东连续四五个晚上手带一包前门牌香烟，亲到陕北饭店同彭泽湘叙谈。毛泽东向彭询问了广西、上海等地的情况以及两广军政人员对抗日的态度，分析了中国的历史和国家的形势，阐述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策略等等。彭在延安逗留一周，深感“受益不浅”，他在7月5日回到北平后对华北局的干部说：日本帝国主义如此欺侮我们，抗日战争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应当做好充分的准备。抗战一爆发，只要竖持打下去，中国人民是可以打到底的。彭泽湘应邀访问“红都”，是中共领导人同民主党派领导入的首次接触，共叙国是。说明共产党同解委会在民族危亡的紧要时刻，就有同舟共济、肝胆相照的关系，体现了共产党对解委会的友谊与关怀。

第三节 抗战爆发后的历史新阶段

一、向国民晃提出八项政治主张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拉开了抗日战争的帷幕。解委会为促进国内的统一和团结，在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以大局为重，采取了同国民党合作的形式，承认“国民政府”为抗战政府，承认蒋介石为抗战“领袖”，通令全党停止对国民党的斗争，积极参加和开展一切抗日活动，并尽量争取投入到抗日的第一线。

7月10日，解委会从团结抗日出发，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了八项政治主张：

1．提前召开国民代表大会，制定全国上下一致遵守的政治纲领，俾全国各阶层力量能迅速集中，各方政治意见能彻底融洽，以树立政府之坚实抗战基础。

2．实现最低限度之民主政治，以增强人民对政府之信赖，并使人民得以自由发挥其抗战能力。

3．建立特殊机关，统一各党派所领导之民众活动，俾全国宣传、组织与训练，完全趋于一致。

4．成立武装民众之指导机关，指挥全国义勇军之活动，使其与正式军队之动作，有适当配合，借收指臂之效果，

5．于全国各地成立在乡抗日志愿军．以备征兵制未完成前之调动。

6．成立战时经济计划机关，计划战时必须之生产与分配，并分设于各省市，以促成战时计划经济之实现。

7．对广大战区中的劳动人民、自由职业者、中小手工业者、失业公务人员等，须有妥善之救济方法。

8．除汉奸外，宜从速开释全国政治犯，并取消以前有碍民众运动之各项特殊条例。

这八项政治主张，表达了全国人民的愿望与要求。国民党当局不但置之不理，且执意不承认解委会的存在，处处加以歧视和排斥。蒋介石7月间在庐山召集“谈话会”，8月间在南京召开“国防参议会”，名日“集中意见，团结御侮”，邀请了国民党以外的党派领袖和社会名流参加，惟独把解委会的负责人章伯钧等排斥在外。可是，解委会坚持同共产党合作的方针，在政治上同共产党保持一致，在斗争中同共产党密切配合，在伟大的抗日战争烈火中不断地得到锻炼和发展。

二、积极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抗日战争爆发后，解委会在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登上了企盼已久的民族革命的大舞台，充分发挥自己的特点和优势，积极开展各种抗日救亡活动。在华北、北平和天津组织先后成立了“华北青年抗日会”、“中华抗日同盟会”，在天津到丰台一带进行抗日的组织和宣传潘动。平津沦陷后，撤离平津的部分干部吴建东等到邯郸、磁县、林县、新乡等县组织工农群众，建立了“豫北游击第二纵队”，在冀南豫北进行游击活动，干扰袭击敌人。北平工作团书记王守先，在北平坚持地下斗争，深入居民中宣传反日，并同“民先”负责人支道三合作，在涿县组织抗日武装，同敌人进行斗争。1937年10月，他不幸被日本宪兵逮捕，在狱中受尽酷刑，始终坚贞不屈，敌人奈何他不得，最后拔去他十个指甲，放出狼犬将他活活咬死。

在华东，解委会以上海为中心，组织工人、学生开展抗日救亡的歌咏活动，推动群众参加抗日救亡工作。“八一三”淞沪抗战，解委会总书记黄琪翔先后担任第八集团军副司令、司令，指挥了这场举世瞩目的反侵略战争。财务委员会书记丘哲在上海配合抗战，发动党员和群众成立了“抗日后援队”、“前线慰劳队”，积极支援抗战。在上海保卫战中，党的干部裘朝慎在日寇的轰炸中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中委季方，1938年以战地党政委员会指导员身份进入华东敌后，联络和争取各地方部队参加抗日。1941年他在新四军领导下，担任苏中第四军分区司令员，率领军民开展反扫荡斗争，巩固和扩大了抗日根据地。上海、南京沦陷后，解委会派吴建东、张牧野到安徽开展敌后武装斗争，吴建东在桐城建立了“皖中人民抗日义勇军”，张牧野在潜山建立“游击第一支队”，在抗战初期发挥了打击敌人、保卫家乡的作用。

在华南，李伯球等在广州成立了“抗日救亡实践社”、“乡村抗敌工作服务团”，开办农民夜校，创办《抗战农村》、《抗战妇女》、《抗战青年》、《抗战华侨》等刊物，积极团结组织抗日力量，宣传推动抗日。梅日新等组织青年群众开展武装斗争。广州沦陷后，司徒卫中等在广州东北部组织学生和农民，建立“民众抗日游击纵队”，以帽峰山为根据地，在番禺、增城、从化、龙门、花县等地进行抗日游击活动，同敌人历大小战役十余次，毙日军官、军曹各9人，日伪军百余人，毙俘汉奸8人，缴获武器弹药和军用物资一大批。在残酷的战斗中游击队英勇牺牲的有李辉、何苟、王记仔、李文初、陈锦、陈陪等八十余人，深入敌后收集军事情报而被敌人捕杀的还有洪静波、何华昌、范木挂等人。

在华中，解委会的负责人章伯钧、彭泽湘等于1937年冬季到达武汉，从华北、华东撤退下来的许多干部和党员，也陆续到武汉集中，成立了“临时工作组”。通过“青年抗日工作团”和“黎明剧团”，在工人、学生和海员中进行抗日救亡的组织和宣传活动，吸收了一批青年和工人入党。2月1日，在武汉创办了中央机关刊物《抗日行动》旬刊，它的宗旨是“本民族至上，民主至要的意识，抒陈有利于国家民族的政见。”

三、第三次全国干部会议和抗战《纲领》

1938年1月，解委会的中央负责人到了武汉。当时，武汉的群众抗日运动正蓬勃发展，中共领导的群众抗日团体十分活跃，书店门庭若市，中共出版的书刊被争相购阅。而国民党内的顽固派却多方压制人民群众的抗日活动和抗日热情，散布“速胜论“、“亡国论”等奇谈怪论。解委会为了明确政治方向，坚定正确的政治立场，在抗战中更好地发挥作用，于2月间以章伯钧、彭泽湘为代表，同中共领导人周恩来、王明在汉口举行会谈。会谈中双方回顾过去的两党关系，一致表示今后须加强合作，共赴国难。周恩来还对章伯钧等指出，你们的“土地革命”的主张，在抗战时期可以不提，我们是实行“减租减息”的。章伯钧等表示感谢和接受。会谈中最令章伯钧等受到启发和鼓舞的，是明确了中共的“全面抗战”的抗战路线和“持久战”的抗战方针，深感参加这次伟大的抗日战争“心中有底了！”会谈之后，解委会立即筹备召开第三次全国干部会议。由彭泽湘、章伯钧亲自起草《抗日战争时期的政治主张》。这个纲领是以“抗战、民主、反对官僚主义，改善人民生活”为重点。还起草了《抗战时期人民自卫武装组织条倒》，作为发动人民群众，组织人民武装，实行全民抗战的工作条例。

3月1日，解委会在汉口召开第三次全国干部会议。出席会议的有章伯钧、彭泽湘、丘哲、张云川、何世琨、李士豪、王一帆等二十余人，会期一天。中共领导人周恩来、叶剑英、秦邦宪应邀参加会议。会议主要议程是通过《抗日战争时期的政治主张》、《抗战时期人民自卫武装组织条例》两个文件，增选了朱代杰等6人为临时中央执委会委员。决定在黄琪翔总书记公开履职之前，由章伯钧担任“总联络人”。

会议通过的《政治主张》，核心内容是要实行全民的全面抗战，坚持长期的持久抗战。认为中国这次抗战，是包含了除极少数汉奸而外的一切人民的利益，是全国各阶级共同要求的全面抗战，这是中华民族图存的最后挣扎，也是中华民族复兴的起点。落后的中国要抗战并战胜穷凶极恶的日本帝国主义者，必须忍受长期痛苦，集中全国物力财力人力，用已之优长，攻敌之弱点。为此，根本的问题是改革政治。要改革政治方针，实行民主政治，改善人民生活，发展战时生产，改善财政政策，施行战时教育。加强民族团结，尊重侨胞权利。《纲领》就是把中共的抗战路线和方针，用纲领的形式接受下来，作为全党的精神支柱和行动指针，在政治上加强同中共合作的基础。

“三干会议”之后，中央于4月创办了《前进日报》，围绕“抗战与民主”加强宣传工作。认为中国抗战，要民主才能团结，要团结才能胜利。对于全国的地方组织，决定“后方组织”配合抗战，积极开展工作；“沦陷区组织”凡能保留的，应尽量保留下来，坚持工作。并派出李士豪、何仲珉、张云川分别到浙江、江西、广东等沦陷区主持党务。

第四节 为坚持抗战与实行民主而斗争

一、积极参加民主宪政运动

抗日战争期间，中国的进步、中间、顽固三种势力之间的斗争，主要是围绕着抗战与民主这两个问题展开的。抗战一开始，全国人民都纷纷要求国民党废除一党专政，成立抗日联合政府，惩治汉奸卖国贼。解委会负责人彭泽民1937年12月由香港到汉口赴国难，即联络冯玉祥、李烈钧、李公朴等为谋求实现民主改革，发展抗日力量，竟受到蒋介石、汪精卫的横蛮排斥，被迫返回香港。 1938年2月，章伯钧、彭泽湘先生发表文章，希望国民党接纳各党各派的政治要求，开放党禁，实行民主，改善民生，商定全国一致遵守的以民主为骨干的政治绸领。3月间，蒋介石在汉口几次约见章伯钧和彭泽湘，说是交换对时局和成立国民参政会的意见，交谈中各说各的理由，没有任何结果。

三四月间，国民党在武汉举行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会上通过了《抗战建国纲领》，决定成立国民参政会。对此，解委会提出了“我们对抗战建国纲领的意见”，要求国民党及早使纲领更加具体化、实际化，更应号召全国人民和在野党派进行讨论，发挥和补充这个纲领。

7月上旬，国民参政会第一届一次会议在武汉召开。解委会受聘为国民参政员的仅章伯钧1人。会议在中共参政员的带动与影响下经过斗争，确定了抗战到底的国策，宣布了实行各党各派各界合作的抗日方针。会后，备党派的参政员掀起了一个广泛的民主宪政运动。章伯钧代表解委会多次发表文章和谈话，积极参加有关实施宪政的活动。章伯钧提出：“希望国民参政会从半民意机关发展到完全的民主制度。”“抗战与民主不可分离，是我们一贯的主张。”“应当确定备在野党派参加国民参政会，由其自行推选参政员，要保障参政员的权利。”在国民参政会一届四次会议上，章伯钧和其他参政员联合提出了“结束党治，立施宪政”和“改革政治，以应付非常局面”等提案。会议指定他为国民参政会宪政期成会委员。 1939午11月在重庆召开的宪政促进会筹备会上，章伯钩和董必武、沈钧儒、黄炎培等25人被推为宪政促进会常委会委员。

1941年8月18日，解委会发表《对时局宣言》。要求召集各党各派各团体举行紧急会议，确定民主的领导抗战方针，释放一切政治犯，承认各党各派的合法地位。

1943年第三次反共高潮被制止后，大后方又掀起了争取民主实施宪政运动。至1944年，随着民主运动的高潮与国共和淡的恢复，以及中共的“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主张的提出，解委会意识列中国政治的重大问题，是取消国民党一党专政和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因而增强了争取民主和抵制蒋介石压迫的勇气和信心。在这段时间，章伯钧代表解委会频繁地参加发起和主持有关宪政运动的活动，并于1945年春季，多次在《新华日报》发表文章，呼吁召开紧急时局会议，建立民主统一政府，实行宪政。2 月 1日，解委会在重庆创办《中华论坛》半月刊，声言要“站在人民立场，对重大的历史任务努力尽责。”许多知名的民主人士如郭沫若、邓初民、胡绳等都在上面发表了政论文章。

一、反对国民党的分裂投降活动

1938年10月武汉失守以后，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国民党政策的重点，从对外转向对内。

1939年1月，国民党在重庆召开五届五中全会，会上决定设立“防共委员会”，通过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等一系列反共文件。从此，国民党采取了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到处制造摩擦，造成惨案。在国民党的反共叫嚷中，汪精卫集团于1938年12月19日由重庆飞往河内，29日公开发表艳电，向日寇投降。1939年1月2日，解委会发表《声讨汪兆铭通敌卖国》通电，指责汪逆一年多来无日不在使抗战图存的局势陷于军心涣散，民气消沉，外援断绝，内争再起的绝境中，以达到其卖国求荣之目的，他今日之公开叛国，实为其过去行为发展之必然结果。通电要求国民政府对汪兆铭尚须严申国法，下令通缉，归案严办。对于潜伏各处的汪逆党羽，后患堪虞，不容姑息，应撤查缉办，以期除恶务尽。

1939年底至1943年上半年，国民党连续发动三次反共高潮，其中尤以1941年1月的“皖南事变”为甚，国民党制造了一个震惊中外的大惨案。1月12日，彭泽民同宋庆龄、柳亚子、何香凝在香港联名致电国民党中央和蒋介石，严厉谴责国民党当局的反共罪行，要求撤销反共部署，解决联共方案。丘哲在香港也同300多位社会名流致电蒋介石，要求制止内战，团结抗日。蒋介石在军事上制造反共摩擦的同时，还调动张群、宋美龄等四出活动，拉拢中间党派，图谋从政治上孤立共产党，并对解放区造谣诬奠，分裂活动无所不用其极。 1941年9月18日，解委会在抗日战争最困难的时候，发表了《对时局宣言》，提出14项为争取“抗战必胜，建国必成”的政治主张，要求改革政治机关，确立民主方针，终止特务工作，扫除妥协分子，承认各党各派的合法存在。1943年，解委会中委张云川不辞艰辛，长途跋涉进入苏北解放区参观访问、考察，回重庆后向中外记者介绍了解放区的真实情况，并在《群众》上发表《苏北见闻记》，以无可争辩的事实戳穿了造谣者的谎言。

抗日战争期问，由于解委会间共产党密切合作，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引起了蒋介石的注意与嫉恨，因而对之采取消灭异己的手法，自1938年起，蒋介石多次派陈诚、陈公博等威逼解委会“解散组织”、“同国民党一起组织三民主义青年团。”或者说：“由政府拨出一笔款子，划定一定地区，由第三党主持进行实验，组织生产。”等等。这一个个花招都遭到解委会坚决的抵制。

三、抗战时期的整党运动

1938年秋季，解委会的负责人章伯钧、彭泽湘等和一批干部先后从武汉撤到重庆，在半山新村3号设立了中央联络点。解委会的地方组织，在大后方只有重庆、成都能开展正常的组织活动．沦陷区能坚持活动的有江西、广东和浙江。江西集中了新老党员约200人，由何仲珉、王一帆负责联系。这些党员分布在南昌、泰和、吉安、修水、丰城等县市，他们利用在抗日团体的公开身份，进行组织活动和参加抗日工作。党员傅润生带领部分游击队员由九江偷渡长江时不幸落入敌手，被日寇活活剥皮惨杀。浙江以诸暨为中心，在李士豪领导下建立了地下支部，利用公开的社会身份进行抗日的政治工作和群众工作。广东主要以兴（宁）梅（县）地区为据点，在李伯球等领导下有党员一百余人，通过各种关系以公开身份开展群众工作和抗日的宣传教育工作。

解委会为解决经费问题，提出了“发展生产，自给自足”的口号。1939年通过努力，从赈济委员会请得一笔资金创办了由章伯钩任经理的北碚民利制革厂，并附设有农场。先后打进国民党的一些工厂，如由庄明远任董事长的江津中华纺织厂，由袁吉安任厂长的江津陆军敷料制造厂，由连瑞琦任厂长的陆军卫生用具制造厂。这些工厂，对于解委会不仅是取得财源的金库，也是进行秘密活动的联络点。解委会曾将一批医疗器械送给了八路军办事处，中共领导人同民主党派负责人进行秘密会谈，经常是在陆军卫生用具制造厂进行的。

1939年以后，国内政治斗争复杂化，反映到解委会内部，意见分歧也越来越大，有极少数负责人慑于国民党当局的压力，提出“在国共之间采取超然态度，持绝对中立”的主张。这种意见，遭到章伯钧等绝大多数负责人和广大干部的坚决反对，认为政治上是没有什么绝对的中立，总是要偏向某一方面的。我们是代表农工平民的政党，应当偏向共产党。为了统一党的思想，健全党的组织，1940年秋季，解委会在重庆进行了一次整党。规定党员都须重新填写入党申请书，并履行宣誓：“为完成民族解放，实现民主政治，争取社会主义三大目标而奋斗到底”。主张“绝对中立”者不愿意填表、宣誓，离开了组织。解委会趁此“吐故纳新”，吸收了郭则沉、严信民、韩兆鹗、王深林、杨子恒等一批进步骨干入党。他们入党后同老一辈的负责人精诚团结，为解委会坚持同共产党合作，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四、同中共风雨同舟加强合作

1938年，中国的政治中心由武汉转移到重庆之后，中共领导人周恩来等经常就国内外形势、抗战政策、国共关系等重大问题同解委会负责人章伯钧等交换意见，沟通信息，增进了相互了解和友谊，并在实际斗争中协调行动，互相呼应，解委会负责人也不断从中得到帮助和启迪。1939年9月在国民参政会一届四次会议上，中共参政员提出了“结束党治，实行民主宪政”的要求。章伯钧随之提出了“结束党治，立施宪政，以安定人心，发扬民力，而利抗战”的提案。解委会从历来的斗争经验和实际体验中，认定“共产党是抗战与民主中的最可靠的朋友”。遇事总是站在共产党一边，同共产党密切配合，互相呼应，在重大问题上旗帜鲜明地表明自己的立场。如关于抗战问题，认为“抗日战争是我们自己的责任，虽战至一兵一卒，剩最后一寸土地，还是要抗战而至取得最后胜利为止。”“要反对动摇犹豫分子妨碍抗战的一切企图”。关于民主问题，强调“只有实现民主政治，才能动员全国的物力入力，才能保障抗战的最后胜利”。“反对国民党一党独裁。”关于团结问题，指出“抗战是各党各派联合的抗战。各党各派联合的基本原则，是统一联合战线的形式，并非各党各派的消灭与解体”。“一切反共的鼓噪，显然是离间联合战线，替敌人作反间的工具”。关于共产党问题，肯定“在当前抗战阵线中，共产党是同样效忠国家，为民服务，参加抗战，更无特殊标榜反共的理由”。“在世界民主国家共产党的组织，都有法理上的地位，中国不容独异”。关于外交问题。主张“加强同苏联的联合”。“要结成国际反侵略的坚固战线，以反侵略战争答复侵略战争，以反侵略的运动削弱侵略者的力量，才能真正到达和平之路”。

1941年1月中旬，国民党背信弃义发动了“皖南事变”后，解委会派章伯钧、丘哲为代表到重庆曾家岩50号同中共领导人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会晤。晤谈中章伯钧等表示了加强同中共合作的诚意，请求中共在政治、经济、组织等方面予以切实的援助。周恩来表示赞成，答应予以种种支援。1月25日，周恩来等向中共中央报告说，第三党因当局之压迫，逐渐左倾，提出以联俄联共为中心主张。最近派代表与我们谈判，同我们建立了更密切之合作。3月间中共中央的《政治情报》中也说，第三党与我们最接近，是最同情我们的。

五、参加组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

抗战进入第二阶段，蒋介石的国民党一党独裁和旅行排除异己的政策，使中间党派逐渐感到失望和威胁，都有联合起来的要求。1939年10月，章伯钧和沈钧儒、黄炎培、梁漱溟、左舜生、罗隆基、张澜等一部分国民参政员，发起组织了“统一建国同志会”。在大后方开展民主宪政运动，要求结束党治实行宪政。1941年，中国政局紧张到国共两党濒于分裂。解委会负责人章伯钧、丘哲甚感不安，正向各方面建议组织第三者的政治同盟，以抗拒蒋介石的压力，并同共产党合作。统一建国同志会的各党各派人士也认为“非民主团结，大局无出路，非加强中间派的组织，无由争取民主团结”大家经几次座谈后意见相通，在共产党的支持下， 3月19日在统一建国同志会的基础上，由解委会、青年党、国社党、职教社、乡建会、救国会（稍后加入）6个党派联合，正式成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章伯钧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丘哲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解委会作为一个集体盟员加入同盟，其工作方针是“因时制宜，重点放在同盟”。1944年9月19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重庆召开全国代表会议，决定改称中国民主同盟（以下简称民盟），容许个人参加组织。在这次会议上，章伯钧、丘暂、张云 川、郭则沉、韩兆鸭当选为中央执委会委员，章伯钧仍当选常委。

解委会是一个历史较久的党派。有一定的社会联系、组织基础和干部班底。1941年民盟成立伊始，章伯钧即任组织部部长，一直主持组织工作，对民盟初期的组织建设，解委会发挥了骨干的作用。如l942年李伯球奉派到广西桂林，推动建立了桂林核心小组。随后回到广东，参加建立了广东核心小组，并在此基础上有丘哲、李伯球、饧逸棠参加成立了东南总支部。1944年郭则沉到西安联络杜斌丞、杨明轩等，共同建立了西北总支部筹委会。1945年丘哲、彭泽民、李伯球、郭翘然参加建立了南方总支部，随后，曾伟、郭翘然先后成立了港九支部、广东支部。唐午园在武汉参加成立了湖北支部。l946年3月，张云川在上海参加筹建了上海支部0 5月，韩兆鹗在南京建立了南京支部。6月，郭则沉在贵阳建立了贵阳支部。此后，李柱等在江西建立了江西支部。

民主政团同盟成立后，内都多党多派，情况比较复杂。解委会一直同盟内的进步力量团结在一起，坚持了比较正确的立场。在反对蒋介石的分裂活动中，在以实施宪政为中心的民主运动中，在调停国共两党关系的工作中，在1946年政协会议的斗争中，都为民盟同中共密切合作，互相配合，在政治上起了支柱的作用。

第五节 为争取和平民主而斗争

一、揭露国民党昀内战阴谋

1945年8月14日，日本政府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胜利结束。此时，全国上下都渴望和平建国，建立一个各党各派联合的独立、自由、民主、统一的新中国。可是蒋介石在美国的扶助下，念念不忘要消灭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势力，坚持其一贯的独裁统治。8月25日，共产党发表《对目前时局的宣言》，提出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得到全国各个方面的拥护。 8月间，蒋介石玩弄假和平阴谋，邀请毛泽东到重庆谈判。其实，在国共重庆谈判前后，蒋介石一直在各地发动内战，向解放区进攻。为了揭露蒋介石的内战阴谋，9月14日章伯钧对《新华日报》记者发表了“对时局淡话”。他说：“现在全国局势，正是中国历史的转折点，民主建国大业，任重道远，经纬万端，必须全民合作，党派团结。任何形式之内战及军事行动，都将遭到国人之坚决反对。”“希望国民党顺应世界潮流，接纳人民要求，立即结束党治，实行民主，给人民予民主权利，并承认现有一切抗日民主党派的合法地位。”章伯钧说：“目前解放区之军队及政权问题之解决，须着眼于实际的情况。因此等军队与政权，系由当地人民取自敌人，有功抗战，不能视为化外，予以敌视的态度。”

11月12日，解委会发表《抗战结束后对时局宣言》，严厉谴责国民党发动内战。指出，八年的浴血抗战刚刚结束，而祸国殃民的内战竟又开端。”要求国民党“秉天下为公的的原则，把民主权利交还人民，用民主方式解决任何有关军事政治纠纷。”并谴责美国“在抗战终了之日，竟以大量的武器，无限制的租借，以至采取直接行动，以助长我国内战，则势将成为中国人民的仇恨”。呼吁全国人民“对于当前危害国家的内战，须以一切有组织的力最，加以制止”。主张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由全国各党各派代表及社会贤达，根据国共两党会谈纪要，切实解决有关问题。

为了揭露国民党发动内战的实质，12月1日《中华论坛》刊出了《谈内战问题》的署名文章。认为共产党对和平民主是有诚意的，内战是国民党发动的。因为国民党把国家政权当作是党派的政治权力，而不顾人民的死活和国家的前途。文章最后号召，我们全国人民理当剑及履及地挺身而出，把内战之火及早扑灭下去。

二、为通过与维护政协决议而斗争

1946年1月10日，国民党同共产党经过谈判后签订了《停战协定》。同一天，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开幕。章伯钧作为民盟的代表，参加民盟代表团出席会议。在会议开幕式上，周恩来致词说：政协会议要商讨和平建国方案及国大宪法问题，要订出如何实现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及党派平等合法的方案。1月16日讨论“共同纲领”章伯钧发言说，“共同纲领”应定名为“和平建国纲领”，内容应包括改组政府、地方自治、人民自由权利、军事调整、党派关系等，应把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约法作为制定“纲领”的依据，同时要把中共和其他政党的政纲及各界人民的意见都拿来参考。会议争论的焦点，主要是军队和政权问题。国民党坚持必须先解决军队国家化，然后实行政治民主化。章伯钧发言告诫国民党：“莫要崇拜单纯的武力，轻视人民。对于国共之争，切莫在军事上打主意，最安全的道路，是走政治的途径。”1月30日，章伯钧向国民党政府提出，应当释放张学良、杨虎城。《中华论坛》针对政协会议中的争论，也发表了张云川的专论文章。文章说，没有真正的政治民主化，绝难达到军队国家化。要真正实现政治民主化，惟有国民党首先取消一党专政，建立联合政府，国民党的中央军首先化于国家。国民党不取消一党专政，中央军还是党军，仅片面要求共产党先放下武器。国家化就是缴械给国民党。这不但共产党无法也不应放下武器，即一切要求民主的党派和全国人民，也都不会同意共产党放下武器。

政协会议经过争论和斗争，在31日闭幕式上逐项通过了《政府组织问题的协议》、 《和平建国纲领》，《关于国民大会问题的协议》、《关于宪法草案问题的协议》， 《关于军事问题的协议》共五项决议。周恩来在闭幕式上致词表示，中国共产党拥护这些决议，并保证为这些决议的全部实现而努力。可是，决议的墨迹未干，国民党的顽固分子3月1日在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上就撕毁各项协议，宜称“执行决议就是国民党自杀的办法”，“决不能把统治权交给多党政府”。

解委会为投入维护政协决议的正义斗争，3月1日在香港创办了《人民报》，由丘哲任发行人，李伯球任社长。这个四开日报，一创刊就得到了中共的鼓励与支持，在创刊号上，周恩来题词是“人民之友”，董必武题词是“人民呼声”。报纸出版之后，一直围绕国内政治斗争的中心议题进行报道与评论，连续发表了《论国民党二中全会》、《政协所有协议不容任何修改》、《谁破坏政协会议的决议就是破坏统一和平》、《提高警惕，坚定信心》等社论，揭露和抨击国民党的种种倒行逆施，记载了民主与独裁，和平与内战斗争的一个侧面’受到人民的好评。为了更好地团结人民，开展斗争，《人民报》于4月1日由香港迁广州出版发行，大量报道了全国各地民主运动和中共东江纵队的情况，发表了对时局的看法，给人民群众很大的鼓舞。而反动当局则视为眼中钉，于6月29日查封了《人民报》。为坚持斗争，《人民报》易址改为周刊、半月刊继续出版。到8月间，又被国民党查封。

《人民报》在广州被查封停刊后，《中华论坛》半月刊于8月16日在上海复刊，以战斗的姿态重登论坛，旗帜鲜明地表明了对时局的态度与立场。谴责国民党“抛弃政协决议，拿武力来作尝试，违反人民利益，是全国人民的公敌”。“反对美军留驻中国和对华的军火侠应，助长中国的内战”。 1946年12月，国民党又以“查明再核”不予登记。《中华论坛》也被迫停刊。此后则改出《中华论坛丛书》，用小册子形式发行，继续发挥宣传斗争的作用。

三、在反对召开“国大”的斗争中经受考验

1946年5月23日，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由重庆到南京后，一方面对美蒋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一方面采取鼓励左翼分子，稳定中间分子，孤立右翼分子的方针对民主人士进行争取和教育工作。解委会负责人到南京后继续同中共领导入团结合作，受到了教育与鼓励。5月底，章伯钧在南京夫子庙邀集到达南京的解委会负责人和干部韩兆鹗、王人旋、王一帆、武思光等举行座谈会。鼓励大家复员以后要做好继续斗争的准备。他说，内战将不可避免地要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下去，共产党的军队将会向黄河以南推进，扩大战果。蒋介石虽然有美国武装起来的几百万军队，长期打下去，将以失败告终。随着当前局势的变化，国共两党以外的政治力量将进一步分化，有些人要到国民党政府里去做官，我们要继续同共产党密切合作，把民主革命进行下去。6月间，南方在时局动荡中出现了各种模糊思想，丘哲及时写信将情况告诉周恩来。8月5日，周恩来给丘哲复信鼓励说：“和平坚持，端赖各方协为，敝党仍当本和平民主独立之一贯方针，继续奋斗，誓为各方后盾。”

6月下旬，蒋介石公然撕毁政协决议和停战协定，发动全面内战，大举向解放区进攻。7月3日，蒋介石擅自决定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章伯钧当即发表《对召开国大的意见》，指出这是国民党一党独裁的国民大会，不是经过政治协商的国民大会。这样的国民大会，结果只会造成分裂的局面，我想各党各派是不会愿意参加的。章伯钧希望大家共同努力，扭转局势，挽救和平。

10月11日国民党军队占领张家口的当天，蒋介石下令国民大会11月12日如期召开。解委会负责人丘哲、严信民等连续发表文章，对蒋介石的一意孤行加以谴责和抗议，指出“国大不因中共和民盟之拒绝参加而如期召开，是为了加紧“合法化”的独裁。我们决不再容有一党专政和军事独裁。假若有人要毁弃政协五项决议，那就是自掘坟墓”。

11月5日，国民党一党包办的“国民大会”在南京召开，周恩来在南京举行记者招待会，散发了书面的《对国民党召开国大的严正声明》。19日周恩来等离开南京返回延安。解委会同共产党采取了一致行动，对国民党召开的“国民大会”一是坚决反对，二是拒绝参加，继续同共产党团结合作，为争取真和平真民主而奋斗。

四、恢复和健全地方组织

抗日战争胜利后，解委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为了发挥原有的组织作用，在组织上采取了同民盟既共同协作又单独活动的形式，着手进行组织复员工作。 1946年5月8日，章伯钧率领一部分干部由重庆飞抵上海，在愚园路联安坊11号设立中央机关。郭则沉代表中央留在重庆料理善后。

1946年重庆有党员一百余人，由黄朋豪、章培毅、周竟波成立重庆市工作机构，开展群众工作，参加民主运动。王寄一、张耀明、肖杰三在重庆海员工会利用其特殊关系，基本上掌握了民生公司和招商局所管辖酌二十多艘轮船，在船上发展组织，分别建立了二十多个支部，并组织海员为争取改善福利待遇进行斗争，取得了一定的胜利。

抗日战争刚结束，从各地陆续回到上海的党员共有二十多人，最初由中央委托郑太朴在上海负责联系。中央机关到上海以后，由连瑞琦、申葆文、胡淼年负责上海组织的工作，进一步联系党员，办理登记，发展组织，吸收了严北溟、夏高阳等一批骨干入党，随后正式建立了上海市组织机构。1946年下半年，丘哲、李士豪、杨子恒、王深林等陆续到达上海，加强了中央机关工作。 11月29日，解委会在上海举行邓演达殉难15周年纪念活动，邀请了各方面知名人士参加，出版了纪念专刊，借以扩大影响，加强反蒋斗争的气氛。

1946年夏季，在南京的党员王人旋、王一帆、韩兆鹗等数十人建立了南京市组织。利用党员中的军人，在国民党军队中秘密发展组织，配合解放战争进行策反工作。

1946年中央派仇岳希到温州地区联系原有党员，恢复了乐清、永嘉两县组织，发展了党员，主要在文教界开展组织活动，并同当地的中共游击队建立了比较密切的关系。1947年11月，乐清县刚入党不久的周醒迷因同游击队联系，被国民党密探跟踪绑架，12月被杀害。1947年2月，中央派除浪到诸暨地区集合党员重建组织，在枫桥镇设立了秘密联络点，并与当地中共地下组织建立了联系，在中共的帮助下，组织得到壮大发展，成立了绍诸临时工作委员会。至1948年5月，组织遭国民党破坏，被捕18人。

抗战胜利后．在江西各地一直坚持斗争的何世琨、何仲珉等陆续汇集到南昌，于1946年夏季奉中央指示建立了江西组织，负责联络各地“没有背叛行为”的党员巩固与发展组织的工作，同时发动党员和群众以“反对内战、反对分裂，保障人权、保障国权”为中心口号，开展政治斗争。

解委会在广东各地和香港地区坚持斗争的彭泽民、丘哲、李伯球、郭翘然、杨逸棠、曾伟、梅日新、陈伊林、杨建平等，他们一直把民盟南方总支的工作和斗争同解委会华南组织的工作和斗争，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为解委会广东和香港组织的巩固与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第四章　在民主革命的决战时刻易名中国农工民主党

第一节 反对内战反对分裂

一、第四次全国干部会议

1947年初，国内和谈陷于破裂，国民党在美国的扶助下加紧反共的军事进攻和制造假民主的欺骗；国共以外的政治力量发生了分化，有的已投入到国民党的怀抱；民主阵营中出现了标榜英美议会民主的“中间路线”，形势是十分严峻的。同时，解委会与民盟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即由盟内构成分子的地位变为盟外合作友党的地位。解委会必须调整和加强自己的组织，以独立的姿态为肩负的历史任务而奋斗。因此，在新的一年来到之际，决定召开第四次全国干部会议。

为开好“四干会议”，会前在上海举行了为期十余天的预备会议。会上对党的名称和今后的路线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关于党的名称，有的主张不改，有的提出改为社会民主党，有的要改为中国农工民主党。三种意见，都不是单纯的名称问题，而是各有不同的政治内涵。章伯钧等极力主张改称中国农工民主党。他们认为：根据邓演达的政治主张与革命的基本精神，党多年来的奋斗都是代表农工平民的私益；农民问题是中国民主革命的核心问题。农民是中国革命最广大的主力军，工人是中国革命最先进的阶级。必须把农民的革命要求与工人的最先进的革命意识和力量结合起来，作为整个革命的中心；农工民主与各被压迫阶层的民主是分不开的，农工民主不是农工民主专政，而是农民、工人与其他平民的联合民主。它表明中国的民主革命，不是欧美式的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而是进步的以社会主义为归宿的民主革命。这种意见，最后得到与会大多数人的认可，会议正式通过。

2月3日，解委会在上海召开第四次全国干部会议。出席会议有章伯钧、丘哲、李士豪、李伯球、郭则沉、张云川、王深林、严信民、韩兆鹗等四十余人。章伯钧作了党务报告；决定改党名为中国农工民主党（以下简称农工党）；通过了党的《章程)、《关于党的纲领、路线和基本方针的决议》和四干会议《宣言》；选举产生了中央领导机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章伯钧等25人当选为中央执委会委员，丘辰等9人为候补委员，彭泽民等10人当选为中央监委会委员，黄慎之等5人为候补委员。

2月15日，中央举行第一次执监委联席会议。讨论决定了“团结党员，扩大组织为中心”的工作方案；推选章伯钧、丘哲、罗任一、李伯殊、王一帆、张云川、王深林、郭则沉、李士豪9人为中央执委会常委；推选章伯钧为中央执委会主席；彭泽民为中央监委会主席，丘哲为执监联席会议秘书长。

这次会议，在农工党的历史上是一次“改造党、健全党、扩大党”的会议。会议决定：“要继承党的历史系统”，“以邓演达的《政治主张》为基本纲领”，“达成社会主义”；“要以农工平民及其他阶层中之觉悟分子作为党员的基本条件”，“代表农工平民的利益”；“党的政治路线自二干会议以来在共产党的指导下同共产党密切合作是正确的，应当继续贯彻”；“根据国内外政治条件的变迁和过去领导武装斗争的教训，党的基本方针是进行和平的民主的斗争，没有单独组织武装斗争的必要。”

农工党“四干会议”的召开，是从政治上、组织上和工作上确定了党的航向：继续跟着中国共产党，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

二、反对美蒋勾结加深中国的战祸

1947年元旦，国民党政府公布《中华民国宪法》。表明反动统治者要以穷凶投恶的办法来挽救危机。同时，毛泽东发表《新年祝词》，指出“国民党当局还没有表示任何起码的和平意图，他们在美国政府指使下，正在忙于以分裂的国大和独裁的宪法来装饰自己，以便使他们的战争和美国的援助合法化”。 2月3日，农工党在四干会议《宣言》中，也揭露国民党当局的假民主阴谋，呼吁全中国各阶层人民共起反对内战，抗拒帝国主义入侵，促成和平统一之实现。

3月9日，中共驻南京、上海、重庆的代表被迫全部撤回延安，和谈之门关闭。战祸正在加深。此时，美苏英法四国外长的国际会议在莫斯科举行，帝国主义者在会上狼狈为奸，对中国问题肆意干涉。农工党针对当时的国内国际情况，于3月12日发表《对时局宣言》，严正宣告反对内战，反对分裂；国共问题，政治解决；保障人权；保障国权；废除经济统治政策；反对列强任何形式的干涉中国内政，即刻撤退所有驻华外军，一切外国势力离开中国。

3月15至24日，国民党举行六届三中全会，决定改组政府。会议期间，胡宗南于19日进占延安。蒋介石得意忘形，悍然宣布4月18日改组政府，准备加强法西斯统治。可是，全国数十个大中城市的学生，在“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口号下，对国民党展开了波澜壮阔的斗争。4月12日，农工党留港中委彭泽民、郭冠杰、李伯球联合发表《我们对改组政府的意见》，指出国民党“改组政府”的把戏是在政治破产，人心尽去的时候以图挽救危机的举动。其结果必是造成长期分裂的内战'加深人民的痛苦。《意见》说，此次改组政府之日的，是在见信于美国的独占资本。实与袁世凯、汪精卫同出一辙。要求立即停止对在野党派分子之逮捕和杀害，立即撤去驻在国土上之美军，立即停止以一党武力消灭异己之内战。4月25日，农工党在国民党改组政府后发表声明，揭露了国民党玩弄的政治把戏的虚伪性与反动性。谴责它根本违反了政协决议的原则与程序，彻底破坏了政协道路。这种政府是买办、财阎、地主、官僚、军阀和政客等凑成混沌一团的政权，不能真正代表人民。

1948年3月29日至5月1日，国民党选举蒋介石为“总统”。农工党5月4日发表《声明》，指出国民党这次的“行宪国大”，是在贯彻戡乱到底、卖国到底的反动政策。假托行宪之名，内以欺骗人民，外以逢迎美帝，使其二十余年独裁统治合法化。《声明》说：“本党对蒋介石的反动统治，坚决进行不妥协的斗争。对此窃国卖国尤有甚于袁世凯、曹锟之总统，尤为深恶痛绝，反对到底！”

三、积极支持爱国民主运动

国民党在发动全面内战的同时，加强了对人民的统治与镇压，1947年上半年，由于粮价暴涨，穷人挨饿，几十个城市发生了抢米风潮。到5月间，爆发了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爱国学生运动。上海、南京、北平、天津等许多大学的学生宣布罢课，组织请愿和游行示威。5月20日，京沪苏杭学生在南京举行联合大游行。国民党对学生的爱国行动采取了“紧急处置”，出动大批宪警特务对学生横加殴击，伤学生百余人。农工党对这次南京“五二0”惨案，郑重发表文章，表示关切与支持，并于5月28日发起组织“妇女后援会”，募集捐款一千多万元慰问受伤学生，鼓励学生“团结起来，反对内战，反对迫害”。

7月，国民党颁布“戡乱总动员令”，国统区人民遭到了更加残暴的捕、关、杀，更加激起了广大人民3愤怒和反抗。10月26日，国民党特务非法逮捕了浙江大学于子三等3名爱国学生，3天后即将他们杀害。“浙大血案”又引起了学生“争民主，反迫害”运动的新高潮。上海农工党光华大学支部的党员在共产党的支持下联合上海各大学的学生，发动了反迫害的抗议大游行。

1948年1月底至2月初，上海同济大学学生和申新棉纺九厂工人为反迫害反饥饿而罢课、罢工。国民党出动大批军警宪持进行血腥镇压，造成了“一·二九”同济血案和“二·二申九血案”。由此激起了国统区学生、工人的英勇斗争。至三四月间，学生和教职员工的反迫害反饥饿斗争-又出现了新的高潮。农工党在南京中央大学、金陵大学、政治大学的党小组发动、联络学生参加爱国运动，同国民党展开斗争。农工党驻沪办事处在上海参加策动学生两万余人印发传单，举行反政府大游行。办事处发言人发表谈话，号召学生联合起来，坚持斗争．反对美国侵华，反对卖国政府。在香港的农工党负责人章伯钧、彭泽民、李伯球、王深林、杨逸棠、郭冠杰等对学生的爱国运动发表了《声援宣言》，对上海学生英勇抗暴表示钦敬，指责国民党的暴行是丧心病狂的举动。呼吁国人制止暴行，迅速消灭独裁，实现民主。5月间，农工党在上海大学里的组织积极配合共产党开展斗争，发动上海各个大学中学小学的师生，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抗议美帝扶日”运动。6月16日，农工党发表反对美国扶植日本的《对时局宣言》。指出当前政治局势严重的特点，是美国的扶日援蒋，使中国的战争性质，加重了反帝的意义。所以，反扶日反援蒋的如火如荼的爱国运动，反帝统一战线之加强与扩大，将是必然的趋势。《宣言》说，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和南京反动独裁的统治已到了最后挣扎的阶段。中国人民伟大的反帝爱国运动与民主和平运动必将取得最后的胜利。

第二节 为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而努力

一、“团结党员，扩大组织”

1947年，农工党按照“四干会议”确定的“以团结党员，扩大组织为中心”的工作方案，拟定了《整党扩党计划》，着手整理原有组织，进行党员登记，加速发展组织，建立组织机构，为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而斗争，具体做法是：一面清理已建立组织机构和有相当基础的地区，办理党员登记；一面促进一些地区创造条件，建立基地，吸收党员。在“四干会议”之前，已有基础的地区有上海、南京、江西、广东、浙江、四川、重庆、武汉8个省市；派出特派员建立基地的地区有安徽、江苏、福建、广西、云南、贵州等省和西北地区。

10月10日，中共中央发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提出联合各民主党派组成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建设新中国。农工党受到极大鼓舞，除了在国内加紧吸收党员，扩大组织，开展反蒋活动外，还派人到越南、菲律宾、婆罗洲、暹逻等地联络华侨。到1948年8月，全国能开展反蒋活动的，有上海、南京、重庆、武汉、港九；有四川省的成都、宜宾、涪陵等34伞县市；江西省的南昌、九江、吉安等33个县市；广东省的广州、汕头、梅县等26个县市；浙江省的杭州、温州、诸暨等16个县市；安徽省的安庆、芜湖等13个县市；江苏省的常熟、苏州、常州等11个县市；福建省的福州、厦门、泉州、漳州等14个县市；湖南省的长沙、岳阳、溆浦等10个县市；广西省的桂林、梧州等县市；湖北省的武汉市；山东省的济南市；台湾省的台北、台南、台中、基隆市。云南和贵州两省也有个别联系。在海外还有越南支部，由郑衡任主任，有党员94人，他们在越南团结华侨，支援祖国的解放战争。 在逼逻也成立了筹备处。

1947年10月27日，国民党政府非法解散民盟。加紧对民主党派进行镇压，农工党负责人章伯钧、王深林等于11月秘密到达香港．农工党中央机关由上海迁到香港坚道137号，一部分负责人仍留上海设立中央办事处，由丘哲任办事处主任。农工党在内地的活动，完全转入地下。

为便于指导各地组织的工作和斗争，1948年9月中央 扩大会议决定在中央统一领导下采取分区指导的办法：在上海设立以连瑞琦为主任委员的华东局，指导上海、南京、江苏、浙江、安徽、山东、台湾各省市的工作。在广州设立以杨逸棠为主任委员的华南局，指导广东、广西、港九和海外组织的工作。

分区指导大体确定后，中央组织部出版《组织通告》，内容有“组织教育”、“工作指示之检查”、“行动斗争之指导”、“经验教训之交换”、“批评与检查”等。中央宣传部出版《政治通告》，“宣传党的政治主张”、“报道国内政治形势”、“介绍民主运动情况”等。通过组织和政治《通告》，联系和指导国内外一百七十多个地方组织大约两万名党员进行革命斗争。

二、大力开展工农和青年工作

在“四干会议”上，农工党明确指出“要使觉悟的农工平民以及知识分子大量涌进党来，党已经临到了它的壮大和发展的新阶段。”

1948年下半年，农工党已在国19个省的153个县城建立了组织。主要是以“抗兵”、“抗粮”为号召，深入农村宣传、组织或武装农民群众，同地主恶霸、土豪劣绅和反动政府相勾结的反动统治进行斗争，从斗争中团结群众，发展组织。在大中城市，农工党通过“护厂斗争”打入工厂，在“反压迫”、“反迁厂”的口号下联系、团结、组织工人和职员、从斗争中吸收党员，建立基层组织。从1947年起，农工党为支持、配合爱国学生运动，各省市组织都加强了“青运”和“学运”工作，深入到上海、南京等大学、中学联系和团结青年学生，建立基层组织。 3月上旬，中共驻南京、上海、重庆的代表被迫撤回延安以后，许多爱国青年学生一时失去领导，经过一定渠道辗转同农工党取得了联系。6月1日，国民党当局在全国各大城市同时大举逮捕民主人士和爱国青年，被捕人数达两干多人，使民主运动团体暂时停止了活动。这给农工党联系和吸收青年学生提供了机会，如当时学生运动的著名骨干帅能应、廖少仪等就是在此时加入农工党的。

农工党大力开展工人、农民和青年学生工作，有效地发挥了作用，壮大了组织，党员中的工人、农民和青年学生占有很大的比重。如上海市的党员六干余人，其中工人占第一位，学生占第二位，农民占第三位，这三者的人数，占全市党员人数的三分之二。安庆党员中的工人人数占了70%。浙江、江西、湖南、广东、四川等省都吸收了大量的农民，党员中的农民人数约占70%以上。到解放战争后期，农工党实际上是农民、工人人数占有很大比重的组织。

三、响应中共“五一”号召。

1948年在蒋介石当选“总统”的“行宪国大”闭幕之日，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劳动节口号》，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中共发出的关于召开新政协会议的号召，得到各民主党派的热烈拥护。5月5日，彭泽民代表农工党，同其他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代表联合向国内外发出通电，一致响应。通电说，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密合人民时势之要求，尤符同人等之本旨。”“事关国家民族前途，至为重要。全国人士自宜迅速集中意志，研讨办法，以期根绝反动，实现民主”。同一天，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代表联合致电毛泽东，表示对中共的号召“曷胜钦企”。从此，农工党同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在共产党的支持帮助下，积极参加新政协运动，讨论有关召开新政协会议的各项问题，为结束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建立人民民主的新中国而努力。

6月间，农工党中央委员严信民由解放区抵达香港，带来中共的重要信息。他在农工党中央执监委会上说：民主党派要承认中共的领导权；要承认新民主主义为当前施政的最高原则；要承认人民解放军是中国惟一的圉家军队。农工党完全赞同这些原则，并宣传这些原则。 6月16日，农工党在反对美国扶日的《宣言》中郑重声称，历史证明，“民主、独立、统一的中国决不能从与反动统治妥协中得来；只有经过人民的革命斗争达到”。“本党全体同志，为促进人民民主政治协商会议之早日实现，应团结广大的群众进行战斗，与一切民主战友，携手前进”。

8月1日，毛泽东电复在香港的各民主党派及无党派民主人士：“五月五日电示，因交通阻隔，今始奉悉。”“诸先生赞同敝党的五一号召，极为钦佩。”“关于召集此项会议的时机、地点、何人召集、参加会议范围以及会议商讨的问题，都望诸先生及全国各界民主人士共同商讨，以卓见见示。”按照毛泽东的复电，农工党负责人章伯钧、彭泽民、丘哲等参加了对有关召开政协会议问题的讨论，并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第三节 迎接全国解放

一、举行中央扩大会议

1948年，农工党为了明确任务，调整斗争的策略方针以迎接新的战斗。月2日至11日，在香港举行中央执监委联席扩大会议。会议接受了章伯钧的政治报告，听取了组织部长王深林、宣传部长李伯球的组织和宣传工作报告。通过了《政治决议》和《组织决议》。

《政治决议》分析了国内外形势，指出实现人民民主，向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是世界历史也是也是中国历史的总方向；世界和平力量空前强大，美国的扩张政策和战争政策一定失败。应当树立“人民要彻底胜利”的信心。《决议》指明今后的具体任务，是彻底打败美国扶日援蒋的侵略政策，加速反动统治的崩溃。决定“本党应加紧团结南京统治区的农工平民大众，与解放军并肩进行坚决的革命斗争。”对统一战线中的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各少数 民族应加强主动精神，坚持团结合作。新的政协会议，要制定统一战线的共同纲领，筹备 产生人民的新政权，提出新民主宪章。《决议》严肃地批判了“自由主义者”所标榜的“中间路线”，并提醒“中间人士”，如果受不起战争严格的考验，过高估计反动势力，过低估计革命势力，幻想和平早日到来，则刚好是中了美蒋的阴谋诡计。

《决议》强调“我们与中共不仅是今天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战友，而且是建设新中国的长期合作者。”“要加紧团结国统区人民，放手发动人民参加武装，组织武装。必须尊重中共战友，按照实际需要，在武装斗争中统一指挥，巩固合作”。

这次中共扩大会谈的重要意义是确认“中国共产党是坚强领导的组织”，决定要同共产党“长期合作”。会议的一个重大变化，就是“四干会议”曾决议“本党已没有继续采取武装斗争的必要。”而扩大会议则决议要“放手发动人民参加武装组织”。这完全是顺应大局，以革命的需要为转移的。1948年初，章伯钧在香港接到毛泽东的“关于当前局势的声明”，提到解放战争的胜利结束将再需要3年至5年，进程是实行“三北”政策：先东北，次华北，再西北。在长江流域和东南沿海地区，邀请章伯钧、李济深、蔡廷锴等配合解放战争，开展军事运动，在蒋介石的军队中发挥作用。扩大会议之后，遵照由“中共战友统一指挥”的原则，又开展起了新的军事运动。

二、开展反蒋军事运动

从1948年冬季起，农工党从四个方面开展军事运动。

1．组织武装斗争。浙江的陈伟钦、方启东在中共金肖支队和浙东第六支队的领导与帮助下，建立了百余人的东盘大队，在当地进行反蒋斗争，最后解放了盘安县城。江西由傅肖先任总指挥的民主自卫军在九江、德安等十余县建立了有四千余人的部队，解放了修水、九江县城。解放九江时在黄老门一战，全歼该县的国民党武装，活捉县长曾庆螺和警察局长胡剑平，农工党九江县干部于灿烈在战斗中壮烈殉难。湖南由武思光任司令员，在湘西溆浦等县建立的“溆沅辰人民解放总队”，共三干余人，在肖劲光、曹里槐直接指挥下，在解放军一一三和一一七师的帮助下，同国民党军队经大小战役十余次，解放了湘西各县，武思光被任命为烟江公路警备司令。广东在北江、兴梅、惠东宝、广州、潮汕五个地区，分别由黄桐华、李通昭、周世杰、梅日新、黄平领导的五支游击队约三千余人，与中共地方游击队密切配合，同国民党军队战斗到广东解放，黄桐华还被中共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粤赣边区先遣支队司令员"。广西由郭一坤建立的约百余人的富川游击队进行抗兵抗粮斗争，同国民党反动统治者周旋到解放，四川由彭大元在三台、中江、南充等县建立川北农民自卫军约百余人，同当地的反动政府、地主等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在瓦解逃窜的国民党二警总队的战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缴获步枪千余枝，大炮10门，大批军用物资，获得辉煌战果。

以上各支武装都同中共有联系。在当地解放后，分别接受了人民解放军的改编。

2．进行策反工作。策反国民党的军政人员起义是在解放战争形势大好的情况下进行的。从1948到1949年，农工党运用各种社会关系穿针引线进行策反收到成效的，自团长、县长及至军长、省主席，如邓健中、祝更生、吴化文、方师岳（安徽省保安司令代省府主席）等共二十多人。有的在起义之后，如李洁之、魏鉴贤、练惕生、祝更生等还加入了农工党。

3．破坏蒋军作战。农工党的党员隐蔽在国民党的统治区，利用各种关系在国民党军队中采取“抠出来”、“打进去”的办法，破坏国民党军的战斗力。江苏江湖要寨炮台台长吴钟奇，他的任务是防止解放军渡过长江。农工党党员范之超利用同学关系，经过交往吸收吴加入了农工党，到战斗的关键时刻，他率部起义了。在解放西南的战斗中，农工党动员党员刘宗宽接受国民党重庆行营代参谋长的任命。刘到任以后，让二野派来的联络员房显志住在家里，通过房显志同二野司令部保持密切联系，一举全歼了国民党留在大陆的残部，整个大陆完全解放。在解放大西南的庆功会上，刘伯承司令员嘉奖刘宗宽是“解放西南第一功”。

4．收集军事情报。为了探悉敌情，农工党尽量调动隐蔽在国民党军事部门的党员收集了大量的重要军事情报。如：“广州绥署”的兵力部署情况和作战计划，“国防部”的作战计划，长江江防工事和兵力部署情报，国民党在复兴岛高级军事会议的决议等等。所有收集到的情报，都从香港及时地转给了共产党。

三、在第二条战线发挥特点和优势

1949年2月12日农工党中央向各地组织发出指示：1．大力开展城市组织工作和民主运动；2．掌握地方人民武装；3．策反国民党军人起义；4．扩大宣传，安定人心，保护一切地方公物、资产、财物；5．组织城乡人民迎接解放军战斗。《指示》下达以后，各地组织都把“迎接解放”作为动力，积极贯彻执行。尤其在江南和沿海各省市组织，普遍开展了“三护”（护厂、抢仓、护校）、“三保”（保住公共设施、公共资材、公共财物）、“三支”（为解放军修桥修路、筹粮筹草、送鞋送伞）、“三劝”（劝工商业者不去香港、国民党官员不逃台湾、公务人员坚守岗位）活动，做出了显著的成绩。

农工党华东局为保护工商业和调查官僚资本，专门成立了以连瑞琦为部长的工商部，向工商企业界宣传解放军的政策。在有农工党组织的工厂如中纺等5个工厂，发动工人进行了“反南迁反破坏”斗争，将这些工厂完整地保留了下来。最突出的是对国民党联勤总部上海被服总厂及其沪北分厂的护厂斗争。该厂是规模庞大、由特务警察严密控制的军需工厂。农工党通过打进厂内，团结工人，发展组织，建立了一支强大的护厂力量。上海临近解放时，国民党强行迁厂，全部机器拆运到了黄浦江边，正要运往台湾。厂内的农工党员带领六百多工人追赶到码头将全部机器押回厂来，把总厂和分厂完整地交给了人民。在武汉也组织了护厂斗争，将裕华纱厂等工厂保留下来。

江西、浙江、南京等地组织的护仓斗争，成绩比较显著，在这些省市，都保护了一些较大的军火仓和粮仓，军火仓内储藏有大培的枪支、大炮等武器弹药，粮仓仅以赣北赣东保护的数十间仓库储粮，就达五百多万公斤。

武汉市组织为护校斗争，成市了护校防护团，发动农学院、医学院的师生员工不离开学校，阻止学校南迁。南京政治大学的农工党员也串联鼓动学生进行了反迁校斗争。

为防止敌人破坏，农工党各地组织都进行了“三保”工作。中央银行福州分行正要将所存金银、外币、银元等运往台湾时，农工党及时派人策动该行经理和会计主任设法拖延启运，使敌人在仓皇出逃时未及带走。还策动福州警察局长保住了电灯公司。在芜湖，农工党组织工人维护了电讯局、电灯厂、自来水厂、纱厂、面粉厂等。上海市农工党争取虹口区区长保全了区政府的资产和档案；还策动上海银行分会秘书长将银行、钱庄的财物登记造册以待解放。

为配合解放军进军作战，农工党地方组织组织物力人力进行拥军支军活动。在江西赣地地区，共支援杉木3582根，石灰575担，修桥保桥14座，军粮250万公斤，柴草225万公斤，还有大量的蔬菜、军鞋、雨伞、担架、木船。福建在解放军进军厦门、鼓浪屿时，农工党在石美、东美、石码等地共征集木船400余只，汽船10艘，民工和技师数百人，支援解放军渡海作战。

解放战争期间，农工党浙江、南京组织，同中共浙东军区和苏北游击队都建立了密切联系，为解放区购买武器、弹药、医药等军用物资，输送青年学生、知识分子等各方面的人才。

为了安定人心，稳定社会秩序，农工党各地组织散发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宣传解放军的政策，并有目标地进行个别人的工作。在上海，对元亨五金号等5家较大商号的老板分别进行宣传和劝说工作，使他们改变了去香港的想法，留下来迎接解放，纸张批发商朱老板把在香港的大量存货运回到上海。对大工商业者的工作有了效果，也影响了一些中小工商业者，使他们安心迎接解放。此外，上海还有修造厂厂长，警察分局局长，市财政局长，高等法院检察官，区长，以及准备经沪逃台的国民党官员等，经农工党对他们宣传政策，耐心劝说之后，也都放弃了去台湾的打算，留下来等待解放。

第四节 为升起五星红旗做贡献

一、参加召开新政协的筹备工作

1948年秋，新政协由讨论到实际筹备的阶段，共产党邀请并精心安排在香港的民主人士分批北上进入东北解放区，章伯钧同沈钧儒、谭平山、蔡廷锴4人于9月29日第一批到达哈尔滨。11月，彭泽民、丘哲也从香港到达东北。 11月下旬，中共同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就关于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原则、参加者、时间和地点诸问题进行商榷，达成一致协议。

1949年元旦，毛泽东发表《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献词。到解放区的农工党负责人章伯钧、彭泽民、丘哲、严信民、韩兆鹗和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代表都认真学习讨论了毛泽东的文章，于1月22日联名发表了《我们对时局的意见》，庄严宣布：“愿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献其绵薄。”并表示“革命必须贯彻到底”。这就为筹备召开新政协会议作了政治上和思想上的准备。

1月15日，农工党中央发言人“响应中国共产党领袖毛泽东先生《关于对时局声明》发表谈话”，认为毛泽东先生提出的和平谈判的八项条件，也代表了全国人民全国各民主党派一致的要求。发言人说，反动派一天没有放下武器，就必须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歼灭之。这也是今天各民主党派和全国人民的共同任务。

1月24日，章伯钧、彭泽民、丘哲联合发表《为南京政府制造和平阴谋的书面谈话》，指出蒋介石元旦发表的声明，和“行政院”19日宣告无条件停战的决议等一系列的欺骗行动，是蒋美一贯串演的伎俩，今天中国人民决不会再上当。中国共产党毛泽东先生1月14日提出的八项和平主张，就是全国人民的共同要求，是实现中国永久和平之惟一的办法。我们须切实明了南京伪政府所要制造假和平的真相，要随时随地地揭发奸谋，予以严重的打击。

2月25日，章伯钧、彭泽民、丘哲由沈阳抵达北平。 6月15日，新政协筹备会正式成立。15至19日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筹备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和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彭泽民、郭冠杰、季方、韩兆鹗、丘哲五人代表农工党参加筹备会，分别参加“拟定参加会议之单位及其代表名额小组”、“起草政协会议组织法小组”、“起草共同纲领小组”、“起草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小组”和“起草宣言小组”的筹备工作。

二、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隆重开幕。代表农工党出席会议的代表有彭泽民、郭冠杰、李士豪、何世琨、杨逸棠、张云川、郭则沉、王深林、严信民、杨子恒10人，候补代表有王一帆、李健生（女）两人。还有代表华东、华南、西北解放区的代表季方、李伯球、韩兆鹗3人。特邀代表黄琪翔1人。章伯钧、丘哲怍为民主同盟代表出席会议。会议期间，章伯钧、彭泽民均为主席团成员。

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在热烈的掌声中致开幕词。他说：“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我们的革命工作还没有完结，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运动还在向前发展，我们还要继续努力。”“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是保障人民革命的胜利成果和反对国内外敌人的复辟阴谋的有力的武器，我们必须牢牢地掌握这个武器。”会议六个分组委员会的委员中，郭冠杰为政协组织法草案整理委员会委员，严信民为共同纲领草案整理委员会委员，王深林为政府组织法草案整理委员会委员，彭泽民为宣言起草委员会委员，李士豪为国旗国徽国都纪年方案审查委员会委员，他们都参加了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和成立中央人民政府的实际工作。

9月24日，彭泽民代表农工党在大会发言。首先对共产党对毛主席表示了拥护的诚意。彭泽民说，共同纲领、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这三个历史性、创造性的文件，是中国人民共同遵守的建国方针，是中国共产党、毛主席根据马列主义指导理论和中国历史、社会实际情况，以及数十年来的奋斗经验相结合制造出来的。我们愿协同全国人民，各民主党派，各社会阶层，各少数民族及海外华侨，一德一心，接受这三大文件，并促成其彻底实现。

政协会议9月30日胜利闭幕。章伯钧、郭冠杰分别当选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常委、委员。章伯钧、彭泽民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

三、举行四届二次执监委联席会议

1949年10月中旬，农工党中央机关由香港迁到北京市鼓楼辛寺胡同14号。 10月25日至11月9日，农工党为“检讨过去，整理党务，传达人民政协会议精神”，在北京举行四届二次中央执监委员联席会议。会议通过反复讨论和发扬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精神，对建党以来的基本政治主张和实践进行了严肃认真的检讨，指出：“过去认为中国革命实质上是以农工为中心的平民革命，因而在建党初期，没有认识到工人阶级领导的伟大意义，这是一个残酷的教训；过去所标榜的社会主义，始终是一个概念，而且也没有指明是在马列主义理论基础上的科学社会主义。20年来，可以说没有走错路，没有向蒋介石投降屈服，始终是跟着中国人民走；在工作上总算有一部分表现。”

会上何仲珉对准备提交第五次全国干部会议审议的两个文件草案做了起草说明。他说，《关于整理党务的报告》，规定每个地方组织在当地解放之后，即须遵照中央指示，停止吸收党员，着手整理组织，淘汰不良分子，提拔进步分子。《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对原来的党章作了重大修改。删去原来党纲的部分，改为“应当毫无保留地接受人民政协共同纲领为党的基本纲领”。

会议认识到，新的历史要求农工党应有健全的肌体。所以，及时整理党务是为纯洁组织的需要，为维护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需要。

会议作了《拥护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决议》，认为这个纲领是百年来中国革命斗争经验的总结，也是全国人民意志和利益的集中表现。“这个纲领也是本党的政治纲领，奉党当尽力为这个纲领的实现而努力”。

这次会议标志农工党在民主革命时期艰苦曲折历程的结束，也为召开第五次全国干部会议作了必要的准备。在民主革命时期的各个阶段，有许多党员遭到国民党和日本侵略者的逮捕、关禁和酷刑；还有不少党员在反蒋斗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剿匪反霸中献出了生命。这些壮烈献身的同志，有党的创始人邓演达，有党的干部和党员曾伟、王守先、虞键、李义荣、章培毅、沈德尊、边美棠、何华昌等共一百多人，他们都是中华民族的英雄，都是可歌可泣的烈士，农工党永远不会忘记他们。

第五章 为实现《共同纲领》而奋斗

第一节 决定接受共产党领导和整理党务

一、第五次全国干部会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历史开辟了新的纪元。农工党的地位发生了根本变化，从被压迫的地下党成为参加人民政权和参加国家建设的一个民主党派。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为了“确定自己的前途，明确今后的任务”， 11月14日至26日，农工党在北京召开第五次全国干部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四届中央执行委员、监察委员、执监候补委员和各地选出的代表章伯钧、彭泽民、黄琪翔、季方、郭则沉、严信民、王深林、张云川、何世琨等99人。会议以学习为主，中心任务是传达学习政协文件，讨论整理全国党务。章伯钧在会上作了《政治报告》，总结建党以来的主要成绩和教训。会议之初，一部分代表提出农工党应该“光荣结束”，理由是农工党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只能有一个共产党，不能多党并存。多数人不愿意取消组织，只是消极等待最后做出决定。争论被共声党知道后，周恩来于22日上午邀请章伯钧、彭泽民、季方、郭则沉举行座谈，对农工党的前途、任务和作用初步交换了意见。下午，周恩来来邀集全体代表作了重要讲话。讲话从中共和农工党的历史比较说起，肯定农工党是一个有革命历史传统的政党，在革命困难时期作过不屈不挠的斗争，革命胜利之后，也还有他的历史任务，不能让他“无疾而终”。讲话语重心长、肝胆照人，对全体代表都是一次生动的统战理论和政策教育。代表们反映：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农工党同共产党风雨同舟数十年，今后也还要同共产党一道继续奋斗，这是历史的要求。农工党有责任团结帮助广大党员及所联系的群众共同进步，为人民服务，这是一个相当长期的任务。大家在思想认识上有了提高，为开好这次会议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会议期间，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接见了与会全体代表，勉励民主党派要过“三关”，过好战争关、土改关、社会主义关。代表们都受到了极大的鼓舞。

会议通过了有关政治、组织和共作的决议。《政治决议》的重点是：“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必须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思想教育全党同志”；“我们即以《共同纲领》为本党的行动纲领”。《组织决议》的主要点是：“停止吸收党员，发展组织，继续切实进行全国党务整理。”“工人、农民、学生的一切群众组织，应立即鼓励和帮助他们分别参加工会、农会、青年学生团体等全国统一领导的组织，接受统一领导，停止党的组织关系”。“在全国党员代表大会未召开前，暂以全国干部会议为本党最高权力机关。闭会期问，其职权由中央执监委员会行使之”。

会议选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章伯钧、黄琪翔、季方等23人，候补委员何仲珉、丘辰等7人；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彭泽民、韩兆鹗等8人，候补委员黄慎之等3人。

会议通过《宣言》，表示“今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应努力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努力于新民主主义的建设，为彻底实现人民政协《共同纲领》而坚决奋斗。并要团结全党同志，接受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实行自我改造”。

12月17日，举行五届一次中央执监委员联席会议，推选章伯钧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彭泽民为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黄琪翔为中央执监联席会议秘书长。

一、参加人民政权

1949年10月1日，中国成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按照《共同纲领》规定：“中国人民民主专政是以中国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政权，而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地区、人民解放军、各少数民族、国外华侨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代表所组成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就是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

新中国成立后，农工党成为人民民主专政政权的参加者，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同共产党一起担负着管理国事和建设国家的历史重任。在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系统、各大区以及省市行政机构中，都有农工党党员担任实际领导职务。 10月22日政务院宣告成立，章伯钧任政务委员、交通部部长、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彭泽民任政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黄琪翔、郭冠杰、郭则沉任政治法律委员会委员。季方任交通部副部长。韩兆鹗任人民监察委员会委员。随后，作为政务院领导地方政府工作的代表机关、各大军区政委会相继成立，黄琪翔、丘哲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黄兼司法部长），罗任一、周太玄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韩兆鹗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王深林任山东省政协副主席。

在江苏、浙江、安徽、江西、广东、广西、四川等省，有一批党员担任了省政府委员和司、局、厅级领导职务，还有一批党员担任了省辖市的副市长、政协副主席。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接受共产党领导，努力学习，勤奋工作，为新中国恢复经济、发展建设和巩固政权，做出了良好的成绩。

三、进行党务整理

农工党为了纯洁队伍，健全组织，“五干会议”做出了整理党务的决议，规定“以《共同纲领》和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立场作为团结的基础，以新民主主义的思想作为团结的中心，从思想上组织上进行整党工作”。

1949年12月17日，农工党五届一次中央执监委员联席会议，决议废止中央常务委员会和中央政治会议，推选章伯钧、黄琪翔、彭泽民、季方、郭则沉、郭翘然、严信民、王深林、李士豪、何仲珉10人成立中央工作委员会，作为中央工作机构，由章伯钧、黄琪翔任正、副主任委员，领导全党的整党工作。地方各级组织从1949年底起相继成立整委会的有：北京、上海、南京，重庆、成都、芜湖、广东、广西、福建、浙江、湖北、湖南、江西、江苏、香港1 5个省、市和地区以及57个县级组织。各级整委会传达了中央“五干会议”精神，做出了整党的具体部署，对党员进行审查，重新填表登记。到1950年上半年，各地党员中的工人、农民、青年学生以及在军事部门工作的党员，都分别移交到工会、农会、青年学生团体，转移了组织关系；有98人停止党籍，90人开除党籍。 1950年10月，整党工作基本完成，全党原有党员两万多人，经过整党，核准登记的为1865人。

四、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全党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引导全体党员参加改造客观世界的伟大实践，必须推动党员进行主观世界的改造。所以整党工作在全党开展一个学习运动，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进行政治理论教育。“五干会议”指出：“农工党建党以来，在主观上历史负累过重，没有彻底做到改造党员的思想生活”。为了适应工作和生活的需要，在建国以后，各级组织都坚持一周一次的组织生活，把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组织生活的主要内容，集体阅读讨论，互相切磋琢磨。通过学习，开始接触了新的理论知识，政治水平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

1950年3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全党全军进行大规模整风运动的指示》。农工党响应中共的整风运动。于9月25日发出《关于整顿党的思想作风的指示》，要求全党要以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来进行一次党内整风。决定：“1．以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今后教育全党的方针，以参加新民主主义建设，实行《共同纲领》，最后达到社会主义的实现，为全党同志努力的方向；2．整风的目的是在首先改造领导干部的思想想作风，严肃纪律，加强全党的团结；3．整风要有步骤有领导有准备的进行，第一步以中央及各省市的领导干部为主要的整风对象，次及一般干部。先学习基本文件，联系思想，检查工作，总结经验，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为了把理论学习经常化并逐步深入下去，12月中央学习指导处创办了《学习通讯》月刊，作为反映学习情况，交流学习经验，指导学习深入的党刊。各省市组织也分别创办了类似的期刊，如北京有《京讯》，上海有《沪讯》，广东有《粤讯》，江西有《学习与工作》等等，这些刊物的出版，加强了对学习的指导与交流。

第二节 为恢复经济和巩固政权而努力

一、拥护恢复经济和反对美帝侵略

1949年12月4日，中央人民政府第四次会议通过了《1950年全国财政收支概算和发行人民胜利折实公债的决定》。农工党于1950年1月10日，发出了《为拥护中央人民政府通过的1950年全国财政收支概算和发行人民胜利折实公债告全体党员书》，说明中央人民政府通过的这个决定和财政都公布的发行胜利折实公债的办法，是中央人民政府为支援人民解放战争，迅速统一全国，恢复和发展经济，平衡收支，稳定物价，安定人民生活的重要而英明的措施。号召全体党员坚决拥护这个财政收支概算，保障其100％的实现。并以身作则，先行踊跃认购公债，积极向人民广为宣传，努力推行公债，争取提前完成公债的销售任务。

文告发出后，许多党员积极响应中央号召，节省开支，认购公债。有的地方还开展了增产节约，购买公债的竞赛活动。为恢复国民经济，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的基本好转，做出了贡献。

1950年5月14日，首都各界隆重集会，举行保卫世界和平签名运动大会，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要求禁止原子武器。彭泽民代表农工党在会上发言，表示拥护开展保卫世界和平签名运动。6月2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声明》，宣布美国出兵朝鲜，美海军第七舰队巳奉命向台湾海峡出动。 6月28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第八次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号召全国和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帝国主义的任何挑衅。章伯钧在会上说，美国政府的挑衅，只能引起中国人民的更大愤怒，全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应更加团结起来，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挑衅。

8月1曰，首都隆重举行“八一”建军节大会。彭泽民在会上发言，表示要为保卫祖国，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解放台湾，维护亚洲及世界和平而奋斗。

二、加土地改革运动

1950年6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一届二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会上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土改法草案》，刘少奇作了《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章伯钧在会上发言说：“我代表中国农工民主党对于中国共产党所提出的土改法草案和刘少奇副主席在大会上所作的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表示彻底拥护和无条件接受”。 6月14日，农工党出席会议的委员章伯钧、黄琪翔、郭冠杰联名提出的《建议民主党派参加土改工作案》获得通过。 7月22日，农工党中央发出了《关于党员参加土地改革工作的指示》，说“实行中国土地革命，是我党基本的政治主张，为全党同志一贯奋斗的目标”。“现在即将参加土改的实际工作，是实现‘五干会议’决议的团结、学习、改造和提高这一正确方针的具体途径。各地党员，应本着自愿原则，踊跃地分别参加各地区土改工作。凡参加土改的同志，须进行学习和准备，并须服从工作纪律，注意工作态度，工作完毕后，应即总结经验，报告所属党部”。各地党部接到指示后即召开党员大会，宣布中央指示，广大党员对土她改革都表示拥护，并踊跃申请参加土改。陆续被批准参加土改的有中央机关、北京、浙江、福建、上海、南京、芜湖、湖北、广东、江西、广西、苏南、长沙、重庆等地的干部、党员共367人。他们分别到浙江、河南、江西、苏南、四川、湖北、广西等省农村，为彻底消灭封建剥削制度战斗在最前线。

在土改运动中，凡参加土改工作的党员，表现都比较出色。总的收获是“感到提高了思想认识，锻炼了革命意志，加深了阶级观念，体验到群众力量”。他们说：“人民政府已经得到了几亿农民的拥护，这是任何力量都无法撼动的，新中国是铁打的江山”。有些同志成绩突出，受到了当地中共县委的表扬，记大功等。

土改是一场推动中国历史前进的伟大运动，是一场急风暴雨的阶级斗争。农工党在这次运动中，清除了混入党内的坏人24人。传达了参加土改的体验，教育了全党。所以，土改运动对农工党来说，是锻炼了干部，教育了党员，纯洁了组织，取得了进步。

三、参加抗美援朝运动

1950年6月25日，美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侵朝战争，战火直接威胁列我东北边境。6月30日，农工党发表《美帝强盗的命运将和希特勒一样》的声明，谴责美国是破坏世界和平和侵略亚洲人民和国家的挑战者。9月30日，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就朝鲜问题发表严正声明，警告美国侵略者：“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彭泽民代表农工党发表文章，响应周恩来的声明。提出“美帝国主义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敌人”。“我们要加紧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旗帜下，制止美帝国主义的侵略，保卫世界和平”。11月4日，由中国共产党领衔，农工党和其他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联合发表了《关于抗美援朝的联合宣言》，庄严宣布：中国各民主党派誓以全力拥护中国人民的正义要求，拥护全国人民在志愿基础上为着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神圣任务而奋斗11月20日，农工党中央向全党发出《关于为完成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任务的指示》 ，提出：“把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作为全党目前的中心工作”。要求“大力推动党员踊跃投入参军和捐献运动。”围绕抗美援朝这个中心，全党开展了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宣传教育活动，各地组织分别举行报告会、座谈会、控诉会等。

7月，农工党中央成立了以彭泽民、黄琪翔为正、副主任委员的“抗美援朝捐献委员会”，为捐献“中国农工民主党号”飞机1架开展了全党捐献活动。在捐献活动中，黄琪翔、郭秀仪夫妇捐出了在南京、桂林的西式楼房两座。各地党员纷纷捐钱捐物，连中央机关的12名勤杂工人也捐出人民币87万元。到1951年10月止，据不完全统计，全党共捐献人民币21587.1万元，还有金银首饰、手表及其他贵重衣物等。

各地方组织有一批党员如凌家传等获准参加人民志愿军，随军赴朝作战。各级组织的负责人如张云川、李健生、丘克辉、程作谋等，参加了中央或地方的赴朝慰问团，到朝鲜前线慰问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

1952年春，美国侵略者在朝鲜战场使用细菌战，并在我国东北地区施放带菌昆虫。3月8日，共产党和农工党、各民主党派联合发表《对于帝国主义进行细菌战的抗议》。章伯钧代表农工党发表文章，呼吁“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为粉碎美帝国主义的细菌战而斗争”。

在反对美国施放细菌的声讨声中，农工党各级组织都举行座谈会、报告会、声讨会，揭露和谴责美帝国主义的滔天罪行，广大党员从反面受到一次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见识了“美国文明”。正在黑龙江医科大学学习的农工党员陈泗才，积极参加了当地政府领导的反细菌战的实际斗争，当敌机在北安县上空撒下数十种带菌昆虫时，他在现场进行灭虫防疫工作，趴在地上寻找带菌昆虫四十多种，做出了突出的成绩。

四、参加镇压反革命运动

1951年2月21日，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镇压反革命运动是肃清国民党反动派在大陆上的残余势力，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一场伟大斗争。章伯钧于25日发表《拥护惩治反革命条例加强党的工作》的文章，提出“要把镇反运动同整党工作结合起来”。认为“战胜反革命的一切活动，就要从整肃组织，健全组织，巩固组织做起”。这次镇反运动，在民主党派内部是采取学习的形式，要求领会政策，在提高认识的基础上认真检查思想，交代历史。 7月23日，农工党同各民主党派联合发布《关于临时学习委员会工作的联合指示》，农工党根据《联合指示》，制定了《中国农工民主党临时学习委员会组织办法》，由彭泽民、黄琪翔、季方、严信民、何仲珉、郭冠杰、张云川、王人旋、李健生（女）9人组成农工党临时学习委员会，彭泽民任主任，季方、严信民任副主任，黄琪翔任秘书长，组织领导农工党各级机关干部和参有参加国家机关工作的党员进行“忠诚老实”的学习，在提高认识的基础上，通过填写履历表，写自传，检查交代历史，进行一次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教育；同时要求各地方组织因地制宜，采取各种办法和形式．组织干部和党员进行学习。通过这次学习，广大干部和党员都提高了政治觉悟，分清了敌我界限，卸下了历史包袱，进一步纯洁了组织。如广东、福建、浙江、湖北、重庆、苏南、江西、上海、北京、湖南、南京等省市组织，都清除了不良分子。

在这次运动中，由于中共中央、公安部和中共江西省委、省公安厅的大力帮助，农工党终于将出卖邓演达之后隐藏20年之久的叛徒陈敬斋捉拿归案，并经北京市军管会军事法庭审判。

第三节 贯彻人民政协的三大任务

一、第六次全国干部会议

1951年秋季，农工党各地的整党工作已经基本结束，取得了重大的成绩，组织机构陆续从整理委员会改为工作委员会。为了总结“五干会议”以来的工作，确定党在新形势下的政治任务和发展组织的计划，11月20日至12月3日，农工党在北京召开了第六次全国干部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五届执、监委员，候补执、监委员，各地推选的和中央特邀的代表章伯钧、彭泽民、黄琪翔、季方、周谷城、徐彬如等82人。会上严信民作了《政治报告》，季方作了《党务报告》，王深林作了《修改党章报告》；通过了关于《政治报告》、《党务报告》、《党章》、《政协一届三次会议的传达报告》和《发展组织》的各项决议；调整了中央领导机构，合并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为中央委员会，原中央执、监委员为中央委员，候补执、监委员为中央候补委员，增选周谷城、徐彬如、刘春、夏康农为中央委员，六届中央委员有章伯钧、彭泽民、黄琪翔、季方、严信民、王深林等33人，中央候补委员有丘辰、李健生（女）等8人。

12月5日举行六届一中全会，推选章伯钧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彭泽民为副主席。决定成立中央执行局，选出章伯钧、彭泽民、黄琪翔、季方、刘春、徐彬如、郭冠杰、李伯球、王深林、郭则沉、严信民、何世琨、张云川、王人旋、李士豪15人为中央执行局委员。

农工党“六干会议的中心任务是“继续抗美援朝，开展增产节约，进行思想改造”，并为继续完成镇压反革命和土地改革而努力。会议的《决议》说：“完全接受并一致拥护政协全国委员会的各项报告和决议，并将毛主席在会议中所指出的三大中心工作：继续加强抗美援朝运动，提倡和推动爱国增产节约运动，广泛开展思想改造运动，定为本党当前的三大中心任务，并为完成三项中心任务而奋斗。”

会议通过了《关于发展组织的决议》。说明“本党经过整理，经过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大运动的锻炼，已具备了发展组织的必要条件。决定进一步联系和团结广大的城市小资产阶级，加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学习，以改造自己，提高政治水平，为完成新民主主义建设并走向社会主义而奋斗”。“发展组织必须从革命的实践中和国家建设的实践中去发现、培养和吸收小资产阶级中的积极分子。发展组织必须与巩固组织相结合。要有计划有重点地在大中城市发展。发展的对象应依据现有基础，基本上以中下级的公教人员、专家、技术人员、小工商业者为主，同时向经济建设部门作试行发展。在军事、情报、外交等单位不发展党员，不进行组织活动”。

二、参加“三反”、“五反”运动

1951年11月，全国政协召开一届三次会议，决议“继续加强抗美援朝运动，提倡和推动爱国增产节约运动，广泛开展思想改造运动”。会上，彭泽民代表农工党作了“为完成抗美援朝增产节约而奋斗”的发言。他说：“中国农工民主党愿为实现毛主席的伟大指示而继续努力，把思想改造运动和抗美援朝、国家建设运动、爱国增产节约运动结合起来，从这些实际的行动中来进行我们的思想改造”。12月22日，农工党中央执行局会议通过了《关于贯彻执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一届三次会议所决议的三项中心任务的决议》。决定“在党内继续加强抗美援朝运动，推动爱国增产节约运动，开展思想改造运动”。要求各级组织立即组织党员学习有关增产节约的文件，在党内成立节约检查委员会，结合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订出计划，切实执行。

各地组织遵照中央《决议》，分别作了开展“三反”运动的动员报告。北京市成立了以彭泽民为主任委员、王寄一为副主任委员的节约检查委员会，制定了开展“三反”运动的实施计划。全党的“三反”运动，从北京市组织开始拉开了帷幕。

1951年12月27日，农工党中央发出了《关于执行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指示》，指示各地组织结合当地具体情况，拟订实施计划，积极开展工作。号召每个党员在运动中起骨干带头作用，随时随地坦白自己，检举别人，结合思想改造运动，深入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各地组织按照中央《指示》精神，陆续成立了节约检查委员会，有领导有计划地开展“三反”运动。1952年2月11日，农工党中央执行局通过了《关于推进并深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指示》，指出“三反运动”是在实践中开展思想改造运动，是一种史无前例的民主改革运动，我们必须当做一种阶级斗争的政治任务来完成，并在这一运动的革命实践中得到教育和提高。要求“对每个有工商业活动和有投资股份的，以及在国家机关工作的党员，都要提也具体的要求；每个党员在共产党领导下，要积极参加工作，带头检讨，保证胜利完成任务”。从此，地方组织都加强了对运动的领导，采取依靠群众，全面检查，重点突破的办法，很快打开了运动的新局面。全党的运动进程约3个月，从浙江、福建、江西、广东、上海、南京、芜湖、长沙、重庆、湖北、北京、广西12个省市组织的报告统计，运动中查出“有问题的”244人，贪污百元以上的108人，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3人。贪污数字最大的达10亿元人民币（运动中畏罪自杀）。被逮捕法办的有12人。

通过“三反”、“五反”运动，很多党员批判了资产阶级的腐朽思想，初步划清了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思想界限，加深了对工人阶级领导的认识。机关的不良风气有了好转，不应有的浪费现象得到克服，有些领导人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作风有了改变。

三、参加爱思想改造运动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上提出：“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种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现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 1952年6月11日，农工党中央执行局会议通过了《关于开展全党思想改造学习运动的决定》，要求各级组织一律成立学习委员会，“在当地政协学委会领导下负责领导组织全体干部和党员的思想改造学习工作”。规定“应以学习理论，学习政策为主，联系实际，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 9月1日，中央又向全党发出《关于学习共同纲领的指示》，说明学习的目的，是藉以提高政策认识，改进实际工作，加强接受工人阶级领导的思想，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学习期限为8个月至1年。

各地组织遵照中央指示做了具体布置。南京、长沙、上海、北京、重庆、江西、广西等省市，还创造了一些好的学习方法和经验，他们把学习同“三反”、“五反”、“反美斗争”，同发展组织结合起来，以多种多样的形式举行座谈会、学术讲座、专题报告会等进行学习。通过学习政洽、理论，联系工作和思想实际，党员的政治觉悟都有所提高，工作态度都比较积极。不少党员获得先进分子、劳动模范、“三八”红旗手等光荣称号。

第六章　为实现过渡时期总路线而努力

第一节 学习贯彻过渡时期总路线

一、综合学习改造思想

1953年，国家宣布进入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历史时期，提出了“逐步实现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过渡时期总路线。10月20日，农工党面对这一伟大的历史性转折，向各地方组织发出了《学习过渡时期总路线的通知》，指示“在当地政协的领导下认真学习”。“要在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认真贯彻”。各地组织都推动党员从阅读文件着手，进行了初步讨论。 1954年2月1日，农工党中央执行局通过了《在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进一步进行思想改造的指示》，把认真学习努力贯彻国家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作为1954年工作的中心任务。各省市组织都认真对待中央指示，推动党员进行学习。广大党员在学习中都认真阅读文件，热烈讨论，写出了个人的学习心得体会。中央的《学习通讯》大量刊出辅导资料，介绍学习情况，解答学习中的问题，帮助和引导学习不断深入。

第一阶段经过3个多月的学习之后，农工党中央发表了《巩固总路线学习的成绩，继续深入的学习》的文章，要求各级组织加强对学习的领导，在学习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联系实际．联系思想，解决问题。通过第二阶段学习，很多党员都检查出“原来的思想有问题”，深感“学而后知不足”。武汉的一位党员说：“我在学习中悟出了一个道理，改造，也就是思想上要在新与旧，集体与个人之间展开剧烈的斗争”。在医卫、文教界的许多党员学习之后明白：“不管从事什么工作，都是为国家的经济建设服务”。江苏一位党员学习总路线以后，拒绝了私商55 000元一担的高价，将1500公斤棉籽以38 000元一担的价格卖给了合作社。

农工党推动党员学习国家过渡时期总路线，从1953年11月开始到1954年6月基本结束。主要收获是广大党员进一步明确了民主党派在过渡时期的作用与责任，进一步明确了应如何正确处理公与私，集体与个人之间的关系。所以，许多地方组织都出现了新气象，许多党员获得了各种光荣称号或奖励。

二、参加国家建设和吐会主义改造

1953年2月24日，农工党中央执行局通过了《关于执行1953年三大任务的指示》，说1953年是我国进入大规模建设的第一年，它向全国人民提出了三项伟大任务：继续加强抗美援朝的斗争；开始执行国家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准备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宪法。要求“全体党员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必须发挥积极作用和模范作用，无条件地协助政府做好一切工作”。 7月16日，农工党中央执行局通过《关于加强工作更好地为国家建设服务的指示》，特别要求“基层组织必须在当地党政统一领导下，加强政治思想教育，联系群众，遵纪守法，发挥工作的积极性，为保证完成国家的建设计划和任务，在伟大祖国逐步实现工业化，进行社会主义改造，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而向前迈进”。许多地方的基层组织，都加强组织生活，大力推动党员更好地结合机关的中心工作，为国家建设服务，通过业务实践改造思想。

1954至1955年，农工党从中央到地方各级组织，选派干部参加由各级政协统一组织的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工作组，到农村、工厂从事社会主义改造的实际工作。还有一部分负责人由政协统一组织到农村、工厂参观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成就。这部分党员，在政治思想上都有重大的收获，并把收获向其他党员进行了宣传，又使更多的人受到了一次深刻生动的社会主义教育。

三、拥护发行建设公债和实行统购统铺

随着国家建设事业的发展，中央人民政府决定发行1954年国家经济建设公债。农工党于1953年12月15日向全党发出《关于拥护发行1954年国家经济建设公债的指示》。要求全党在党内和所联系群众中掀起一个宣传和认购公债的热潮。各地党员对认购公债积极响应，出现了许多感人的事迹。如福建的胡建珊每月收入五十多万元，她把需要换一双皮鞋积下的180万元拿出来先买了公债。四川的王瑞福原准备购买自行车积下了一笔钱，他把这笔钱与卖掉结婚戒指的钱加在一起买了公债。许多地方组织还派出干部参加公债的推销工作。

1954年9月，政务院发布了《关于实行棉布计划收购计划供应和棉花计划收购的命令》，农工党中央立即响应，向全党发出《通知》，指出“这两项命令既有利于全国人民生活的安定，也有利于国家社会主义建设”。通知“各级组织应即号召党员热烈拥护，积极宣传，并认真执行”。各级组织在贯彻执行中反复进行学习讨论'认识实行统购统销的重大意义，在实际生活中也起到了较好的作用。

第二节 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作用

一、参加保卫世界和平和促进祖国统一的活动

1952年12月，章伯钧参加中国代表团赴维也纳出席世界和平大会。他在会上做了 《全世界人民的力量可以把和平变成现实》的发言，还在维也纳向祖国人民做了题为 《祖国万岁！毛主席万岁！》的广播讲话，报告自己参加大会的感想。他对祖国人民说： “我们一定遵照你们保卫和平的意志，在世界人民大家庭会议中，严肃地热情地进行工作。我本人自1950年10月参加在华沙召开的世界和平大会以来，连这次人民大会计算在内，已经是第四次了，我深深地感觉到了世界人民对和平的要求，是愈来愈迫切了，呼吁和平的声音，是愈来愈宏亮了，因而保卫和平的阵营和力量是愈来愈强大了”。中国代表团胜利归来后，农工党北京市委会在北京饭店举行时事报告会，由章伯钧作《关于维也纳世界人民和平大会的报告》。到会有农工党党员和所联系的专家、技术人员1200多人。

1954年5月“日内瓦会议”召开，农工党中央通知各地组织，认真学习日内瓦会议的重要意义。 5月31日，章伯钧发表书面谈话，拥护周恩来总理兼外长在日内瓦会议上的发言，当日内瓦会议结束时，彭泽民发表了（祝贺印度支那问题达成协议》的书面谈话。祝贺日内瓦会议上反帝斗争取得的胜利。

1954年8月22日，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为解放台湾联合宣言》。农工党中央在《宣言》发布后立即通知全党，要求认真学习《宣言》，并在实际行动中为解放台湾多做贡献。黄琪翔也发表文章，号召全体党员“要把解放台湾宣言坚决贯彻到工作中去”。各地组织为贯彻《宣言》组织了报告会、座谈会、讨论会。广大党员对《宣言》一致表示拥护，并联系自己昀工作提出各种保证，争取为超额完成国家建设计划，为解放台湾贡献力量。浙江、福建濒海省份的支部还积极投入了有关支援解放台湾的许多工作。

二、积极参加国家政权建设

1953年，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一致通过《关于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决定》。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本质在政权形式上的体现。为此，章伯钧、彭泽民分别发表了坚决拥护的文章，号召全体党员要在行动上和全国人民一道，无条件地协助政府，做好一切工作。

基层普选是中国人民空前的一项民主活动。农工党中央根据中央人民政府的决议，通知各地组织积极响应政府号召，推动党员热烈投入当地的普选，并在实际的民主生活中接受教育和锻炼。据统计，农工党员参加各级选举委员会领导工作的有34人，参加普选具体工作的有124人，参加联合协商提名工作的有37人。还有许多党员参加对选民群众的宣传动员、人口查记、选民资格审查、担任选民小组长等工作。他们在工作中认真负责，很好地完成了任务。有一部分党员因平时工作成绩显著，在群众中有一定的代表性，当选为各级的人民代表，计有：直辖市的区代表33人，省辖县（市）的代表25人，县（市）辖区的代表22人，镇代表5人。

1954年3月，中共中央向宪法起草委员舍提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初稿。农工党负责人参加有各界人士8000人为时2个月的对“宪法草案”的讨论修改。 6月，中央人民政府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农工党负责人章伯钧、彭泽民、黄琪翔等分别发表了庆祝文章表示热烈拥护。地方各级组织遵照中央指示，有计划地布置了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为期2个月的学习讨论，提出了一些问题和意见，供有关部门参考。

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隆重召开，农工党有章伯钧、彭泽民、季方、杨逸棠、王深林、夏康农、何世琨、严信民、张云川、郭则沉、李士豪、韩兆鹗、周谷城、刘春、丘哲、黄琪翔、李伯球、杨子恒、徐赤文、黄现璠20人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出席大会，彭泽民、季方还当选为第一届人大常委会委员。他们代表人民参政议政，为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为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建设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第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后，农工党中央发出《关于学习和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文件的通知》，要求在学习中结合解放台湾的政治任务和国家各项建设工作进行讨论，“使全体党员加强爱国守法观念，遵守劳动纪律，爱护公共财物，进一步发挥积极性和刨造性，为解放台湾，为伟大祖国的社会主义事业而奋斗到底”。

三、对知识分子问题进行调查研究

1955年12月4日，农工党向各地组织发出了《关于调查研究高级知识分子问题的通知》，要求各地组织对党员和所联系的知识分子，特别是有学术地位和专门技术的高级知识分子进行调查研究，了解他们几年来的工作、学习、生活等各方 的问题，并征询具体的解决办法。北京、武汉、安徽、四川、广西、上海、江西、浙江、福建等省市组织按照中央通知制订了加强知识分子工作的规划'并成立了调查小组，结合联系群众和发展组织的工作，就医卫、文教、科技等专业分别举行座谈会，或在基层组织生活中进行漫淡，或选择重点对象进行专访。由于社会主义改造的形势大好和中共知识分子政策的鼓舞，广大党员和所联系的知识分子都积极配合调查工作，踊跃 参加各种活动，各抒己见，畅所欲言。

通过调查研究，从“接受共产党领导”、“尽职尽责”、“对待新事物”等问题上，认为知识分子总的情况是：一方面，知识分子经过改造有了很大进步，但随着形势的变化发展，还需要继续进行改造；另一方面，必须正确认识知识分子的作用，要团结一切爱国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充分发挥作用。在调查过程中，收集不少意见和要求，经分析整理，于1956年1月向中共中央提出了《关于知识分子团结改造问题的几点建议》。其中所反映的问题很快得到解决。这就为协助中共和政府了解知识分子情况，帮助知识分子解决一些问题，有效地落寞知识分子政策，进一步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做了一件实事。从1955年到1956年，农工党党员在共产党的知识分子政策鼓舞下，各地都涌现出了一批优秀的医疗工作者、教育工作者、科技工作者和先进分子、劳动模范等。

第三节 贯彻“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

一、重新确定党的纲领和组织重点

1956年1月31日至2月11日，农工党在北京举行六届二中全会。会议的主要议题是：检查总结工作，讨论关于贯彻国家三项任务的具体工作，讨论发展组织的工作，结合政治运动和经济建设搞好基层组织生活。章伯钧在预备会上讲话说，这次会议“是一个统一认识，加强领导’改造思想，服务建设的动员会议”。会议学习了周恩来《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和全国政协二届二次会议文件，讨论了中央执行局的《工作报告草案》和《1956至1957年工作规划草案》。与会委员在周恩来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报告的鼓舞下，表现得思想活跃，精神振奋，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开成了一个团结、热烈的大会。

会议通过了关于纲领和发展组织的决议。《决议》说：“我党党章系1951年制定的，总则中规定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自己的纲领，这在当时是完全正确的。但自1953年后，国家过渡时期总任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先后颁布，《共同纲领》已经为宪法所代替。我们的总任务是同全国人民一道，为完成社会主义建设与社会主义改造而奋斗。为此，决议我党应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体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所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的总纲为自己的行动准则。”会议还决定，在巩固组织的基础上，“要有重点地向医药卫生界发展组织”。认为“医卫界工作人员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有着重要的作用；其中在大中城市开业的中西医中，对于团结教育工作有迫切的要求。根据统战工作的分工，农工民主党决定在医卫界发展组织，就是要在团结教育医卫工作人员的思想工作中，担负起部分责任，使其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会议还做了《为贯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的决议而奋斗的决议》。

二、举行六届三中全会

1956年4月间，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的重要讲话，提出“一定要努力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积极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充分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党与非党关系方面，提出“两个万岁”的思想，一个是共产党万岁，一个是民主党派万岁。 1956年到1957年上半年，中共贯彻“八大”精神，采取了许多政策和措施，扩大人民民主，调整同各民主党派的关系，切实尊重各民主党派在宪法范围内的政治自由，组织独立和法律上的平等地位，极大地鼓舞和调动了各民主党派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积极性。在这大好的政治形势下，农工党于1957年3月下旬至4月上旬在北京举行了全国工作会议和六届三中全会。

全国工作会议做了《关于党务工作的决议》。总结了过去的工作，要求全党正确认识和认真贯彻“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教育党员并带动所联系的群众忠诚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加强当家作主精神，积极参加国家政治生活。各级组织都要加强政治教育和思想工作，当前以继续进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的宣传教育为中心课题。4月8日至12日，工作会议之后即举行六届三中全会。会议学习了毛泽东的重要讲话《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全国政协二届三次会议文件，听取了章伯钧参加全国人大访问团出访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报告。会议通过了《政治决议》。明确指出：“我国已经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决定性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辉煌成就，阶级关系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在新形势面前，必须进一步发挥我党的作用，为扩大社会主义民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以动员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事业而努力”。决议说：“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的提出，加重了我们的政治责任，为了正确贯彻这一方针，必须忠诚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路线，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创造性地发挥我党的作用。各级组织要经常向有关方面反映成员和群众的意见的要求，代表和支持他们的正当利益，协助各级领导更好地贯彻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政策，协助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本着对社会主义事业负责的精神，应该积极地向共产党提出建议和批评，同时也要主动地虚心地接受共产党以及各民主党派和人民群众对我们的监督。

会议批准了全国工作会议所做的《关于党务工作的决议》，选举黄琪翔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增选杨逸棠、王一帆为中央执行局委员，递补中央候选委员丘辰、叶粤秀为中央委员。

三、发挥民主监督的作用

中国共产党提出共产党同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极大地鼓舞了农工党广大党员的政治热情和社会主义积极性，也给农工党的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农工党为了切实贯彻这一方针，特举行六届三中全会做出了《政治决议》。章伯钧应《俄文友好报》约稿，发表了《我对于“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的刍见》的文章。各省市组织的负责人，如武汉市委会主委唐午园，长沙市委会主委董爽秋，江西省委会主委传肖先，四川省委会主委刘星垣，浙江省委会副主委蔡一鸣，重庆市委会代主委郭仲衡，福建省委会副主委汪盈科，上海市委会副主委许士林，广西区委会副主委张纯之等都发表了学习“八字方针”的讲话，一致表示衷心拥护，努力贯彻。

在“八字方针”的指引和推动下，农工党的工作空前活跃。中央机关刊物《学习通讯》，为适应工作需要改为对开报纸《前进报》，于1956年国庆节出版创刊号,内容短小精悍，版面新颖活泼，其宗旨是办成“全党同志及所联系的群众互相学习的园地，反映意见进行监督的园地，互相观摩互相了解情况的园地。总之是为建设社会主义服务的。”

全党各级组织进一步加强了联系群众的工作，他们因地制宜，方式方法多样，同所联系的群众，特别是对医药卫生界的知识分子建立了广泛的联系，从中了解了群众的一些意见和要求，并在一定程度一定范围内沟通了群众同有关党政领导之间的关系。得到了群众的了解与欢迎，发挥了桥梁与助手作用。

四、建国以来的组织建设工作

从1949年冬季开始，农工党按照“五干会议”决议，重新整理组织，各地方组织在人事上由中央直接任命，成立整理委员会，重新审查登记党员，停止发展组织。1950年陆续成立北京、上海、南京、重庆、成都、芜湖、广东、广西、福建、浙江、湖北、湖南、江西、苏南、香港（不久撤销组织，党员归广东整委会联系）共15个省市和地区整理委员会。 12月，中央执监会议认为各地组织经过整理，有了一定成绩，通过了《发展组织建议案》，提出了在加速完成整理组织的基础上，准备适当发展组织的原则和方法。1951年8月，中央执监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了《关于第六次全国干部会议前吸收党员的决议》，认为党的组织整理及党员的政治教育已获得一定成绩，在“六干会议”前依照民主党派发展组织的一般原则，先行有重点地吸收党员。北京市组织首先在条件比较具备的交通部有重点地吸收党员，并建立了第一个支部。其他地方组织也开始了有限地吸收党员。同年12月，“六干会议”正式做出了《关于发展组织的决定》， 各地组织贯彻执行中央《决定》，配合发展组织，普遍加强了联系群众的工作，提出了“在工作中发展，发展为了工作”的原则。

1956年6月，农工党中《执行局第四次会议作了《关于当前加强组织工作的决定》，对“六干会议”所作的《关于发展组织的决定》做了重大修改，主要是：1．将“以中下层为基础”改为“以中上层为基础”；2．对经济建设部门已不是“试行发展”，而是明确规定“以经济建设部门有关人员、专家、技术人员之中上层为发展组织的重点”；3．对于文教界和机关职员，则改为“以中上层为主”，同时努力向上层发展；4．对于工商业者，则“一般停止吸收”。并说明这是因为经“三反”、“五反”的伟大胜利。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更加巩固与扩大，中上层知识分子通过运动的教育，思想和政治生活的要求提高了，他们在社会上都有一定的代表性，对于国家建设都有一定的作用，特别是工业、农业、交通、水利建设部门的专家、技术人员，在经济建设上占有极重要的地位。进一步把他们组织起来，对祖国建设事业发挥更多的力量。同时，农工党三年来经过各种实际斗争的锻炼，已培养起来了一定的进步骨干，基本上巩固了组织，进一步提高了党的发展条件。从去年以来的发展情况看，中上层知识分子已占全党人数的51％，说明向中上层知识分子发展，是有可能的。 10月，农工党中央执行局第五次会议，在总结各地发展组织工作经验的基础上，通过了《关于有重点开展群众工作贯彻组织方针的决定》，提出“为了迎接经济建设的高潮，各级组织要有计划有步骤地向经济建设部门的专家技术人员开展联系工作，建立并发展组织，以达到配合中心任务，推动成员和所联系的群众提高思想，搞好工作的目的，要运用各种方式，扩大联系群众，反映群众意见，帮助群众解决问题。根据目前条件，决定以北京、广州、武汉、上海、重庆为重点工作地区。其他地区也要从选择部门，配备干部，调查研究等方面做好准备工作”。

《决定》下达后，有力地推动了全党发展组织工作的进展。从1952年6月至10月，5个月内新吸收党员是原有党员的11. 44％。

1952年，农工党地方各级组织经过整理和发展，北京市首先作为试点于1951年8月召开了党员大会，选举产生了北京市委员会。其他地方组织都陆续撤销整理委员会，成立了安徽、福建、广西、苏南、浙江、湖北、江西、重庆、广东、上海、南京、长沙共48个省市和省辖市县工作委员会。至1954年，各级工作委员会完成历史任务，先后通过党员代表大会或党员大会，选举产生了地京、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广东、广西、四川、武汉、长沙共1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市委员会。1956年下半年，随着组织的发展，又先后成立了天津、西安、济南3个市的筹备委员会和8个省辖市委员会，基层组织较原先增加了二百多个。1956年2月，农工党六届二中全会决议把发展组织重点转移到医卫界以后，加快了发展组织的步伐。到1957年2月仅一年时间，新党员人数较原有党员人数增加了l倍以上，全党党员达六千余人，其中医药卫生界占63.42 ％，工程技术和文化教育界占28.33％，中上层知识分子占90％。通过发展组织，在北京、天津、上海、南京、杭州、广州、重庆等大中城市吸收了许多享誉中外的著名专家、学者。明显地突出了农工党“以医卫界为主，以中上层为主'以大中城市为主”的组织重点，充实了组织基础，扩大了组织影响，增强了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优势。

第七章　在社会主义建设曲折发展中经受考验

第一节　反右派斗争和整风运动

一、反右派斗争

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重要讲话，系统阐述了正确处理两类社会矛盾的学说。农工党把毛泽东讲话的精神向全党做了传达，布置学习。4月27日，中共中央为贯彻毛泽东《讲话》精神，改善党的领导，发布了《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要求在党内检查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 4月30 日，毛泽东邀请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举行座谈会，请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提批评意见。毛泽东的重要讲话和邀集的座谈会大大鼓舞了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的积极性，农工党为发动党员和所联系的群众帮助共产党整风，从5月16日至6月7，每周一、三、五分别在南河沿政协文化俱乐部、北京饭店等地，邀请农林水利界、科学教育界、中医界、西医界、北京市党员、师大和科学院的教授学者及戏曲界等举行座淡会，鼓励大家帮共产党整风提意见。座谈中发育踊跃，意见纷纷。有建议，有批评，有牢骚，也有错误言论。

在帮助共产党整风提意见的过程中，有极少数右派分子趁机散布攻击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言论。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这是为什么？》的社论，反右派斗争开始。农工党在形势的推动下，中央成立了以季方为首的“整风领导委员会”，地方各级组织也成立了“整风领导小组”，在全党掀起了反右派斗争。7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的社论，把民主同盟和农工党说成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党派，给农工党带来了极大的压力。9月间，农工党召开全国整风会议。会议在“左”的思想影响下对自己的政治状况作了不切实际的估计，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全党被打成右派分子的达千余人，这对于被错误打成右派分子的本人及其亲属都造成了不幸的后果。由于反右派斗争的严重扩大化，党员中有不少著名的专家、学者对农工党“谈虎色变”，不肯再与组织发生联系，日久则形成“自然脱党”，这个教训也是非常深刻的。

二、内部整风运动

反右派斗争结束后，1958年1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话指出，整风还要整，不能松劲，各民主党派也要整风，要整得适合人民的要求。 1月16日至22日，农工党举行六届四中全会，会议主要是时论处理右派分子和交换整风的意见。在讨论整风问题时，与会者普遍存在顾虑，总的反映是怕变为右派，怕群众批评失掉威信，怕被揭露自己的问题，怕反右之后被报复打击。 2月12日，农工党中央制订了《整风计划》，决定从2月底至5月底全党进行（人民）内部整风。内容是：学习文件，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思想检查。并通知地方各级组织采用“四大”方式，进行一般整风。全党按照中央通知，掀起了群众性的整风运动。

中央机关整风从3月1日开始，在学习文件的基础上掀起了大鸣大放大字报高潮，进行自揭互揭问题，接着是每人以小字报形式“向党交心”，谁交得快、交得多，就表明有自我改造的决心和诚心。

4月4日，农工党中央执行局举行第三十五次会议，推举季方代理中央委员会主席，领导全党的整风运动。5月间，中共中央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号召全国人民“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农工党全党通过学习总路线，联系自我改造也提出了“大跃进”、“高指标”、“高速度”的口号，在交心运动中搞“挑战、应战”，搞竞赛评比，强调要加速实现由资本主义立场到社会主义立场的根本改造。到5月底，根据鸣放出来的问题进行大辩论，人人在交小材料和大字报的基础上“梳辫子”，做自我批判，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中央和有些地方机关在这中间也出现了“整重点”的做法，有的反复检查批判都不得“过关”。最后是制定“自我改造规划”，诸如“一年成左派”，“两年加入共产党”等等，到8月中旬，整风运动基本结束。

农工党的整风运动，是在反右斗争严重扩大化的基础上开展起来的。运动中提出了一些“左”的口号，搞了一些追求形式的幼稚做法。所以，一般都是为了“过关”，实际上是起了干扰自我改造的作用。通过反右斗争和整风运动，广大干部和党员都变得谨小慎微，谨言慎行，缺乏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抱着“只要不开口，神仙难下手”的处世态度。但是通过运动的锻炼，却普遍地记取了“三不得”与“听跟走”的教训。即共产党反不得，社会主义反不得，右派分子当不得；要听毛主席的话，跟共产党走，走社会主义道路。广大干部和党员通过反右整风运动受到了深刻的教育。

三、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1958年农工党在反右派斗争和蹩风运动结束之后，从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都要总结、调整、提高，肩负起历史赋予的新使命。11月15日至12月10日，农工党根据“六干会议”决议，在北京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会议的有六届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中央整风领导委员会委员和各地组织推选的代表季方、郭则沉、严信民、徐彬如、周谷城、夏康农、刘树勋等205人。会上季方做了《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报告》，何世琨做了《社会扛义改造规划》报告，王深林做了《修改党章的说明》。会议总结了“六干会议”以后八年来，特别是反右整风的工作殁经验教训，讨论了国际形势和民主党派的作用与改造等问题，一致认为，毛主席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断是极其正确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经过反右整风虽然有很大进步，但仍然存在两面性，尚须以六项政治标准为目标，进行政治立场的根本改造，必须认识改造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只有坚定地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能坚定地走社会主义道路，真正为社会主义服务。大会通过了《工作报告》、《改造规划》和《党章试行草案》等决议，选举季方、郭则沉、周谷城、徐彬如等48人为中央委员，丁贡南等17人为中央候补委员。

12月11日举行七届一中全会，选举季方、周谷城、徐彬如、郭则沉、严信民、夏康农、刘树勋、唐午园、王人旋为中央主席团委员，推选季方为中央主席团主席。

这次代表大会的主要议题是关于组织和党员的社会主义改造。按照《改造规划》要“将成员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改造成为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将组织从资产阶级的政党改造成为真正接受共产党领导的、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七大”为适应社会主义发展的要求，提出加强组织和党员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是必要的，正确的。但从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实际情况来看，简单地把党的组织走为资产阶级性质的政党，把全体党员一律戴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这不是实事求是的。其结果，动摇了广大党员自我改造的信心，压抑了他们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这个教训是深刻的。“七大”以后，农工党停止了发展组织，主要是贯彻“服务与改造相结合”的方针。

第二节 克服三年经济困难

一、贯彻服务与改造相结合的方针

1959年9月15日，毛泽东邀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负责人举行座谈会。他说：工商界大有进步，知识界大有进步，民主党派大有进步，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大多数人跟过来了，相当多的人，已基本上转到社会主义的立场上，其他人也有不同程度的进步。这个估计，使民主党派及其党员受到了很大的鼓舞。从1959年到1961年，我国国民经济发生严重困难；在国际上，苏共与中共之间的分歧和斗争日益发展，美帝国主义和印度反动派掀起了反华大合唱。国内外形势十分严峻。在1959年进入暂时经济困难之后，由于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影响和共产党内“反右倾”运动的开展，加上教育革命、学术思想批判、拔白旗、破权威等的不断冲击，农工党的党员和联系的群众，绝大多数人思想相当紧张，表现出疑虑重重，忧心忡忡，不敢讲真话，心情不舒畅。农工党针对这种情况，加强了思想政治工作，要求各地组织每月向中央分别上报《思想月报》和《组织月报》，然后综合整理，按月编成《思想情况》和《组织状况》，报中共中央。并有针对性地选辑教材，每季度编印医卫、文教、科技《学习参考资料》，按界别寄党员人手一册。推动党员学习理论、政策，做好岗位工作，参加当时的技术革命、文化革命和教育革命，通过工作实践和革命实践，深入工厂、农村参加劳动锻炼，以加强自我改造，积极为社会主义服务。 1959年5月2日，农工党中央主席团第三次会议（扩大）通过了《关于加强改造，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通知》，指出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和政协三届一次会议，进一步加强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更坚定了六亿多人民实现继续大跃进的信心。表示坚决拥护两个大会的决议，热烈响应两个大会的号召。要求各地组织推动成员切实贯彻两个大会决议的精神作为今年的首要政治任务；大力推动成员联系思想，联系工作，认真学习两会文件。指出大多数成员通过学习、工作和劳动锻炼，有了不同程度的进步，但还应当继续努力。各地组织要更好地贯彻服务与改造相结合的原则，要肯定成绩，鼓励进步，帮助他们解决问题。各级组织要总结工作经验，特别要总结基层组织结合业务对成员进行思想教育的工作经验。

中央《通知》下达后，各地组织都根据“正面教育，和风细雨，以理服人”的原则认真执行贯彻。天津、长沙、北京、上海、浙江、武汉等省市委会分别举行现场会，交流服务与改造相结合的经验，这些经验，都受到其他地方组织的重视。

二、采用“神仙会”方式进行形势教育

中共中央为克服暂时困难，在1960年下半年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强调发扬人民民主，切实贯彻政策，纠正实际工作中“左”的错误。在统一战线内部贯彻政策，调整关系，调动服务，促进改造。保持与发展国内局势的稳定，加强全国人民的团结。针对民主党派的基本动态，实行在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前提下，政治上信任，工作上支持，生活上照顾的做法。共产党为了帮助民主党派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继续前进，提出了改造世界观采取和风细雨、“神仙会”的方法进行改造。

1960年2月初，农工党在国民经济困难中制定了《1960年的工作规划》。规定要坚决在中国共产党领导，进一步贯彻社会主义建没总路线，进一步贯彻调动服务继续改造的方针，继续通过和风细雨，正面教育的力方法，推动成员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投入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社会主义事业做出贡献和继续进行自我改造而奋斗。为了切实贯彻“年度工作规划”，农工党7月间在北京民族饭店举行了七届二中全会。会议运用“神仙会”（采用“三自”、“三不”方法，即自己提出问题，自己分析问题，自己解决问题；不打棍子，不戴帽子，不抓辫子）的方法，鼓励敞开思想，讲心里话，实是求是，以理服人，来解决政治思想方面存在的问题。

农工党这次会议，是同民革、民盟、民建、民进、致公党和九三学社各兄弟民主党派的中央会议同时在北京召开的，出席各党派会议的共有一千八百多人。周恩来给大家做了国内外形势报告，统战部长李维汉做了《学习毛主席著作，逐步改造世界观》的报告。这次会议开得很成功，会上敞开了思想，反映了问题，提高了认识，进行了一次反帝反修的深刻的形势教育。会议结束时，中共中央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彭真等在中南海接见了出席各党派中央会议的全体人员并一起照了像。这是各民主党派在共产党支持与帮助下的一次空前盛会。

农工党在这次七届二中全会上，做了《学习毛主席著作，逐步改造世界观的决议》。按照《决议》，把形势教育作为1961年度的一项重要工作。要求通过教育，认清形势， 增强信心，克服困难，继续前进。地方各级组织都运用“神仙会”的方法，传达了中央会议精神，做出了进行形势教育的具体布置。通过运用“神仙会”的方法进行形势教育，广大党员都有程度不同的收获。对国际上东风继续压倒西风的意义，认识上有新的提高；对国内存在的暂时困难，有了比较正确的认识，端正了对待困难的态度，增强了克服困难的信心。

三、在克服暂时困难中作出贡献

1958年以来，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得到切实贯彻，农工党各级组织对党员在调动服务和推动改造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广大党员通过理论和政策学习、业务实践和劳动锻炼都有很大进步，调动起了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积极性。北京、武汉、福建、广东、安徽、江西、浙江、上海等省市的许多党员在医疗、教学、科研和技术革新等方面都做出了很大的成绩。杭州的严季民参加联合诊所之后，把祖传的单方、，验方献了出来。在漳州，到1959年12月为止，40名医卫界党员总计完成经验总结112篇， 技术革新102项，合理化建议226条，医疗器械改革221件，临床论文67篇，献出秘方3760个，3名科技界党员共计完成技术革新15项；12名文教界党员共完成教学改革36项。在政治思想上．许多党员也有明显的转变。北京的蒲辅周、钱伯煊、葛云彬几位老中医讲究医术医德，干劲十足，被评为“六好”工作者。一些基层组织，如柳州红会支部，泉州人民医院支部，在评比中全支部一再出现了“满堂红”。 1959年，农工党有5名党员出席了全国群英会。1960年．有19名党员出席了全国教育、文化、卫生、体育、新闻代表群英大会。

1959年4月6日，农工党出席二届人大一次会议和政协三届一次会议的党员在京举行座谈会，谴责美帝国主义和国外反动派利用西藏达赖叛乱事件干涉我国内政，破坏我国统一的行径。各地方组织也分别集会，声讨帝国主义和国外反动派的反华大合唱。

1960年7月，农工党各级组织为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坚持解放台湾，保卫世界和平，举行了集会和宣传活动。广大党员在反对国内外敌人的斗争中，受到了深刻的教育。

1961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四十周年，农工党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全国工商联一起，由何香凝代表向共产党祝贺并致献词。献词说：“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我们参加了党所领导的统一战线，在革命的每个重要关头，党都及时地给我们指出前进的方向，指出正确的道路，真诚地团结我们，恳切地教育我们，耐心地帮助我们”。“有了党的领导，一切敌人都能够打倒，一切困难都能够克服，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一定能够成功，共产主义一定能够实现”。这充分表达中国民主党派在困难中同中国共产党的深厚友谊与牢不可破的团结。

1962年9月20日至23日，农工党第二十八次中央主席团会议（扩大），根据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和全国政协三届三次会议精神，着重讨论了统一战线的新形势和民主党派的新任务，交换了1962年工作的意见。会议认为，知识分子在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方面和思想改造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绩，特别是近几年来，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经受了国内外斗争的考验，政治觉悟和思想都有了提高。说明了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取得了伟大胜利。会议精神在全党传达之后，广大党员精神振奋。医卫界党员，热烈响应中共和政府的号召，把出成果落实在著书立说和科学实验上，并热心带徒，精心教学。

第三节 从“三个主义”教育到“文化大革命”

一、进行“三个主义”思想教育

1962年9月24日至27日，中共举行八届十中全会，毛泽东在会上提出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批判了“黑暗风”、“单干风”和“翻案风”。在“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下，“左”的倾向又有新的发展。

12月27日至1963年1月19日，农工党举行七届三中全会。会议根据中共八届十中全会精神，着重讨论了国内外形势，提出“以推动和帮助成员及所联系的群众积极为社会主义服务，作为开展各项活动的总的出发点，作为进行各项工作中的主要指导思想”。“要结合学习马列主义和毛主席的有关著作，认真进行一次爱国主义、国际主义、社会主义的思想教育”。1963年要求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推动党员和所联系的群众加强学习，加强改造，努力提高爱国主义、国际主义、社会主义的思想觉悟。

各地组织遵照七届三中全会精神，在当地协助党政部门调整有关政策，并把政治思想工作渗透到党员的业务实践中去，普遍地开展了“三个主义”教育运动。在运动中要求“揭盖子”，检查“大反复”。农工党中央为了加强同医药卫生界党员的联系，推动他们接受“三个主义”教育，成立了以著名中西医蒲辅周、秦伯未、陈邦贤、刘士豪、范权、孟目的、柳步青等组成的“中央医卫工作组”。

农工党中央于1963年5月16日在北京举行有北京、天津、上海、武汉、江苏、浙江、四川7省市负责人参加的“七省市汇报会议”。会议重点讨论了结合增产节约运动，继续深入开展“三个主义”教育问题。同年9月，农工党中央为了对一年来的“三个主义”教育总结经验，向各地组织发出了《关于开展第四季度调查研究工作的通知》，并派出工作组到武汉进行蹲点调查。大部分地方组织遵照中央通知，部署了调查研究工作。

1963年12月3日至9日，农工党响应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和全国政协三届四次会议提出的“全国各族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继续努力争取国民经济的进一步全面好转而奋斗”的号召，举行中央主席团第四十四次会议。会议认真研究了当前的组织和党员的情况。一致表示拥护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对内对外政策，拥护人大、政协两个大会的决议。会议提出1964年的中心任务，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继续深入开展“三个主义”教育，帮助党员和所联系的群众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进一步明确形势，明辨是非，划清界限，增强信心，加强团结，积极参加增产节约运动，进一步提高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积极性。会后各地组织都召开了委员扩大会议，传达主席团会议精神并制定了工作计划。

三、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1964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全国轰轰烈烈开展起来。农工党中央主席团按照政协第三届全国委员会第四十三次常委会议通过的《关于开展三个主义教育运动的计划大纲》，于2月10日向各地组织发出了《关于贯彻执行开展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的指示》，根据把“三个主义”的思想教育，作为运动开展起来。各撼组织遵照《指示》，加强了对“三个主义”教育运动的领导，批判了运动中的疲沓松劲情绪。北京市委会和福建省委会为把“三个主义”教育运动深入下去，举办了党员短期集中学习；长沙、厦门、常州等市委会对“三个主义”教育阶段的工作进行检查，批判了“差不多”思想。

1965年1月6日至11日，农工党举行中央主席团第五十次会议（扩大）。会议学习讨论了周恩来在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和郭沫若在全国政协四届一次会议上的《工作报告》，交流了各地组织进行“三个主义”教育的情况，以及今后开展“三个主义”教育运动的意见。会议号召全体党员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同全国人民一道，积极投入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积极投入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过好社会主义这一关，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力量。

各地组织为贯彻中央主席团会议精神分别举行会议，研究了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情况和做法，提出要认真学习周恩来的《政府工作报告》，联系思想，批判错误，加强改造。有的地方组织在运动中还出现了“搞重点批判”的做法。

1964年到1965年，中共中央制定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决定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内容一律为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的四清运动。农工党在形势的推动下，中央和各地组织都分批派出干部参加农村四清运动。

农工党北京、上海、天津等市委会，分别组织党员参观农村四清运动。广州、南昌、金华、武汉、成都等市委会，分别举行了对子女教育问题座淡会，推动党员支持子女上山下乡，在三大革命运动中锻炼成长。1965年3月22日，农工党向全党发出 《关于推动医卫界成员积极争取参加农村巡回医疗队的通知》，指出医卫界成员通过参加农村巡回医疗队工作，可以更好地认识农村社会主义革命的新形势，更伞面地接受阶级教育，更快地提高社会主义觉悟，促进自我改造，更好地为工农兵服务。各地的许多医卫界党员在全国社教运动的推动下，把下乡参加巡回医疗作为自己接受改造锻炼的好机会，踊跃报名参加医疗队，下乡为农民防病治病。浙江省委会副主委、省卫生厅副厅长、85岁高龄的著名老中医叶熙春响应号召到杭州近郊古荡、富阳、萧山等县参加巡回医疗，兢兢业业为农民治病，受到农民群众的热情赞扬。四川省人民医院中医解德甫到农村参加巡回医疗后便申请在农村安家落户。山东省立医院耳鼻喉科主治医师、省医学院讲师孙洪恩参加了巡回医疗，认为到农村为农民防病治病是非常光荣，大有可为的，毅然申请在昌维专区安家落户，得到了批准。

三、“文化大革命”中的农工党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五·一六通知》发出后，一场酝酿已久的“文化大革命”爆发了。这场运动错误地发动之后．就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利用了，酿成十年灾难性的内乱。运动的来势极为迅猛，农工党中央在势不可挡的情况下，于6月1日成立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办公室”，决定6月13日开始大鸣大放大字报，“大方向是揭批一一切牛鬼蛇神”。

8月8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随后红卫兵走向社会“造反”，搞“破四旧”，“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农工党中央机关于8月26日深夜被红卫兵封门，地方各级组织的机关也相继遭到冲击，农工党被迫停止活动。接着，从中央到地方，从负责人到干部、党员，许多人或被抄家批斗，或被隔离审查，或被遣送劳动，有的遭到严刑拷打，甚至于迫害致死。到1968年“清理资产阶级队伍”，又有一批人按《公安六条》受到审查关押，挨批挨整。

林彪、江青集团出于反革命的目的，利用“文化大革命”疯狂破坏统一战线，残酷迫害民主党派，罪恶累累，罄竹难书。但是，毛泽东、周恩来以及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们建立起了统一战线，一贯坚持把统一战线作为革命和建设的一大法宝，为统战工作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在“文化大革命”逆流中，他们依然为维护统一战线，关心民主党派付出了很多的心血。1966年国庆节，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对李宗仁说，红卫兵把全国政协、民主党派封了，但政协、民主党派还是要的。 1969年5月4日，当派军代表进驻民主党派中央机关时，周恩来给国务院直属口党的核心小组负责人写信叮嘱：要与派在各民主党派的军代表淡谈政策，不要去批斗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即他们的中央委员，省、市党部委员。对机关支部也要具体情况区别对待，不要以中共党内标准要求。 1971年，林彪叛国事件发生后，周恩米及时召集在京的全国入大和全国政协常委中的民主党派人士，通报了林彪叛国的重人政治事件，并进行座谈讨论。同年10月，在毛泽东、周恩来的关怀下，各民主党派中央和全国工商联共同成立了临时领导小组，设立了联合办事机构，办理口常事务，还在全国政协成立了学习领导小组，恢复了经常的学习。1973年至1975年，全国政协和中共中央统战部先后组织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到北京、天津、河南、湖南、广东、山东等省市进行参观活动。

1973年10月，叶剑英、邓颖超受中共中央委托，邀集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协商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的候选人名单，叶剑英在会上讲话强调，要继续发挥统一战线的重要作用。 1975年1月，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农工党有季方、蒲辅周、吴桓兴等10名人大代表出席大会。周恩来在重病中抵制了“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出席大会作了《政府工作报告》，他庄严重申：要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要进一步发展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包括爱国民主党派、爱国侨胞和港澳同胞的革命统一战线。这响亮的声音，给处在极端艰难中的民主党派及其党员带来了温暖和希望。

在“文化大革命“的逆流中，农工党的广大党员尽管饱受折磨，但对共产党，对自己的专业，总是怀念在心，而且是遭遇愈恶劣，怀念愈深切。农工党负责人黄琪翔“文革”中被造反派残酷迫害。他在难以忍受精神和肉体的折磨中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由夫人郭秀仪从地安门步行到天安门找“首长信箱”投寄，周恩来接信后，立即派人来看望他，并帮助他迁离辛安里农工党机关宿舍。郭秀仪回忆此事，曾深情地说：“敬爱的周总理，使我们受益良多，恩情难忘。”

在农工党的许多党员中．有的人被批斗下来，整整衣服，擦擦脸，又到自己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地默默工作；有的老中医被迫害致残，仍在家里坚持对患者治病扶伤；有的被下放养猪，伴着猪群在又脏又臭的猪圈里著书立说；有的被打成“特务”，判刑关在牢里，仍然没有放弃对科研的执著追求。“文革”十年，农工党的许多党员在难以想象的恶劣环境、恶劣遭遇中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他们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热爱自己的专业。他们说，在那动乱的十年，最大的痛苦不光是挨斗挨打，而是对自己的专业预干不能，欲罢不忍。我们毅力的源泉是，坚信乌云终究遮盖不住太阳，共产党是一定能够战胜一切的。

“文革”十年，农工党尽管被迫停止了活动，但在共产党的关怀下，终究没有被搞垮。历史有一次证明，农工党同共产党风雨同舟，荣辱与共，一道经受了严峻的考验。

第八章　进入新的历史时期

第一节　粉碎“四人帮”以后逐步恢复活动

一、成立中央临时领导机构

1976年10月，中共中央执行人民的意志，一举粉碎“四人帮”，结束了“文化大革命”，开始进入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中心任务的新时期。1977年2月，全国政协在北京饭店举行春节联欢晚会，热烈庆祝粉碎“四人帮”之后的第一个新春。农工党负责人季方、严信民等应邀参加晚会，同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各界人士欢聚一堂，畅谈大好形势，展望光明前景，精神振奋，心情舒畅，决心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继续做出贡献。

1977年3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和8月中共中央的会议上，提出在召开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同时召开全国政协五届一次会议的建议。12月27日至29日，停止活动十三年多的政协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举行第七次扩大会议，农工党负责人严信民、徐彬如等出席会议。中共中央对这次会议，十分重视，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参加了会议。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指出五届人大和五届政协的召开，将是我国各民族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是从政治上组织上巩固和发展粉碎“四人帮”的胜利成果，实现安定团结，达到天下大治的一个重要部署。中共中央统战部长乌兰夫受中共中央委托，向会议提出召开全国政协第五届一次会议的建议，并就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的组成单位和名额分配等问题做了说明，会议通过了在1978年春季召开政协第五届第一次会议的决议。

12月，中共中央统战部邀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举行会议，农丁党季方、严信民、徐彬如到会。乌兰夫部长在会上宣布中共中央决定：各民主党派恢复活动，并商定了各民主党派的临时领导机构的组成人员。农工党由季方、严信民、徐彬如3人成立过渡性质的临时领导小组，季方为小组召集人。

1978年5月，农工党中央制定了《1978年4月至12月工作计划要点》。7月12日，中央机关成立临时工作机构，设组织组，负责人为严信民、方荣欣、王一帆；宣传组负责人为徐彬如、李伯球、胡一禾；秘书组负责人为王深林、杨逸棠，正式开展工作。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组织在当地中共党委的领导和帮助下，相继成立了临时领导机构，着手配备干部，调查党员情况，逐步恢复基层组织的活动。

11月，农工党中央临时领导小组举行会议，主要讨论了协助中共和政府落实政策的问题。会上还研究确定：邓演达、黄琪翔、章伯钧、彭泽民、季方5人为农工党的创党人和主要领导人，肯定了他们在农工党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

二、恢复参政议政和民主监督职能

1978年2月，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和第五届政协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同时在北京召开。农工党出席人大会议的代表有季方、周谷城、卢嘉锡、严信民、刘树勋等22人，参加政协会议的委员有季方、周谷城、严信民、徐彬如、沈其震、叶桔泉、李伯球、方荣欣等52人。农工党出席本届两个大会的代表和委员人数比历届有较大增加，预示统一战线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

在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邓小平当选为主席。他在会议闭幕式上致闭幕词说：“我国革命统一战线必将在实现新时期总任务的斗争中，在向四个现代化的伟大进军中，发挥它的重要作用。我们希望各方面的朋友们，同志们，再接再厉，继续前进，共同为我们这个伟大的事业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

在全国人大会议上，季方、吴桓兴当选为人大常委会委员。季方还当选为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严信民、徐彬如、叶桔泉、张超伦、吴桓兴当选为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

全国人大、政协五届一次会议闭幕后，政协工作开始全面恢复。中共中央根据“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恢复和发扬了政治协商，民主监督的优良传统，邀请党外人士就中共和国家的大事进行民主协商。农工党负责人应邀参加重要的协商会议。在协商过程中，农工党负责人本着“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精神提出了意见和建议。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特点和优点。民主党派参加这些活动，对于促进安定团结，健全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巩固人民民主专政，有其十分重要的作用。

农工党各级地方组织负责人也积极参加了当地的民主协商活动，对地方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技、医卫等方面的重大事项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

参政议政是民主党派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重要内容。在五届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期间，农工党党员当选为各级人大代表的有655人，其中有全国人大代表22人，常委2人；省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7人；省辖县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27人。当选为各级政协委员的有1 487人，其中有全国政协委员52人，常委8人，副主席1人；省市政协副主席14人；省辖县市政协副主席84人。

二、协助中共和政府落实政策

农工党在五届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一次会议精神鼓舞下，从恢复活动开始就把协助中共和政府落实政策，解决历史上遗留的问题，作为恢复活动后的主要工作内容，认真地处理来信来访，为平反冤假错案审在材料，为改正错划的“右派分子”进行复查以及帮助解决一些人的工作、生活、安置等问题。

1978年10月26日，农工党召集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安徽、江西、四川7省市组织举行调查汇报会，基本上摸清了党员的情况，为落实政策提供了良好的条件。被划为“右派分子”的党员，经复查甄别，除极少数之外，都属于错划．得到了改正。据统计，在十年动乱期间，党员中的冤假错案共有543件，历次政治运动中遗留下来的案件共有232件，经复查后都予以平反昭雪，恢复了名誉，得到了妥善解决。到1981年，有关冤假错案方面的落实政策工作基本告一段落。广大党员看到共产党恢复了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无不深受感动。

1981年1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检查一次知识分子工作的通知》，农工党意识到须对广大党员和知识分子的安排使用、工作条件、生活待遇等问题作一次调查。 1982年4月，农工党成立了“知识分子工作研究小组”，并通知各地组织，要深入了解知识分子政策的落实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及时向有关方面反映情况并提出建议。各地组织都成立了相应的临时工作机构，对知识分子情况进行调查。5月初，农工党中央派出两个调查组，分赴华东的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和华南的广东、广西、湖南、湖北，调查有关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情况和问题。 8月，农工党中央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在北京召开了“医卫界中年知识分子问题座谈会”，着重研讨了落实医卫界中年知识分子政策的问题。会后向中共中央书记处提出了（关于医卫界中年知识分子问题的调查报告）。10月19日，中共中央函复：“农工党积极协助有关部门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这次为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开展的调查工作，效果很好。对于加强共产党同知识分子之间的联系和了解，促进我国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调动知识分子及其亲属的积极性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二节　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光辉照耀下前景

一、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

1979年，农工党为了适应新形势和新任务的要求，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指导下，于10月11日至22日在北京召开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会议的有七届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和各地组织推选的代表季方、周谷城、刘树勋、严信民、沈其震、徐彬如、叶桔泉等258人。会上周谷城做了题为《在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道路上前进》的工作报告，严信民做了《关于修改党章的说明》；通过了关于“工作报告”和“党章说明”的决议；选举产生了中央领导机构中央委员会。季方、周谷城、刘树勋、严信民、沈其震、徐彬如、叶桔泉等62人当选为中央委员，余宝笙（女）等27人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

10月23日举行八届一中全会，选举季方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周谷城、沈其震、刘树勋、严信民、徐彬如、叶桔泉为副主席，卢嘉锡、方荣欣等26人为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

农工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总结了自“七大”以来21年的工作，对组织和党员做出了恰如其分的估计，指出：“党的政治面貌和组织面貌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绝大多数成员都已经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劳动者，是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我党已经成为社会主义知识纷子特别是以医药卫生界知识分子为主要成分的社会主义劳动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政治联盟，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大会提出今后一个时期的中心任务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维护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把工作重点坚决地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为实现祖国统一，为加速四化建设，为维护世界和平而奋斗。”大会通过的《党章》中，规定农工党的基本任务之一是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积极推进改革开放，为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为加快经济建设献计出力。

会议期间，中共和国家领导人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乌兰夫等于10月19日接见了农工党及同时开会的其他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的全体代表，并一起合影。全国政协和中共中央统战部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晚宴招待会，邓小平在会上讲话说：在我国新的历史时期，民主党派和工商联是我国爱国统一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同我们党有过长期合作，共同战斗的历史，是我们党的亲密朋友。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事业，已成为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我们党的共同利益和共同愿望，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仍然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不可忽视的作用。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实行多党合作，这是我国具体历史条件和现实条件所决定的，也是我国政治制度中的一个特点和优点。邓小平热情洋溢地号召要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以主人翁的态度关心国家大事，做共产党的净友，要为促进台湾回归祖国积极贡献力量。

邓小平的讲话在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的代表中产生了强烈的反响。

二、加强理论政治学习

1978年12月，共产党举行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 “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做出了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

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指导下，各条战线拔乱反正。中共中央把统一战线工作列入了重要的议事口程，先后做出了一系列的重要决定，并为统战部门摘掉了“投降主义”、“修正主义”的帽子，肯定了建国以来统战工作的巨大成绩。李维汉还提出了“统一战线是一门科学”的论断。

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会讲活强调：“我们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第一，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第二，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第三，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第四，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6月15日，邓小平在全国政协五届二次会议的开幕词中全面地阐述了新时期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的历史任务与重要作用，肯定了民主党派的历史贡献。明确指出，各民主党派“都已经成为各自所联系的一部分社会土义劳动者和一部分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政治联盟，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邓小平的几次重要讲话指明了民主党派同共产党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共同政治基础，也从根本上科学地阐述了新时期民主党派的性质、地位和作用，从而扭转了自反右派斗争以来对民主党派的错误认识，促使民主党派逐步摆脱“左”的束缚，走上正确的轨道。

在这历史的转折时刻，农上党为适应新的形势和新的任务，在全党加强了理论和政治学习。各级组织积极推动广大党员，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文选》以及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文件。要求通过学习，明确我国80年代的三大任务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相互关系及其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重大意义。在学习中联系思想和工作实际，注意克服“左”的思想影响，消除余悸，振奋精神。

1980年9月，农工党中常会通过了《关于认真学习和贯彻五届人大三次会议和五届政协三次会议精神的决议》，并为贯彻《决议》于11月举行了全国工作会议。会议结合中共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认真学习人大、政协五届三次会议文件，要求在领会文件精神的基础上，明确新时期统战工作的新特点和农工党的新任务。1981年3月，农工党中央发出12关于学习和贯彻经济上实行进一步调整政治上实行进一步安定方针的通知》，要求各地组织要扎扎实实地做好政治思想工作，发扬自我教育传统，每个党员都要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去影响群众，教育子女，为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馓不懈的努力。12月，中央又作了《关于学习和贯彻五届人大、政协四次会议精神的决议》，要求领会“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经济建设方针，为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再接再厉，做出新的贡献。 1982年9月，农工党中央向各地组织发出《关于学习宣传中共十二大文件的通知》，要求“以开幕词作为总的指导思想，把学习宣传中共十二大文件作为一次重大的任务切实抓好”。 12月，中常会做了《关于学习贯彻人大、政协五届五次会议精神的决议》，指出必须结合中共十二大精神，认真学习、宣传、贯彻人大、政协会议通过的《宪法》和《章程》．为开创我党工作的新局面而努力。1983年8月．中央向全党发出了《关于学习（邓小平文选）的通知》，要求有领导有组织有计划的学习，通过学习提高认识，统一思想，改进工作。

地方组织为了把学习逐步深入下去，采用了多种多样的学习形式和方法，都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1981年10月，农工党在南宁举行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会上对党员的学习情况和思想状况做了分析和估计，讨论了进一步加强理论政治学习和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的问题。会议肯定，通过学习绝大多数党员的思想政治主流是积极的、健康的、不断进步的。这次会议为进一步加强学习起了推动的作用。

三、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积极作用

1980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成立特别法庭，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审判，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参加了审判工作。农工党负责人严信民被任命为特别法庭的审判员，审判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要犯。1981年1月25日，特别法庭对江青等罪犯分别判予应得的法律制裁，表达了民意，伸张了正义。农工党负责人徐彬如、杨逸棠、丁贡南等为此分别发表专文，从政治上和法制上阐述了这次审判的正义性及其重大意义，表示由衷的拥护。各地组织也纷纷举行座谈会，广大党员扬眉吐气，欢欣鼓舞，一致坚信“共产党是可以战胜一切的”，“一切都应当向前看”，受到了一次生动的法制教育。

1981年9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发表关于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重要讲话，引起了国内外的强烈反响。农工党主席季方10月2日对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他说，叶剑英委员长阐明的关于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九条方针政策，完全符合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国各族人民的意愿和根本利益，我们农工民主党全体同志表示竭诚拥护，要努力为国共两党合作，实现祖国统一贡献我们的力量。10月10日，农工党中央和北京市委会联合召开了《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座谈会》，邀请党内外的知名专家、学者，畅谈辛亥革命的意义，呼吁海峡两岸骨肉同胞携起手来，为早日实现祖国统一大业而努力。

1982年9月，中共召开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农工党负责人季方、周谷城、沈其震、严信民、徐彬如和其他党外人士应邀作为来宾列席大会。邓小平在大会开幕词中说：“我国各民主党派在民主革命时期同我们党共同奋斗，在社会主义时期同我们党一道前进，一道经受考验，在今后的建设中，我们党还要同所有的爱国民主党派和爱国人士长期合作。”胡耀邦在十二大报告中也指出：“在民主革命时期，统一战线是使我国革命得到胜利的一个重要法宝，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它仍然发挥着十分重大的作用。我们党要继续坚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加强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少数民族人士和宗教界爱国人士的合作”，季方在小组讨论会上发言说，参加这次大会，深受教育和鼓舞。我们农工党的全体成员一定要继续努力，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十二大的路线、方针、政策，与领导党在政治上、作风上保持一致，为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贡献力量。

第三节 实现工作重点的转移

一、调动为四化建设服务的积极性

农工党恢复活动后，1979年8月，中央机关刊物《前进》杂志复刊。但由于“两个凡是”的影响，指导思想上仍不能完全摆脱“左”的框框。“八大”决定工作重点转移之后，广大党员在中共十一届一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政策指引和组织的推动下，进一步激发起了爱国主义热情，大火提高了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在贯彻执行我国80年代的加紧四化建设、促进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的三大任务中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农工党各级组织贯彻执行为四化建设服务的任务，首先是把推动和帮助党员做好本职工作，多出成果，多出人才作为一项经常性的工作来抓的。为此，根据党员在业务实践中和实际生活中产生的思想问题和其他具体间题，运用各种方式方法，帮助他们加强形势和有关方针政策的学习，解决存在的实际问题，不断提高政策水平、业务水平和工作积极性，在工作岗位上做出成绩。许多地方组织分别举行了各种类型的有关方针政策的讨论会，专业或专题报告会，先进事迹经验交流会，为四化服务成果展览会，先进人物表彰会等，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在医药卫生、科学技术、文化教育等界的党员中，不少人做出了突出的成绩。在他们的成果中，有的在国际上是处于领先的地位。还有不少已经退离休的党员，也积极为四个现代化发挥余热余力，出现了许多感人的事迹。

1981年5月，农工党在北京召开了《为四化服务经验交流会》。出席会议的有120名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代表。许多人在会上介绍了他们的先进事迹和先进思想。据不完全统计，农工党党员被评为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三八”红旗手等光荣称号的，1981年是779人，1982年是1702人，1983年是1999人。这一批先进人物，不仅为农工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也为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二、开拓工作的新途径和新领域

农工党“八大”以来，各级组织推动党员通过理论政治学习，逐步提高了对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认识，调动了为四化建设服务的积极性。1980年4月22日，农工党中央发出了《为四化建设献计献策的通知》，动员广大党员解放思想，以主人翁态度，为国家现代化建设献计献策，开展合理化建议活动。各地组织响应中央号召，就医院管理、中西医结合、医疗预防、计划生育、教育体制、城市建设、企业管理、科学技术、农林发展、农村建设等方面进行专题调查，或举行专业座谈会，提出了大量的改革意见和建议，有的得到有关部门的采纳，收到了效益。

咨询服务是民主党派发挥智力集团特点和优势，为四化建设服务的新途径。1982年10月28日至11月4日，农工党和民主建国会、全国工商联在北京联合召开了“中药专业咨询座谈会”，会后向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提出了《扶持和振兴中药事业的六项建议》，受到了重视和赞扬。11月27日，农工党主席季方和民主建国会主席胡厥文、全国工商联主席胡子昂代表两党一会向中共中央提出了《关于振兴和发展中药事业的建议书》，建议大力发展中药的种植和加工。12月7日胡耀邦批示说，党外三个党派团体对中药的发展问题提出了许多良好意见，值得我们重视。党外确有能人，他们有知识，有热情，希望有关领导部门的同志与民主党派朋友密切合作，看如何能把中药这件事搞得更好些，以造福于人民。 1983年3月，农工党和民主建国会、全国工商联在北京成立了“中药专业咨询服务联合中心”，为振兴中药事业开展咨询服务。一些地方组织也成立了相应的咨询服务机构26个，受益群众达七万多人；许多地方组织还建立了医疗保健、农林科技、工程设计等咨询服务机构，以及送医送药等咨询服务的点、站、所共314个，受益群众达16万人次。

1983年2月，农工党在北京举行全国工作会议，号召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面向社会，面向四化，充分发挥民主党派智力集团的作用”。全党响应中央号召，各尽所长，各显其能，陆续举办了各种学科、各种类型的业余学校、专业培训班、文化补习班等176所，入学人数达五万三千余人；举办医卫、科技、文教等各种专业或专题讲座307次，听讲人数计十九万多人次。8月中旬，农工党组织全国著名的中医专家成立“中医讲学团”赴宁夏回族自治区讲学、义诊，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与赞扬。

1983年，农工党中央接受支边项目226项，由各地组织派出々家学者和著名中西医大夫154人，分20批到东扎、西北和西南一些省、自治区进行经济、文化开发的技术指导和讲学。在地方组织中，1983年7月，北京、天津、上海、江苏、浙江等省市相互协作，派出支边队伍19批，分赴吉林、宁夏、内蒙、云南、甘肃、贵州等省区进行支边活动。广东、广西、福建、贵州、四川等省区分别组成支边小组，各在本省区内的海南、百色、梧州、龙岩、清镇、毕节、凉山等少数民族地区进行支边活动。通过支边活动，对受援地区的经济、文化和科技事业的提高与发展，给予了有益的帮助。

三、健全与发展组织

农工党自1957年“反右派斗争”停止发展组织，到1980年相隔23年没有吸收党员。出现了党员“老、病、退、散”和专职干部“老、弱、少”的现象。基层难以开展活动组织难以发挥作用。这与贯彻“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和担任务很不适应。“八大”以后，各级组织分别传达了“八大”精神，选举产生了新的领导机构，为发展组织创造了有利条件。

从1980年起，农工党开始了有重点地适当吸收党员。在1981年的《工作要点》中，规定根据1980年11月全国工作会议精神，结合各地区的具体情况和工作条件，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发展组织和筹建新的地方组织。同年，中央正式发出了《关于巩固与发展组织相结合的意见》。 1982年2月，在全国统战工作会议精神指导下，召开了全国组织工作座谈会，研究了组织工作中遇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交流了两年来发展组织工作的经验，对发展组织做出了具体的部署。 1982年，先后建立了河北、湖北、湖南3个省级组织，大连、梅州、电溪、泰州、梧州、贵县6个省辖市县组织，兰州、沈阳、郑州、昆明4个直属支部。恢复和新建了594个基层组织。在新建的地方组织中，陆续配备了专职干部，正常开展工作。

到1983年第三季度，农工党在全国有省、自治区、直辖市组织15个，省辖县市（区）组织67个，直属支部5个，还在长春、青岛、呼和浩特、齐齐哈尔、乌鲁术齐等市吸收了一批党员。3年多来，吸收新党员7692人，他们大多数是中上层的中年业务骨干，平均年龄为54.1岁，比原有党员的平均年龄降低12岁；其中医卫界占62.39%，文教界占23.15%，科技界占9.62%，其他占4.84%；全党人数增至13770人，超过了1957年的全党人数。农工党通过发展组织充实了新鲜血液，降低了老化程度，活跃了组织生活，增强了组织能力，在前进的道路上增添了生机与活力。

第九章　全面开创工作的新局面

第一节 进一步发挥参政党的作用

一、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1983年冬季，我国贯彻“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已初见成效；中共十二大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全面改革的基本方针，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宏伟目标；号召“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农工党面临新的大好形势和新的历史任务，于11月25日至12月4日在北京召开了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会议的有八届中央委员、候补委员以及各地推选的代表季方、周谷城、沈其震、卢嘉锡、叶桔泉、严信民等406人。全国人大、国务院、全国政协以及中共中央统战部、政府有关部门，各民主党派和全国工商联的领导人韩先楚、田纪云、杨静仁等应邀出席大会开幕式。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薄一波受中共中央委托，到会宣读了中共中央的贺词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高度评价了邓演达的历史功绩。薄一波的讲话赢得了一阵阵的掌声。

会上，周谷城作了《团结一致，振奋精神，全面开创我党工作的新局面》的工作报告，章师明作了《修改党章的说明》。大会通过了周谷城的《工作报告》和新的党章；选举产生了中央领导机构中央委员会，季方、周谷城、沈其震等127人当选为中央委员，王传琛等25人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

12月7日举行九届一次全会，选举季方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周谷城、沈其震刘树勋、严信民、徐彬如、叶桔泉、卢嘉锡、方荣欣为副主席；丁贡南等44人为常委；方荣欣、章师明为中央执行局正、副主任，田光涛、王一帆、张纯之为执行局委员，王群为候补委员；由季方主席提名，决定张申府等19人为中央委员会顾问。

大会期间，中共和国家领导人胡耀邦、邓小平、彭真、邓颖超等于12月3日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全体代表和工作人员并一起照像。4日，全体代表和工作人员应邀出席中共中央统战部和国家民委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茶话会。

这次大会总结了农工党4年多来在共产党领导下经过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的努力，在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为四化服务等方面所取得的成绩。要求今后须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立志改革，认真贯彻中共十二大精神，开创工作的新局面，为四化建设做出新的贡献，为实现80年代的三大任务而奋斗。大会决议，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遵循“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共的方针、政策，当前特别要学习《邓小平文选》。要努力学习专业知识，深入实际，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沿着中共十二大指引的方向，继续前进。

二、参政议政职能进一步加强

1983年6月，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六届一次会议同时在北京召开。农工党党员出席人大会议的人大代表有35人，其中吴桓兴任人大常委会委员，周谷城任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出席政协会议的政协委员有62人，其中卢嘉锡、沈其震、严信民、徐彬如、叶桔泉、方荣欣、章师明、王一帆、柯麟等12人任政协常委会委员，季方连任政协副主席。在全国范围内，被选为应届各级人大代表的有901人，被推选为应届各级政协委员的有2891人。本届的代表和委员人数，比上届又有较大的增加，意味着共产党加强了同民主党派之间的合作与协商，农工党也为进一步发挥自己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有了更好的条件。

在六届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的历次会议上，农工党担任代表和委员的党员，都积极的通过发言和提案提出了许多好的意见和建议。沈其震在会议期间散发的由他牵头，有37位有影响的医药学专家签名联合提出的《关于加强我国新药研究的呼吁》，充分体现出“同心同德、畅所欲言”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充分发挥民主党派参政议政，协商监督的作用，是新时期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几年来农工党从中央到地方，越来越多的党员参加国家政权，参与国家大政方针和国家领导人选的协商，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参与国家方针、政策、法律、法规的制定执行。中英两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和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中共中央召开全国代表会议和十二届四中全会、五中全会的主要议题，以及关于制定“七五”计划的建议，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定，六届人大历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草案）和六届政协历次会议的常委会（工作报告》（草案），国家的重大人事安排等，事先都同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举行座谈，通报情况，征求意见，求得共识。文件颁布之后，即表示坚决拥护，并做出决议，号召全党认真学习和贯彻。

各地方组织的负责人和党员通过参加当地的人大、政协会议和各种协商会议，积极提出意见和建议，反映群众的意见和要求，发挥了协商和监督的作用。

三、迈出了“三胞”联谊工作和人民外交活动的新步伐

农工党为了配合“一国两制”的实施，贯彻统战工作“立足国内，面向海外”的方针，对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进一步开展了“宣传政策，加强联系，广交朋友，争取人心”的工作。从中央到地方组织都设立了联络工作机构，进行调查研究，重点掌握党员所联系的“政治上有影响，经济上右实力，学术上有造诣”的三胞情况，进行形式多样的联谊活动。通过座谈会、联欢会、校友会、同乡会、学术交流、私人访问等方式，进行友好接触，联络感情，建立联系。为纪念彭泽民诞辰一百一十周年、黄琪翔诞辰九十周年，农工党分别邀请并盛情接待了他们在港澳和外国的亲属来北京参加活动，产生了良好的政治影响。农工党的党员凡有机会出国或到港澳的，都能自觉地同在外国和港澳的亲友进行联络活动。通过联络活动增进了同“三胞”的友谊，宣传了共产党的政策，介绍了大陆的情况，也为引进资金、技术、设备作了牵线搭桥的工作。有的台胞、侨胞通过联谊工作，还带着家属、资金和技术回国定居。 1986年5月，农工党在漳州举行了全国联络工作座谈会，会议为进一步开拓联络工作的新局面，起了推动的作用。

从1985年至1987年，农工党副主席方荣欣、章师明、田光涛先后作为全国政协出访团成员分别访问了前民主德国、美国、捷克、匈牙利；中央医卫委员会副主任刘渡舟作为全国人大出访团成员访问了澳大利亚。通过这些人民外交活动，增进了中国同出访各国的了解和友谊，为发展国际统一战线，维护世界和平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1985年至1987年，农工党内的许多专家学者利用学术上的优势．积极参加国际学术交流活动，为扩大国家的影响，发展国际统一战线做了大量实事。青岛的曲魁遵教授应邀参加在日内瓦举行的“第十四届日内瓦国际发明与新技术展览会”，他发明的“酒糟鼻防治新肤螨灵霜”获得展览会奖章，在国际上引起重视；福州著名医学专家李温仁教授在国际学术会议上介绍了他用高压氧激光血卟啉治疗癌症、煤气中毒、多发性硬化症等治疗方法，在国际上引起强烈反响；上海陈灏珠教授在第七届国际动脉粥样硬化学术会议上做的学术报告受到会议的表彰；昆明刘崇智教授通过学术交流，为中法友谊做出了重要贡献，在他第三次旅法期间，里昂市长将代表里昂最高荣誉的金质勋章亲自授给他；北京整形外科医院院长宋儒耀教授，以他在学术上的影响在北京召开了国际整形外科会议，同各国学者通过学术交流建立了友谊。他还协助全国政协在北京主办了有二十多个国家的专家学者参加的国际消毒会议，这是利用外资在我国举办国际学术会议的一次成功的尝试。

第二节 进一步开拓为四化建设服务的新局面

一、为发展社会生产力作出贡献

农工党“九大”之后，在中共“十二大”和“十三大”精神指引下，各地组织的工作进一步活跃，广大党员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积极性不断提高。 1984年8月，农工党因势利导，在安徽休宁召开了全国工作会议。会议总结了一年来的工作，认为“工作是活跃的，路子是正确的，成绩是显著的”。时今后的工作指出“社会主义阶段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社会生产力。农工党当前的任务，是在共产党领导下，团结全体党员和所联系的群众，充分调动他们为四化建设服务的积极性，为发展社会生产力做出贡献。这是我们工作的根本指导思想，是我们，切工作的立足点和出发点”。

在工作会议精神的指导和推动下，广大党员在各自的岗位上勤奋工作，刻苦钻研，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挥才智和能力，积极做出贡献。广东省人民医院眼科主任张娥，深入到五十多个县为群众防治眼病，使一万五千多名盲人重见光明，并在防治麻风性眼病方面，填补了我国眼科的空白，《南方日报》称她是“光明的使者”。大连铁道学院教授王传雅的“相性变塑”钢(Trip)，引起了国际上的瞩目，成为我国金属材料亚温淬火研究的开创者，填补了我国金属热处理研究的空白。白贡农科所副所长易明权成功地提出了“盐田旱作改造技术研究”，把受盐卤污染的常年低产田，三年间由原来平均亩产95公斤的水稻猛增到865.5公斤，创造了“水稻多叶壮秧高产栽培技术”，在四川推广达二千多万亩。

1985年6月，农工党在北京召开了“为四化服务经验交流和表彰大会”。到会的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医卫、科技、文教等各条战线上的先进集体代表23个，先进个人代表183人，他们都是在本职工作、体制改革、对外开放、面向社会、咨询服务、“三胞”联谊等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被中共和政府授予光荣称号或嘉奖的劳动模范和先进分子。同年10月，各民主党派和全国工商联在中共中央的关怀与帮助下，在北京联合召开了“为四化服务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代表表彰大会”。农工党参加表彰大会的有天津、上海、苏州、合肥4个先进集体代表和来自全国各地的41名先进个人代表。习仲勋到会作了重要讲话，赞扬代表们的“爱国热情和献身精神，是推动我们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断前进的重要动力。”饧静仁在讲话中也表彰“代表的先进事迹，表现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尚品德”。表彰先进的活动有效地鼓舞和调动了广大党员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积极性。据同济，1983年至1988年，农工党党员获得国家、部委、省市的先进称号和荣誉嘉奖的，共有一万多人次。

二、积极参加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是社会主义建设不可或缺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1986年1月上旬，农工党在全国工作会议上提出：“要在中共十二大路线和中共全国代表会议精神指引下，抓思想，办实事，为积极投身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而努力。”1月中旬，农工党九届五次中常委会议做出决议，号召全体党员“要认真学习胡耀邦和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的重要讲话，发扬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优良传统，加强思想建设，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为实现党风和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做出更大的贡献。”4月中旬，农工党九届六次中常委会议决议，要认真学习贯彻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六届四次会议的精神，完全拥护关于“七五”计划的报告，完全赞同两个文明建设一起抓的战略方针。

1986年9月28日，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 9月29日，农工党在京中委举行座谈会，认真学习讨论了中共的《决议》。周谷城在发言中表示要反复学习，透彻理解，信守原则，加强修养，使我们的精神生活、道德品质不断提高。10月14日至20日，农工党九届七次中常委会议认真学习了中共的《决议》，并通过了《关于拥护（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的决议》，号召全体党员积极参加精神文明建设，要结合四项基本原则教育，把学习、宣传、贯彻中共中央《决议》作为我党当前的中心工作和长期的政治任务。通过学习提高认识，统一思想，增强信心，自觉地投身到以团结和建设为主导思想的精神文明建设中去。

1987年1月间，周谷城在接见农工党全国党刊工作座谈会的代表时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有了共产党就有了一切，共产党是全国人民的核心领导力量，只要弄通了这个道理，一切工作围绕这个精神，就不会犯大的错误，犯了错误也很快就会改正。”当时，我国政治生活中已开始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1月4日，农工党召开九届三中全会。会议通过了《关于参加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意见》，指出当前一些学生上街游行的举动，是不利于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的。要求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要认真学好中共中央的有关重要文件，对当前社会上极少数人搞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我们要旗帜鲜明，立场坚定地反对那些企图摆脱共产党领导，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错误思潮，拒绝参加任何违背宪法的社会活动，对党员和所联系的群众进符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教育，仍是全党思想政治工作的中心任务，也是参加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主要内容。”《意见》得到全体党员的响应，普遍对学生对子女等做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说服教育工作，收到了积极的效果。邓小平在《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一文中说：“在这次学生闹事中，民主党派表现是好的，周谷城、费孝通、钱伟长等几位著名的民主人士的态度是好的”，在全国人大六届五次会议上，农工党的几位著名科学家、教育家李温仁、刘云波、余宝笙、唐念慈等作为人大代表，对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提出了自己的建议，认为当前的紧迫任务是要加强对年轻一代的教育。

农工党的广大党员通过组织的推动和自身的努力，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做出了很大的成绩。几年来先进分子队伍不断发展壮大，好人好事频频出现。

二、 为咨调服务进一步发挥优势

农工党“九大”以后，各级组织继续推动党员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前提下，按照“实事求是，量力而行，拾遗补缺，讲求实效”的原则发挥优势，面向社会，围绕为四化服务这个中心开展咨询服务活动。

咨询服务，这是农工党在新的历史时期为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是为符合广大党员愿为四化多做贡献的需要而开展的一项政治活动，是农工党开创工作新局面的重要内容和特征。1984年，各地组织先后派出25批共80名专家学者，分赴内蒙古、云南、贵州、新猫、广西、宁夏6个省区进行智力支边，完成83个项目和209个专题讲座的任务。

农工党各地组织开展的咨询服务活动，是在实践中不断走出新路子，开辟新领域的。上海市委会的咨询服务活动是从上海市区发展到郊区的青浦、嘉定、松江各县；由上海市发展到外省的江苏、浙江、湖南、云南。服务的范围越来越大，服务的形式越来越多。

农工党的咨询服务活动都得到当地党政领导的配合与支持，这是工作取得成绩的重要原因。1986年，农工党先后于3月和8月成立了由川、滇、黔、桂、渝组合的“西南四省（区）五方咨询服务横向联合协作区”和由京、津、晋、冀、蒙组合的“华北五省（区）市咨询服务横向联合协作区”。“西南协作区”一成立，农工党就决定将贵州省列为重点支援地区之一，并指定威宁县作为农工党贵州省委会的支援点。中共贵州省委书记也做出指示：“要感谢并欢迎农工民主党的同志们支援威宁县开发建设，希望威宁县做好项目可行性研究，提出需要技术支援的项目，并尽快落实。”农工党也及时地将与贵州省人民政府签订的会谈纪要下达到有关省市组织，“希望承诺支援贵州的各省市组织尽快落实支援的项目，以期尽可能帮助贵州各族人民脱贫致富，为开发我国西部地区的经济做出贡献。”“华北协作区”到唐山、秦皇岛进行咨询服务时，得到唐山市委副书记郑宝林和秦皇岛市委副书记刘任英的大力支持，他们介绍了两市对外开放的经济发展情况和城市远景规划，初步认定了纺织、食品、药材、计算机软件等19个意向性项目。

1987年，农工党在多年开展咨询服务工作取得成绩和经验的情况下，成立了中央职能机构“咨询服务部”，各地方组织也成立了相应的工作机构，开展多渠道、多领域、多层次的咨询服务活动。按1987年底的统计，全党先后建立咨询服务单位（如门诊部）227个，I参加咨询服务人数732批共2994人；完成咨询项目2102项；支援“老、少、边、穷”地区26个；创办业余学校135所，短期培训班138个，结业人数275227人；举办专题讲座5929次，听讲人数达791 833人次。这些活动都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益，深受群众的欢迎。1988年2月27日，“国务院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给农工党发来感谢信说，农工党“开展技术扶贫，智力支边，为贫困地区经济开发做出了重要贡献，我们表示衷心感谢”。

第三节 加强自身建设

一、初步实现领导班子新老结合和交替

80年代中期，农工党面对新时期的新任务，开拓了为四化建设服务的新领域，组织规模也有较大发展。同时，从中央到地方的领导层年龄日益老化，需要引进新人，加强领导班子和工作班子。 1986年1月9日至13日，农工党在北京举行全国工作会议。会议的主要议题是根据1985年中共全国代表会议有关“引进新人”的精神讨论研究了引进新人、加强中央和省一级组织的领导班子和工作班子建设的问题。中共中央统战部长阎明复到会讲话，体现了共产党对民主党派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关心与重视。通过会议，各级组织对于“引进新人，逐步实现领导班子的新老结合和交替”，有了新的认识和思想上的准备。

12月29日至1987年1月4日，农工党在北京举行九届三中全会。会议通过了《关于同意季方辞去中央委员会主席职务的决定》，并一致推举他为名誉主席；选举周谷城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增选姚峻、章师明、田光涛、杨烈宇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全会给季方写了《致敬信》,，表示对他在革命和建设中的卓越贡献，以及他坚辞主席职务，顾全大局，团结同志的高尚品德，永远奉为学习的榜样。

农工党为了进一步加强中央领导班子的建设，解决有关人事安排和组织机构等重大问题。1987年6月18日至24日，在北京召开了全国代表会议。宋任穷代表中共中央到会祝贺并作了重要讲话，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全国政协的领导人习仲勋、廖汉生、刘澜涛出席了开幕式。会议通过了《关于中央和省级组织设立荣誉职务的决定》、《关于设立中央咨监委员会的决定》、《中央咨监委员会组织条例》、《关于接受部分老同志辞去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的请求报告》和《给老同志致敬信》；通过投票，选举卢嘉锡、何世琨、李健生、郭秀仪、梅日新、汪德耀、刘宗宽等44人为中央咨监委员会委员，组成中央荣誉机构中央咨监委员会；递补中央候补委员邓京育等34人为中央委员，增选周骏羽等16人为中央候补委员。

6月25日举行中央咨监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选举卢嘉锡为中央咨监委员会主任，何世琨、李健生（女）、郭秀仪（女）、邓吴阴、李洁之、梅日新为副主席。同时举行九届五中全会，增选阎洪臣等8人为中央常委会委员。

农工党全国代表会议胜利闭幕，为中央领导班子建设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

二、为纪念主要负责人诞辰举行座谈会

农工党自1930年正式建党以来，他的创党人和历来的主要负责人邓演达、黄琪翔、章伯钧、彭泽民皆于粉碎“四人帮”之前先后去世，他们有的是被蒋介石残杀，有的是建国后不久病逝，有的则是在遭受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残酷迫害中去世。为了缅怀他们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功绩，继承和发扬农工党的优良传统，对全体党员进行一次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教育，农工党党于1985年至1988年先后为纪念他们的诞辰举行了座谈会。

1985年3月1日，是邓演达诞辰九十周年，农工党在人民大会堂为他举行了纪念座谈会。11月11日，农工党同民主同盟在政协礼堂联合举行纪念章伯钧诞辰九十周年座谈会。 1987年11月7日，是彭泽民诞辰一百一十周年，农工党在人民大会堂为他举行了纪念座谈会。1988年9月2日，农工党为纪念黄琪翔诞辰九十周年，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座谈会。

以上的纪念座谈会，都由周谷城主持并讲话，分别介绍了他们的生平事迹，对他们表示深切的怀念。

农工党“九大”以后，各级组织认真贯彻了《关于民主党派组织发展问题座谈会纪要》精神，在巩固组织的基础上，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发展组织的工作。到1988年，全国已建立省、自治区、直辖市组织29个，省辖市、县（区）组织163个，基层组织2 257个，已经形成了全国规模的组织体系。据1988年6月底统计，全国党员人数从“九大”时的13770人增到了34104人。新党员中医卫界占61. 74%，文教界占19.9%，科技界占11.2%，其他占7.15%。高中级知识分子占72%；中青年占74%。平均年龄为52.2岁，比原有党员的平均年龄下降了7.8岁。新党员的素质是好的，他们思想敏锐，工作热情，富有生气，为组织增强了活力。

农工党九届三中全会和全国代表会议之后，中央为了指导和帮助地方组织的换届选举工作，制定了《关于省、直辖市、自治区召开代表大会进行换届选举的意见》，各地方组织根据中央规定的原则和政策，到1988年顺利地进行了换届工作，许多老同志发扬风格，扶持新进，使地方组织的领导班子年轻化也有了新的进展。各级组织还自觉地加强了机关建设和基层组织的建设。农工党的组织面貌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第十章 沿着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继续前进

第一节 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

一、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

1988年，中共十三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在坚持改革开放总方针总政策的前提下，认真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和全面深化改革的指导方针和政策措施。在这种形势下，爱国统一战线要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进一步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民主、和谐的政治局面，以保征共产党的指导方针和政策措施的顺利进行。农工党为了讨论当前形势，明确方针任务，修改党的章程，选举新的领导机构，于11月9日至13日在北京召开了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会议的有九届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第一届中央咨监委员和各地选出的代表周谷城、卢嘉锡、沈其震、方荣欣、姚竣、章师明、田光涛、杨烈宇等572人。大会开幕式由周谷城主持并致开幕词。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芮杏文代表中共中央向大会致贺词，对农工党的历史贡献和工作成绩给予了充分肯定。民建中央主席孙起孟代表各民主党派和全国工商联向大会致贺词。会上，卢嘉锡做了《团结起来，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继续前进的工作报告》，邓昊明做了《中央咨监委员会的工作报告》，章师明做了修改党章的说明。大会学习讨论了中共十三届三中全会文件，一致拥护全会制定的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和全面深化改革的指导方针和政策措施，通过了新的党章。

大会选出了中央领导机构中央委员会和荣誉机构中央咨监委员会，卢嘉锡等160人当选为中央委员，左焕琛（女）等25人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沈其震等87人当选为中央咨监委员。

11月13日举行咨监委员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沈其震为中央咨监委员会主席，叶桔泉、李健生（女）、郭秀仪（女）、邓吴明、李洁之、梅日新为副主席。 14日举行十届一中全会，选举卢嘉锡为中央委员会主席，方荣欣、姚峻、章师明、田光涛、杨烈字、光仁洪、翦天聪、陈灏珠为副主席。

一、经受政治风波的考验

1989年4至6月，在我国发生了一场政治风波。在这场风波中，农工党各级组织和广大党员依靠中共党组织的领导，坚定工作岗位，逐步提高认识，经受了考验，有的还有很好的表现。副主席杨烈宇在大连做了许多稳定局势的工作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宁波市委会副主委常敏毅5月18日以“急件”上书中共宁波市委领导人，态度鲜明地提出了反对政治动乱的意见。上海昆剧团著名演员梁谷音等在5月天安门事件爆发时随团赴美演出。她在美国传媒对中国歪曲报道，干扰重重，诱惑阵阵的情况下，巍然不动，拒不留美，坚决如期返回祖国，表现了对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祖国的赤胆忠心。农工党上海市委会授予梁谷音、岳美缇、王根起为优秀党员称号。嘉奖她们赴美演出期间“是非分明，意志坚定，歪曲宣传不为惑，策反伎俩不为动，金钱物质不为诱，坚决如期返回祖国”的事迹。

动乱平息以后，农工党于6月13日举行主席（扩大）会议，卢嘉锡主席和在京的副主席方荣欣、章师明、田光涛、咨监委员会主席沈其震以及部分中常委、咨监委常委和中央机关各部门负责人参加会议。会上认真学习讨论了邓小平在接见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的讲话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告全体共产党员和全国人民书》，一致拥护邓小平讲话和对平息暴乱所采取的果断措施。号召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要明辨是非，顾全大局，同共产党保持一致。

6月17日，中共中央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讨论邓小平讲话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告全体共产党员和全国人民书，同时听取党外人士的意见。农工党方荣欣、章师明、田光涛参加座谈会。方荣欣代表农工党在会上发言说，对邓小平讲话，我们农工党完全赞成、坚决拥护。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为平息反革命暴乱所采取的果断措施，我们坚决拥护。对这个大是大非的问题，我们一定要明辨是非，把思想统一到邓小平讲话精神上来。

7月11日，农工党在十届二次中常会（扩大）上，一致通过了《关于学习贯彻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精神的决议》，要求全党认真学习四中全会公报及有关文件和邓小平最近的多次重要讲话，联系实际，回顾过去，思考未来，总结经验教训。各地组织响应了中央号召，推动党员认真学习中共四中全会文件，有的举办了短期学习班，有的进行脱产学习，开展了一次深刻的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教育。在这次政治风波中，农工党的广大党员既经受了考验，也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教育。

三、开展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教育

1990年2月8日，首都各报发表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这个文件，是在我国长期的革命和建设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是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坚持和完善这项制度，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文件发表的当天，农工党即召开主席（扩大）座谈会，对文件进行认真学习和讨论。同时发出《关于认真学习、宣传、贯彻（意见）的通知》，提出在全党开展一次“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教育”。

3月13日至15日，农工党举行十届中常委第四次会议。会议强调要把认真学习、宣传、贯彻《意见》，作力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的一项重要任务。会议通过了《关于拥护中共十三届六中全会公报的决议》和《关于拥护和贯彻（意见）的决议》。11月上旬的十届中常会第五次会议和12月下旬的十届三中全会，也都是研讨进一步深入学习《意见》的问题。通过这些会议，各级组织都逐步深入地开展了学习《意见》的活动。

12月上旬，农工党中央在全党学习《意见》的基础上，举办了《多党合作理沦研讨会》，从论文的数量和质量上都反映出了一年来学习《意见》的丰硕成果。各地组织的负责人和部分党员也在党刊上笔谈学习《意见》的体会，吉林、广西等地方组织，还举办了学习班。通过对《意见》的学习，农工党的广大干部和党员，受到了一次统战理论和统战政策的教育。基本上明确了我国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特点和优点，分清了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和资本主义政党制度的界限；明确了我国民主党派的地位、作用和职能以及所肩负的历史使命。

1991年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建党七十周年。农工党从中央到地方各级组织，在学习《意见》精神鼓舞下，群情振奋，把共产党的诞辰当作自己的生日，纷纷举行了热烈的庆祝活动。周谷城发表了《毛主席鼓励我参加农民协会》的文章，卢嘉锡发表了《党的阳光照亮爱国知识分子前进的道路》的文章。许多地方组织负责人和部分党员满怀激情地发表诗文表示庆祝。在农工党中央的庆祝会上，卢嘉锡做了《肝胆相照，始终不渝》的发言。农工党中央还向中共中央献上由农工党员、百岁著名国画大师朱屺瞻特作的《松石长寿》国画一幅。国画拟意深长，用意真挚，以祝贺共产党的诞辰。并通知全党“要认真学习江泽民总书记在中共建党七十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以提高认识，指导行动”。

第二节　不断提高参政议政的积极性

一、多层次多渠道的建言献策

在七届人大、政协期间，农工党党员当选为各级人大代表的有1195人，担任各级政协委员的有4373人，他们以主人翁姿态，本着“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 荣辱与共”的精神，参政议政的积极性空前高涨，表现在建言献策方面，进一步发挥着参政党的作用。

1990年3月，在全国政协七届三次会议上，卢嘉锡做了《加强多党合作，为我国的稳定发展竭智尽力》的发言。农工党小组提出有关保护森林资源，改善民族工作，严打贩毒吸毒，农田水利建设以及医院管理、汁划生育、工资改革、公费医疗等方面的提案共42件。

9月6日，杨烈宇在全国人大七届十五次常委会上提出了“尽快给工业企业创造科技投入的必要条件”的建议。

1991年2月，农工党上海市委会在市政协会议上提出“创办上海中医结合的专科 医院”和“要求巩固充实医药卫生二级防治网和里弄卫生站”的提案。这是经过实地调查，反复论证之后提出的，被上海市政协评为优秀提案。农工党重庆市委会主委韦思琪在“征求意见座谈会”上提出的“恢复四川森林植被刻不容缓”的建议，受到省农业厅的高度重视，被认为“是具有远见卓识的意见”，有关部门立即进行研究。

1991年全国政协举行七届四次会议，卢嘉锡在会上做了《大力发展科学和教育，为实现第二步战略目标而奋斗》的发言，提出人大提出的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纲要草案，是经过几个月来的反复讨论，集中了党内外各界的智慧，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倡导的重大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精神。他代表农工党表示完全拥护。方荣欣、田光涛等分别作了有关加强农村医疗卫生的建议、深入反腐败斗争、加强公费医疗改革等七篇发言。会议期间，陈灏珠等联合提交的（迅速采取有效措施稳定高校青年教师队伍的提案》，是根据在上海、北京、浙江、广东、福建等省市进行专题调查之后提出的，6月13日得到国家教委的答复，并表示感谢对教育工作的支持。田光涛等联合提交的《关于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的建议案》得到中纪委、监察部、审计署的答复，并被全国政协评为优秀提案，受到了表扬。在这次会议上，农工党小组共提交提案五十多件，是历来提案最多、质量最高的一次，反映了农工党的委员们关心国家大事的能力和积极性有了进一步的提高。在全国人大七届四次会议上，梅日新代表做了《切实解决高校教师的断层问题刻不容缓》的发言，表达了关心教育事业的急切心情。

农工党上海市委会为了促进和完善高校师资的国内外合理交流，提出了“45条对策建议”，受到上海市教育局的重视，于6月3日派负责人到农工党上海市委会，通报了对“建议”的处理情况。浙江、江苏、福建等省组织分别在省政协的六届五次会议上积极提出提案，受到当地党政领导的重视和表扬。

农工党南京市委会的一批专家关心社会公益事业，于1991年春经过调查研究之后，主动就“进一步增强城区的防汛排涝能力，以抵御今后可能发生的灾害”向中共南京市委、市政府提出了专项建议，受到市领导的高度重视。市长立即要求市建委将“建议”纳入城市防洪规划。当年夏季，南京市果然遇到百年未遇的特大洪涝袭击，而古城却安然无恙。

1992年2月，农工党上海外经贸支部根据多年的工作经验和认真的调查研究，提出了对《对加强广交会管理的几点意见》，受到了有关部门的表彰。上海《新闻报》还将他们的事迹在头版头条做了报道。

人民政协是民主党派建言献策的主要渠道之一。作为参政党，建言献策是体现社会主义民主的一种形式，只要对国家和人民有利，渠道是多种多样的。 1989年5月，农工党咨询考察组到河北秦唐沧地区考察，农业专家们在唐海县、南丰县发现稻田中的稻水象岬虫口密度很大，立即向有关部门发出“关于尽快消灭稻水象生甲的紧急呼吁”。不久，得圉务院办公厅函复：“已经提出防治方案，现已经实施，并取得了明显的效果。”1991年夏季，南京市经历特大洪涝之后，农工党南京市委会立即组织专家进行调查，向中共南京市委和市政府提出“关于防止灾后疫病流行的五点建议”，受到市政府的重视与采纳。

二、卢嘉锡身先咨询考察的第一线

1992年6月20口，江泽民在党外人士情况通报会上说：“一些民主党派的主要负责同志还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就区域性、专题性的经济发展战略进行论证，提出了不少好的建议。”这时，坐在他旁边的卢嘉锡从愉林考察回来才4天。卢嘉锡是中国当代著名的科学家，他充分利用科技优势，发挥参政党的作用，每年都组织各方面的专家学者，亲自率领他们到各地咨询考察，足迹遍及祖国的东南西北。

1989年2至3月间，卢嘉锡率农工党专家考察组赴河北秦（皇岛）唐（山）沧（州）开发区进行考察，除对该区的开发发展规划和建设方案提出了客观的决策咨询外，并向有关部门提出了许多建议。如：“神府煤田出口港以选建在黄骅为宜”，“在乐亭五滩建设冀东钢铁厂基地”等。5月间，农工党以卢嘉锡为组长，方荣欣、姚峻、翦天聪和河北省主委马新云为副组长，率考察组赴河北秦唐沧渤海湾开发区，对唐山、秦皇岛进行第二阶段考察咨询活动。

1990年4月中间，卢嘉锡率领15位专家、教授组成农工党考察咨询组，到贵州毕节地区着重考察了大方、毕节、织金等县的金银山温饱工程、河官屯水土保持工程、3356营林工程等开发扶贫、生态建设项目，并提出了具体意见和建议。在智力支边工作会上，农工党的支边先进个人常近时教授，先进集体农工党贵州省委会咨询服务部受到表彰。贵州省政府还赠送农工党中央“智力支援，兴黔富民”的锦旗一面，表示感谢。

1991年5月，卢嘉锡率农工党考察组到广西重点考察了百色地区的扶贫开发工作。初步考察了钦州湾和白海市，一共考察了7个县市，行程1800公里，召开了各种座谈会16次，阅读文字资料45种计100多万字。

1992年6月，卢嘉锡应陕西榆林地区邀请，率农工党考察组15名专家到榆林地区进行咨询考察，科技扶贫。以实际行动贯彻小平同志的南巡谈话，也是向革命老区扶贫咨询活动。考察组重点考察了该地区的资源开发、经济建设和扶贫工作。先后考察了神木县大柳塔矿区，参观了靖边县天然气井等，提出了咨询意见和建议，还对该地区的文教、卫生事业和支柱产业作了重点考察。考察之后，向中共中央、国务院提出了“引进海外资金，加快开发煤田及有关港口、电站等建议”。

1993年7月，卢嘉锡率农工党考察组到内蒙的包头、东胜、呼和浩特三市，考察了东胜煤矿、达拉特电厂、呼和浩特石油炼厂、包头的稀土科研与生产等。建议优先发展内蒙中部的“金三角”地区，并提出厂开发的具体意见。卢嘉锡还就加强国家对稀土工业的宏观调控上书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国家经贸委对考察组的意见和建议复函表示赞同。

1994年10月中旬，卢嘉锡应中共福建省委、省政府的邀请，率考察组13人到福建咨询考察。福建省党政领导人对考察组提出的意见和建议，表示欢迎和感谢，认为对龙岩的发展有现实和长远的指导意义。

三、发挥智力优势为社会多做实事

从80年代起，农工党一直把咨询服务支边扶贫作为发挥参政党作用的一项重要工作来对待，并在实践中不断由微观的咨询服务向宏观的咨询服务，向战略咨询和国是咨询的领域扩展；从一时一地零散的进行咨询发展到几个地方组织联合的区域性协作咨询。1989年起，农工党各地组织为加强咨询服务和支边扶贫工作，先后成立了由川、滇、黔、桂、渝五省（区）市组合的西南咨询服务协作区，由京、津、冀、晋、蒙五省（区）市组合的华北咨询服务协作区，由沪、江、浙、鲁、皖、闽、赣7省市组合的华东咨询服务协作区，由辽、吉、黑三省组合的东北咨询服务协作区。协作区的原则是：“宏观着眼，微观着手，立足本地，服务建设，发挥优势，互相支援，量力而行，讲求实效。”目的是为社会多做实事。为我国“十年规则”和“八五计划”的实施做出贡献。

农工党许多省、自治区组织，对本省、区贫困地区的经济开发，做了调查研究，向当地中共党委和政府提出厂意见和建议，并得到重视与支持。如福建省委会对周宁县、龙岩市等贫困地区的农业生产规划作了实地调查研究和考察论证，并通过立项给予长期的具体指导；云南省委会多次到贫困地区武定县对该县的三级医疗网和卫生工作进行调查，与卫生局和有关单位协商，为当地实现2000年人人享有卫生保健目标，提出了具体的建议；甘肃省委会对酒泉地区的甘草作了调查吉普，向中共甘肃省委、省政府建议成立酒泉甘草种植出口开发区。《人民政协报》以“酒泉将成为我国主要甘草基地”为题作了报道。

坚持为改变贫困地区的卫生状况和落后面貌做贡献，也是农工党开展社会服务的项目之一。辽宁省委会派出7批医务人员到本省的贫困县喀左县帮助当地解决缺医少药和“看病难”的问题，并为县医院的发展出谋献策，收到良好的效果；安徽省委会负责人在本省发生的特大洪灾中，带领由医疗、防疫专家组成的救灾医疗队，到贫困地区六安县进行医疗服务，为群众送医送药，指导群众防疫防病，受到群众的好评；江苏、江西、湖南等省委会，在抗洪救灾中，都大力组织医疗队，到本省的贫困地区为群众防病治病，被群众所称赞。

卢嘉锡多次强调：“扶贫先扶志，致富先育才。”这是扶贫工作中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在广西百色地区，有12个县市种植的白毫茶是一种名优茶种，但产品质量不高。为提高茶品质量，取得好的经济效益，农工党中央委托广西、广东两地组织在广州举办了培养茶叶生产技术人员培训班，效果极好。现在该地所产的“凌云白毫茶”已获农业部颁发的“名优茶品种鉴定认定书”，经济效益大有提高。浙江省委会组织了17批专家、教授，到丽水、台州举办医疗卫生和农业技术培训班；吉林省委会到延边地区进行讲学兼义诊；广西区委会组织专家、技术人员到本区14个边远地区开办各种专业技术培训班和技术讲座，并帮助西林县的两个苗族村庄改善了人畜饮水的水源，当地群众立碑感念。

几年来，农工党发挥自身的智力优势，在18个省、自治区的“老少边穷”地区开展了支边扶贫和咨询服务工作，组织支边活动1732批次，参加的专家学者八千二百多人次，完成咨询项目近1000项，举办各种培训班和讲座740个，培训人数达七万多人。

四、“三胞”联谊工作有了新的进展

农工党为祖国统一和扩大开放所开展的“三胞”联谊活动有了新的进展。浙江省的3691名党员中，有“三胞”关系的有751人，所联系的“三胞”有2389人。为了开展“三胞”工作，杭州市委会创办了“杭州旅游医疗保健站”，全年为“三胞”432人和外宾36人治病扶伤，热情服务，受到了好评。1991年，安徽、江苏两省遭受特大洪灾，农工党的两省组织都发动党员给“三胞”写信，如实介绍灾情，通报人民群众正按共产党和政府领导帮助下抗洪救灾的斗争情况。通过工作，许多“三胞”慷慨捐资支援祖国的抗洪救灾。无锡市党员侯汝良在台湾的亲属寄来了救灾的新台币1000万元，南京市党员馀碧影在美国的亲戚寄来了赈灾款美元10万元。 1991年，广东省委会通过“三胞”联谊活动，引进资金人民币1878万元，美金335万元，港币271万元，协助“三胞”开办企业25个，引进工厂4家和先进设备30多套。由“三胞”捐建中、小学6所，职校1所，文化室1所，教学楼1座，老年活动中心2所，以及修建公路、桥梁等。

1988年10月，郭秀仪应邀到旧金山参加世界客属恳亲大会，同台湾和世界各地的28个客属代表团体共586人欢聚一堂，共叙乡情。她向乡亲们介绍了中国的民主党派，宣传了共产党的统一战线，使大家感到惊异，也大大缩短了同祖国的思想距离。会上不问政治观点如何，都十分关心祖国的统一。同年11月，国民党元老陈立夫給著名生物学家、教育家汪德耀来信，交换有关教育和中医方面的意见。同陈立夫保持通信联系的，还有四川省中医研究院院长郁文俊，他俩自1987年起就常通信交流对中医研究的心得。

1989年4月，农工党主席卢嘉锡、副主席姚峻同民主促进会主席雷洁琼共同会见了台湾“立法委员”、和平统一访问代表团团长赞希平一行17人，宾主进行了亲切的交谈。农工党咨监委员会主席沈其震，几年来支持他的内表弟新加坡华侨莫若愚在天津投资约3000万美元兴办合资企业，还捐赠亚运会50万美元，捐赠上海交大100万美元。亚运会期间，受到李瑞环、吴学谦、钱正英的接见。农工党上海市委会副主委、孔子学会副理事长孔令朋参加海内外有关孔子的纪念活动、学术活动等，同台、港、澳的儒学专家和孔氏宗亲有广泛的接触与交往。经他的努力，著名爱国同胞沈炳麟为曲阜捐助人民币20万元，建造了杏坛中学的实验楼。

1991年11月，农工党咨监委员会副主席梅日新，组织大陆10多位梅氏宗亲到香港参加世界梅氏宗亲恳亲会，同去的农工党中委梅葆明和她弟弟梅葆玖在恳亲会上网台演出梅派京剧，轰动了香港。会后梅日新带领139位梅氏宗亲回大陆拜祖。

1992年3月，农工党党员、著名曲艺表演艺术家魏喜奎应邀去台湾讲学，在台湾引起轰动，广交了朋友。

“三胞”联谊工作是农工党多年来的一项经常性的工作，以上所述，只是工作的一斑。但从中可以看出，工作是有成绩的，也是大有可为的。

第三节 自身建设的新篇章

一、开展工作新局面的党史工作

农工党是大革命失败前后酝酿建党的，有较长的革命斗争历史，有自己的政治主张。民主革命时期在共产党的影响、帮助和指导下，逐步走上同共产党合作的道路，同共产党结下了“风雨同舟，荣辱与共”的战斗友谊。农工党的历史是中国现代史、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它反映了中国社会状况和政治斗争的特点，放射出了毛泽东思想的光芒。可是长期以来，农工党内绝大多数的老同志在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下经受着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双重压迫而奋斗了大半辈子，到建国以后却因“左”的影响而不敢正视农工党的历史，把农工党史视若禁区，不敢涉足。以致人亡史没，使许多 “三亲”资料和文献资料蒙受了不可弥补的损失。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经过拨乱反正，民主党派历史在共产党的倡导下逐步受到重视，全国政协和中央统战部提倡编写民主党派史，一些高等院校也开始讲授民主党派史。在形势的推动下，1980年中央聘请各地的建国前入党的老问志五十余人为委员，成立了党史工作的职能机构“党史资料研究委员会”，配备专职干部，着手进行党史资料的抢救、发掘、收集、研究和编写工作。从此，农工党的党史工作在全国政协和中央统战部的关怀、指导下，高举爱国主义旗帜，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思想，本着“存真求实”的原则，通过各地组织和一些老同志的协助，得以征集到一些宝贵的资料。1985年3月，农工党在南京举行党史委员会议，会上老同志们发表了意见，提供了史料，对农工党的历史有了一致的认识，为研究和了解农工党历史提供了可靠的素材和依据，也为澄清一些历史问题找到了有力的论证。

几年来，农工党的党史工作在全国政协和中央统战部的关怀、指导下，参加编写了《中国各民主党派》、《世界政党辞典》、《中国人名辞典》、《华夏妇女名人辞典》、《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等书；编辑出版了从创党到1957年的历史文献《中国农工民主党历史参考资料》第一、二、三、四、五辑，为纪念党内历史人物编辑出版了图文并茂的《邓演达》、《纪念彭泽民》、《纪念黄琪翔》、《纪念季方》、《纪念丘哲》，写出了《章伯钧传》初稿，为庆祝建党六十周年编撰出版了大型画册《中国农工民主党六十年》和简史《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奋斗历程》，编写了农工党历史纪录片《风雨喜同舟》解说词等等；各级组织举办的干部培训班、新党员学习班，都有介绍党史，学习党史这一课，还经常为地方组织、党外有关单位和高等院校介绍农工党史和提供党史资料等等。所以，农工党的党史工作，既是党史资料的收集、研究和编写工作，也是为农工党宣传教育服务的工作。

二、隆重庆祝建党六十周年

1990年8月9日上午，农工党中央在全国政协礼堂隆重集会，庆祝建党六十周年。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李瑞环代表中共中央到会祝贺并讲话。庆祝大会由农工党名誉主席周谷城主持，卢嘉锡主席发表讲话。到会祝贺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书记处书记丁关根，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习仲勋，全国政协副主席钱正英、侯镜如，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黄埔同学会的负责人。农工党中央负责人方荣欣、姚峻、章师明、田光涛、沈其震、郭秀仪出席了庆祝大会。参加庆祝大会的还有农工党中央和北京市委会机关的全体干部和党员共千余人。

李瑞环在讲话中赞扬农工民主党是历史悠久，具有爱国革命传统的民主党派，在我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中，同中国共产党长期合作，共同奋斗，做出了重要贡献。他说，中国共产党为有农工民主党这样长期风雨同舟、患难与共、通力合作的亲密友党，感到由衷的欣慰。他表示相信，农工民主党和其他民事党派，一定能进一步同我们党一道高举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旗帜，努力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为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为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为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为促进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祖国而努力奋斗。

卢嘉锡在会上作了题为《继承和发扬我党优良传统，面向未来，开拓前进》的讲话。他回顾了农工党建党六十年来所走过的历程后指出，总结我党六十年来的历史经验，最根本、最重要的有以下三条要牢记：第一，坚定不移地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第二，积极参加革命和建设，为人民多做好事，多做实事，为振兴中华多做贡献；三，发扬我党自我教育的优良传统，顺应历史潮流，不断前进。

卢嘉锡号召全党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高举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两面旗帜，为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服务，为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服务，为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服务，为促进“一国两制”、和平统—祖国服务，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强国而努力奋斗。

民革中央副主席侯镜如在讲话中代表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黄埔同学会向农工党的负责人和全体党员表示热烈祝贺；国家医药管理局、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向大会送来贺信，北京东方书画社及部分党员为大会献画、献诗。大会散发了纪念品大型画册《中国农工民主党六十年》和《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奋斗历程》一书。

全党各级组织也在同一天举行了庆祝大会，全体党员受到了一次爱国的、社会主义的党的传统教育。

三、全面加强自身建设

为了更好地发挥参政党的作用，农工党把自身建设摆在了十分重要的地位，提出要加强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首先是加强各级领导班子的建设，还要加强机关建设。

1989年10月中旬，农工党在西安举行自身建设研讨会。会议以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精神，邓小平多次的重要讲活和江泽民总书记国庆讲话为指导，分析研究和全面估计了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的状况，总结了过去自身建设的经验，提出今后的要求是：1.要坚定不移地接受共产党的领导，走社会主义道路；2.要充分认识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性、迫切性和长期性；3．要加强组织建设，特别是各级领导班子的建设；4．要警惕和反对农工党内腐败现象和不正之风的发生与滋长；5．要进一步树立和维护各级领导集体的威信。12月中旬，农工党举行十届二中全会。会议以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五中全会精神和江泽民总书记讲话为指导，重点讨论了自身建设的问题。卢嘉锡在会上做了《加强学习，总结经验，坚定信心，继续前进》的报告。与会委员通过学习讨论，明确了农工党的自身建设，领导班子建设是核心，思想建设是根本，基层组织建设是基础，机关建设是保证。会议决议，一致拥护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做出的关于经济工作和人事调整的各项重要决定。

农工党提出机关建设，是以提高专职干部的政治素质和业务水平为目的的。几年来中央和各地组织对专职干部进行各种形式的培训、组织理论政治学习，建立健全机关的规章制度。《各民主党派关于加强中央机关建设问题座谈会纪要》下发后，各地组织的机关建设都有所加强，机关面貌也有了明显改变。

1989年10月，农工党中央委托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举办的专职干部培训第一期，数十名从各地调来的专职干部入学培训。一些地方组织也分别抽调干部到当地的社会主义学院培训学习。

1990年11月，农工党在杭州召开了思想政治工作座谈会。会上分析、估计了党员的思想状况，交流了各地培训、轮训干部及进行思想政治工作的经验。对全党进一步开展思想政治工作，起了推动的作用。同时，农工党党十届中常会五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发挥参政党作用，加强自身建设几项工作的意见》，要求以《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统一战线工作的通知》和江泽民总书记在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为指导，正确处理好发挥参政党作用和加强自身建设的关系，二者都要抓紧抓好。耍在今后二三年内，抓好几方面的工作：1．坚定不移地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维护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稳定做出贡献：2．积极参政议政，发挥我党政治协商、民主监督的作用：3．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进一步提高全党的政治素质；4.紧密围绕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开展为杜会服务和联谊工作；5.加强领导班子建设，确保各级领导集体由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与中共亲密合作的骨干组成；6.放慢组织发展速度，做好巩固健全组织的工作；7.加强机关建设，充分发挥机关的服务、联系、协调、参谋和实施作用。这个《意见》得到各级组织的贯彻执行，收到了积极的效果。

1991年4月，农工党在四川乐山召开全国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会议的主要任务是：分析、研究、估计党员的思想状况，总结交流思想建设的经验，明确今后思想政治工作的方针、任务。会后各级组织对会议的精神极为重视，采取了有力措簏，认真贯彻落实：8月间，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要求在江泽民“七一”讲话精神指导下，深入贯彻中共中央(1989) 14号文件，以加强各级领导班子建设为核心，通过换届加强和完善领导体制、维护农工党内的团结和安定，贯彻落实农工党十届中常会八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中央和省级组织换届工作的意见》。

1992年9月27日，农工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召开，正式成立了农工党新疆区委会。至此，农工党在大陆除西藏之外，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全部建立了组织。9月底，全国应该换届的25个省级组织，在学习邓小平南巡谈话的热潮中，全部完成了换届任务，分别选举产生了新的领导班子，引进了一批年富力强的新人，为农工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做好了组织上和政治上的准备。

第十一章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的历史阶段

1. 围绕中心任务履行参政党职能

　　一、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1992年底，世界正处在大变动的历史时期，两极格局已经终结，多极化趋势正在发展，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我同可以争取到一个较长时间的和平环境从事建设。全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坚定不移地贯彻“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各项事业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邓小平南巡谈话，鼓舞人心，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正在中国欣欣向荣地向前发展。在国内外既有挑战又有机遇的特殊形势下，中共十四大提出的主要任务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加快改革开放，推动经济发展与社会全面进步。这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12月3日至8日，农工党在北京召开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有十届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第二届中央咨监委员和各地选出的代表周谷城、卢嘉锡、沈其震、方荣欣、姚峻、章师明、田光涛等590人。在大会开幕式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李铁映宣读了中共中央贺词，对农工党六十多年来的历程给予了高度评价，对大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祝贺。民盟主席费孝通代表各民主党派和全国工商联向大会致以热烈的祝贺。应邀出席大会开幕式的还有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彭冲、全国政协副主席胡绳、中共中央统战部、各民主党派和全国工商联的负责人。卢嘉锡在会上做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真抓实干，为夺取有中国特色杜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做出新贡献》的工作报告。章师明做了修改党章的说明。会议审议通过了卢嘉锡的《工作报告》，新的党章和第二届咨监委员会工作的书面报告。大会推举周谷城为农工党名誉主席，选举卢嘉锡等154人为中央委员，陈子典等18人为中央候补委员，沈其震等112人为中央咨监委员。大会认真学习讨论了中共十四大文件。通过大会《决议》，一致认为，中共十四大的召开，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里程碑，江泽民总书记在大会上的报告，确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明确提出邓小平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是指导我们实现新的历史任务的强大思想武器。大会完全拥护中共十四大所确定的理论、路线和任务，决心进一步动员全党认真地学习、宣传和贯彻。大会号召全党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为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而努力奋斗。

12月9日，农工党举行十一届一中全会，选举卢嘉锡为中央委员会主席，方荣欣、姚峻、章师明、田光涛、杨烈字、翦天聪、陈灏珠、阎洪臣、宋金升、蒋正华为副主席。选出张乾二等37人为中央常委委员。同日，第三届中央咨监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一致通过：沈其震为咨监委员会主席，郭秀仪（女）、邓昊明、李洁之、梅日新为副主席，汪德耀等38人为咨监委员会常委。

二、多党合作取得新进展

中共十四大以后，以江泽民总书记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持和发展统一战线的理论和政策，使我国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进一步完善。几年来，中国共产党就重大问题与民主党派协商，已逐步形成了规范化、制度化。目前，农工党八届全国人大代表是42人，有人大常委3人，副委员长1人。全国省一级的人大代表212人，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2人；县一级的人大代表1029人，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42人。这些各级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参加国家政权，正活跃在参政议政，民主监督的舞台上。还有许多党员直接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担任了各级政府的领导职务。到目前为止，有3人担任了省部级的领导职务，14人担任了厅局级的领导职务，总计担任各级政府部门领导职务的有103人。他们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勤奋工作，尽职尽责，奉公守法，做出了自己的成绩。此外，自1990年起，农工党推荐党员担任各级政府的特约检察员、特约监察员、审计员、教育督导员，推派党员参加国家财务税收物价大检查、清理整顿公司的巡视和反腐败调查等，计约200余人。他们为国家的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为反腐倡廉做出了辛勤的努力。

按照农工党以医卫界为重点的特点，为了在方面熟悉政策，反映情况，提出建议，代表利益，发挥作用，中央和地方组织同政府的有关部门逐步建立了越来越密切的对口联系。农工党中央同国家卫生部门、医药部门等，都有了经常的接触、交往与合作，应邀参加他们的某些会议，就有关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协商讨论，向他们反映情况或提出建议等。农工党中央和国家医药管理局联合办的的“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建社十多年来，出版了图书两次多种，促进了医药科技的宣传与普及。1995年我国纪念抗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五十周年，农工党中央和国家卫生部等部门共同发起组织“纪念抗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五十周年赴老区医疗慰问团”。 8月15日，由农工党副主席田光涛任团长的慰问团，到涉县进行了为期10天的医疗慰问活动；8月17日，赴沂蒙山老区的医疗慰问团由农工党副主席蒋正华任团长，到蒙阴县、沂南县进行了10天的医疗慰问活动。1996年9月，农工党中央与国家卫生部、民政部、共青团中央共同组织了“携手创辉煌”，邀请50名革命老英雄到京欢度国庆的慰问活动。这些活动不仅加强了农工党与政府有关部门的对口联系、相互了解和合作，而且做了深受人民群众欢迎的实事。

人民政协是民主党派发挥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职能的主要渠道之一。目前的全国政协第八届委员会，农工党有委员59人，其中常委10人。在本届一年一度的一至五次会议上，他们都以十分激动的心情，列席聆听并参加讨论了李鹏总理在全国人大会议上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以及人大会议的其他报告，一致表示拥护。同时怀着高度的政治责任感，通过发言和提案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5年来，农工党的委员们在全国政协八届的历次会议上，共有13人次做了大会发言，有上百人次递交了66篇书面发言；以组织名义提案29件，以个人或联名提案262件；有16人反映社情民意18条。

目前，农工党的各级政协委员共有4680人，其中包括一批相当数量的省县级政协常委 和副主席。他们在每年出席会议中所作的发言和提案为当地中共和政府做出决策和建设发挥了积极作用。

1992年，中共中央决定邀请民主党派负责人参加重要外事、内事活动，又为多党合作增添了新的内容。农工党中央负责人方荣欣、姚峻、章师明、田光涛、宋金升、蒋正华等都分别参加了中共和国家领导人迎接和会见外宾的活动；应邀同其他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的负责人一起，先后对三峡工程、“京九”铁路等进行考察。考察结束后，在江泽民等中共中央领导人主持的座谈会上汇报了情况，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祖国。这是中华民族的百年盛事，标志着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在完成祖国统一业的道路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农工党中央从3月份起，便制定了迎香港回归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计划，全党各级组织按计划开展了一系列的活动。

6月30日，农工党中央常务副主席方荣欣，同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主要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团成员，陪同江泽民主席出席中国政府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的政权交接仪式。参加这次盛典，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等的巩固联盟和合作共事的亲密关系，在国际国内都产生了良好的政治和社会影响。中共十五大于9月12日在北京隆重开幕，农工党中央负责人卢嘉锡、方荣欣等应邀参加开幕式。十五大胜利闭幕后，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王兆国受中共中央委托，于9月25日向民主党派、工商联等传达了中共十五大精神。指出中共十五大进一步强调了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一个相当长的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强调要坚持和完善共产党领导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要继续推进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规范化、制度化，使之成为中国共产党团结各界人士的重要渠道；强调要坚持党的民族政策、宗教政策、侨务政策、知识分子政策，强调非公有制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爱组成部分，强调要继续推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王兆国说，我们要认真学习、时刻领会这些重要精神，落实中共十五大对统一战线工作的要求。农工党负责人卢嘉锡和方荣欣、姚峻、章师明、田光涛、宋金升、蒋正华、李蒙参加了会议。这次传达中共十五大精神，对于民主党派认识社会主义事业的长期性和艰巨性，坚持共产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正确认识参政党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正确履行参政党的职责以及进一步推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三、鼓励把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

《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提出了“科技经济一体化”的新概念。就是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技，科技必须面向经济建设。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发展成产业，投入市场，这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是发展科学技术本身的需要，也是国家经济建设和知识分子实现知识增值的主要途径。几年来，农工党鼓励广大党员发挥专长，搞出成果，积极参加推广科学技术，把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活动。这就把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条件下，对广大党员为四化建设服务，做好本职工作的要求，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并且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农工党副主席杨烈宇的科研成果“离子镀厚膜”，用以镀在飞机、发动机等零部件修理中，能使磨损工件得到复原。经由民航局主持的科研成果鉴定，认为这项重大科研成果具有世界领先水平，现已被广泛应用。

农工党副主席阎洪臣研究发明的治疗脊髓空洞症新药“益髓冲剂”，通过成果鉴定4次获奖。随后他将冲剂发展为益髓系列药品，使总疗效提高到95%以上，诊治国内外患者4万多人次。他集资建起了一座标准的医疗科研楼，可收容80名病人住院治疗。这正符合把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要求，又在治疗实践中发展科学技术，也适应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

大连中国医大教授郝文学长期从事毒蛇研究，成功地研制出了治疗血管血俭病的理想药物“蝮蛇抗栓酶”系列，三次获国家和国际科学进步奖和金杯奖。

中科院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研究员江爱栋研制发明的“熔盐籽晶法生长BBO（低温相偏碳酸钡）单晶”获得发明专利奖。

江苏国家建材局苏州混凝土水泥制品研究院第一研究所所长杨长友主攻混凝土真空吸水技术，设计的混凝土V82型气垫薄膜真空吸水装置被列为国家经委的重点新技术推广项目，获全国建筑科技成果优秀项目奖，被公认处于国际先进地位。还有许多专家、技术人员，在科技咨询活动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如通过科研成果搞产品开发，技术转让，帮助克服技术难关，扶持乡镇企业发展生产等等。

第二节 发挥优势开辟为社会服务的新领域

一、开展“国际科学与和平周”活动

科学的发展，推动了社会的进步。但科学也同时被用来破坏和平与人类幸福。人们崇尚科学，热爱和平，希望科学为和平服务。1988年，联大第四十三届大会通过决议，宣布每年11月11日所在周为“国际科学与和平周”。我国举办“国际科学与和平周”活动是以“热爱祖围，热爱科学，热爱和平”为主题，以“弘扬民族精神，振兴科学事业，维护世界和平，推动社会进步”为宗旨的。1993年，农工党充分发挥医卫界的优势，首次作为“国际科学与和平周43个主办单位之一开展活动，并按照“国际科学与和平周”中国组委会的建议，决定扩大范围，号召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组织，积极参加这项活动。

1993年，北京市委会的16名专家在中山公园音乐堂进行医疗保健咨询活动，两天内接待患者三千余人；福建省委会在福州市五一广场举办义诊咨询活动，12名专家为一千五百余名患者服务；青海省委会暨西宁市委会，在西宁市三个区设点，有8个支部的35名医务人员，为1468名患者义诊；广西区委会组织35名医务人员为1430余人义诊；湖南省委会在长沙市中心区举办6个科的35名专家，为八百七十多人义诊咨询；山西省委会组织7名专家，到文水县2天内为八百余人义诊；湖北省委会13名专家，在武昌阅马场为八百多人义诊；天津市委会24名专家，设14个科类为三百多人义诊；上海市委会在海洋411医院举办义诊，9名老中医为263人服务。

1994年，中国“国际科学与和平周”以“科学、和平、友谊、进步”为主题开展大型系列活动。农工党配合这次活动，在北京、山西、内蒙古、辽宁、江西、湖北、广西、贵州、云南、青海、宁夏、新疆共1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所辖县市组织二十多个城市和大寨等农村，共组织五百多名专家和医务人员，为一万二千多人义诊咨询。

1995年，“国际科学与和平周”在全国各地又掀起高潮。农工党作为主办单位之一，在18个省、自治区、宜辖市组织的47个城市，同时举行大型义诊活动，出诊专家、学者、教授及医务人员共825人，接受诊治及咨询的患者22661人。

义诊咨询活动连续五年，为人民群众服务遍及全国，广大医卫界党员积极参加这一活动，表现出了高尚的医德医风，精湛的医术，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为一百多万人义诊咨询，在社会上产生了良好的影响，一般都在地方的电台、电视台和报刊上作了报道。1994年7月农工党在烟台举行全国咨询工作会议。会议受“国际科学与和平周”中国组委会的委托，向1993年积极参与“国际科学与和平周”活动的农工党北京市委会等12个省（区）市组织颁发了荣誉证书。1995年在“国际科学与和平周”中国组委会的表彰大会上，农工党被授予“和平使者”的荣誉称号。

二、为实现人人享有卫生保健做实事

1977年，世界卫生组织提出“2000年人人享有卫生保健”的全球战略目标，1986年我国政府对此做出了庄严承诺。农工党为了协助政府实现这一目标和国务院颁发的《八七扶贫攻坚计划》，从1993年起着手筹建“中国初级卫生保健基金会”。“基金会”是具有法人资格的非营利性的社会福利团体，其宗旨是“取自社会，建立基金，解危救困，造福农民”。1994年6月2日，农工党中央向各地组织发出《关于向“中国初级卫生保健基金会”捐助的通知》，首先在农工党内结合爱国主义教育和学习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开展全党捐资活动。到1995年2月，就有72个地方各级组织捐助人民币295361元。

1996年12月30日，农工党筹办的“中国初级卫生保健基金会”在江泽民、李鹏的亲切关怀下获准成立。卢嘉锡任理事会理事长，方荣欣、姚峻、宋金升任副理事长。1997年2月21日，由卢嘉锡主持举行了“中国初级卫生保健基金会”通报会。应邀参加会议的有解放军总后勤部、国家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国家医药管理局的负责人。3月29日，农工党在中央机关会议厅举行“中国初级卫生保健基金会”第一届理事会，聘请到会的国家卫生部部长陈敏章、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刘延东为基金会顾问。6月20日，“中国初级卫生保健基金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成立大会，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王光英、吴阶平，国务委员彭讽云，卫生部部长陈敏章，统战部副部长刘延东，卫生部副部长张文康、王陇德等到会祝贺。

基金会正式成立以后，广泛联络海内外友好团体和个人，争取道义的、资金的和物质的支持。农工党的各级地方组织，也正协助政府为实现2000年人人享有卫生保健，为解决贫困地区人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而努力工作，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三、以中医药研究促进学术和友谊交流

中国中医药研究促进会，是由农工党中央举办，经民政部批准成立的一个全国性专业性的社团组织。1992午12月14日举行第一次理事会，由农工党中央常务副主席方荣欣任理事长，它的宗旨是：“团结广大中医药界同人，促进祖国传统医药科技的繁荣与发展，立足国内，面向世界，进行国际性中医药学术与人才交流。”

农工党中央创办的“中国中医药研究促进会”和省、自治区、直辖市组织的分会，充分利用自身的优势，荟萃我国传统医药学方面的精华，为“以医会友，以医促贸，以医促通”创造条件，同台湾、香港、澳门以及海外的中医药界同人举行交流与联谊活动。福建、广东两省组织分别成立分会时，台湾、香港、澳门和新加坡的中医药界专家学者都应邀前来祝贺，有的还受聘为分会的理务，有的则牵线搭桥，介绍台胞前来治病。

北京市委会的“中医药研究促进会”分会成立后，接受新加坡中医师公会的邀请，由著名中医专家刘渡舟、祝湛予、贺普仁、李赓韶组成代表团，到新加坡进行学术访问。他们在新加坡作了学术报告，同当地中医药专家学者进行了学术交流，参加了临床指导工作等活动。以祖国的传统医药学为纽带，宣扬了中国的民族文化，结下了相互之间的友谊。

1994年12月16日，北京主办了“首届海峡两岸中医肾病医疗与保健学术研讨会。”参加开幕式的有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王光英、全国政协副主席万国权、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万绍芬、海协会常务副会长唐树备、北京市副市长何鲁丽、全国青联、侨联、国家医药管理局、台盟中央以及天津市人大、政协的负责人。会议由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副局长、“中国中医药研究促进会”副理事长于生龙主持，国际中医肾病会议主席、“中国中医药研究促进会”副理书长张大宁致开幕词，农工党常务副主席、“中国中医药研究促进会”理事长方荣欣在会上讲话。到会的有海峡两岸从事肾病医疗与保健的专家学者百余人，其中台湾代表31人，还有来自港澳、美国和日本的代表。共收到论文176篇。此次会议的协办单位有张大宁传统医学基金会、台湾制药工业同业公会、台湾中药制药工业同业公会。会议开得很成功，架起了海峡两岸中医药交流的桥梁，为两岸的交往开辟了一条通道，为联络海内外同人振兴祖国传统医药做出了贡献，对促进祖国和平统一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1995年9月上旬，“中国中医药研究促进会”福建分会举办第三次海峡两岸中医药学术交流会，来自台湾、香港、新加坡的中医药团体代表和14位中医药专家与大陆同行济济一堂，对祖国的传统医药进行了学术上的探讨与交流。台湾中国医药学院教授陈钦铭代表应邀参加会议的同人在会议闭幕式上致贺词，祝贺会议开得圆满成功。

第三节 自身建设常抓不懈

一、学习基本理论加强思想建设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农工党认识到在新的形势下进一步加强思想建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1992年全党在学习邓小平南巡谈话之后，各级组织都受到很大鼓舞与启发，认为邓小平南巡谈话是指引全国人艮加快改革加快发展的行动纲领，产生了学习基本理论（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紧迫感。1993年5月，农工党中央到上海、江苏、福建、江西等省市进行调查，认识到思想宣传工作，必须坚持以邓小平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根本指针，号召全党开展爱国主义教育，认真学习《邓小平文选》。12月，农工党召开十一届二中全会。全会认真学习讨论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一致表示完全赞成和坚决拥护。并做出决议，要求努力学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为实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二步战略目标做出新贡献。

1994年9月，农工党在宜昌举行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会议交流了思想教育、党刊、社会宣传和理论学习等方面的经验，提出用三年时间在全体党员中广泛开展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学习活动，重点是学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12月农工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决议》又重申：“全党要把思想建设放在首位，认真学习《邓小平文选》，掌握理论，联系实际，进一步坚定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提高执行“‘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的自觉性”。并向全党发出《通知》，强调“认真组织党员学好《邓小平文选》，是我党思想建设的根本任务”。各级组织积极响应中央号召，各自采取有效措施，制订实施计划，分层分批地开展了以学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为重点的基本理论学习活动。中央机关多次举办了脱产学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读书班，各省（区）市组织举亦了各种形式的学习班或培训班。这次学习活动，由于是在中共十四届四中全会决定开展一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学习的带动下开展起来的，农工党各级组织的领导重视，措施得力，所取得的阶段性成绩是比较显著的。1995年12月农工党十一届四中全会上，根据各地组织的评选推荐，做出了《关于表彰学习基本理论有突出成绩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的决定》，表彰了包括中央机关、4个省委会、14个省辖市委会（含演达医科大学）和14个支部（包括部分总支）在内的33个先进集体，27名先进个人。这是对学习先进分子的一次鼓励，也是对进一步深入学习的一次动员。

通过学习基本理论，广大党员思想认识大有提高，出现了许多的好人好事，还出现了知识分子见义勇为，勇斗歹徒的动人事迹。 1994年5月6日，北京《市场报》特约记者聂振强，晚11点多钟经蓟门桥北土城时见干警车金鼎被歹徒残暴殴打，聂振强挺身而出，奋不顾身地制服凶手，在出租车司机帮助下把凶手送到附近派出所，把干警车金鼎送往医院。聂振强见义勇为、维护社会治安的行为，受到农工党北京市委会的表彰，受到“中华见义勇为基金会”的奖励。 11月20日，山东泰安医学院教授刘来村在从深圳返广州的汽车土，见歹徒手持刀枪抢劫车上乘客，他为保护乘客安全，跃起与歹徒搏斗，擒获了歹徒，自己也身负重伤。农工党中央表彰了他的英雄行为和高尚品德，并通报全党号召党员向刘来村教授学习。

一、为建设跨世纪后备干部队伍而努力

在新的历史时期，农工党的组织发展很快，吸收了大量的高中级知识分子，增强了党的活力。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80年代的骨干，一般又已届退休之年，如果不抓紧抓实后备干部队伍的建设，在干部问题上势必面临青黄不接的局面。所以，农工党建设跨世纪的后备干部队伍，是一个既要着手于现实又要放眼于未来的大问题。农工党在1994年3月十一届中常会第四次会议上，就做了《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关于加强组织建设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了“加强后备干部队伍建设”。为了切实贯彻《决定》 的精神，4月上旬在宁波举行了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会议对于落实组织建设的各项任务，起了推动的作用。

1995年7月4日至7日，农工党十一届中常会第八次会议通过了《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加强后备干部队伍建设的决定》，提出“选拔培养后备干部队伍，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组织建设的头等重要工作”。 11月12日至16日，农工党在北京召开后备干部队伍建设工作研讨会，副主席兼组织部长章师明在会上作了报告，指出了加强后备干部队伍建设的意义、指导思想、要求和做法。会后各地组织非常重视，召开常委会议传达中央会议精神，准备贯彻落实。

1996年4月14日至16口，农工党十一届中常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了《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委员会关于中央和省级组织换届工作的决定》，把后备干部队伍建设同组织建设、领导班子建设结合在一起，进一步突出了后备干部队伍建设的重要性。7月13日至18日，农工觉为贯彻落实《关于中央和省级组织换届工作的决定》，在张家界举行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为1997年各级组织的换届做准备。副主席兼组织部长章师明在会上做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围绕中心，服从大局，加强组织建设，为实现我国跨世纪宏伟蓝图而奋斗》的报告。8月22口，农工党中央举行主席（扩大）会议，学习讨论江泽民总书记关于讲政治的一系列重要讲话。会上一致认为，“民主党派也必须讲政治。讲政治是我党切实加强自身建设的需要。当前要抓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要精心做好1997年的换届工作。这次换届，是我党一次重要的、关键的历史性换届，是自身建设重中之重的工作。要真正搞好组织上的交替，政治上的交接，已成为一项十分艰巨而又刻不容缓的任务。”

几年来，农工党在组织建设中，实际已结合1997年的换届，不断地进行了后备干部队伍的培养与选拔工作，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就中央领导机构而言，在1993年12月的十一届二中全会上，递补了中央委员2人；1994年12月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增选了中央委员4人，补选中央常委1人；1995年12月的十一届四中全会上，递补了中央委员1人，补选中央候补委员3人，增选中央委员4人，中央常委3人，补选李蒙为中央副主席；1996年12月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增选中央常委7人，中央委员10人，中央候补委员3人。许多地方组织在换届之前，也都按照中央文件规定精神，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和工作需要对领导班子和工作班子成员做了适当调整与增补，引进了新人。

后备干部队伍建设，是农工党组织建设中一项经常性的长期性的战略任务，并已经重枧和着手开展了这方面的工作，取得了初步的成效。

三、基层组织出现崭新面貌

1992年农工党十一大以后，从中央到基层各级组织都进行了换届。十一大提出的新的组织发展方针，坚持吸收党员须注重素质，德才兼备、稳定发展，切实贯彻巩固与发展相结合的方针，保证组织建设健康顺利地进展。地方各级组织都认真贯彻了中央的方针，吸收党员做到成熟一个，发展一个，成熟一批，发展一批，以1993年为例， 新党员增长率为2.33%o许多地方组织的负责干部和专职干部，都坚持了“分片包干，联系基层”的制度，推广了“选好基层领导班子，搞好基层同中共基层的关系，抓好围绕中心开展基层活动”的经验，加之广大党员在改革开放的大环境中不断增长的参政议政的积极性和责任感，基层组织普遍呈现出一个崭新的面貌，陆续涌现出了一批政治理论学习的先进集体和为两个文明建设服务的先进集体。

浙江省肿瘤医院支部把组织生活与科研活动、社会活动相结合，搞社会调查，以“民众抗癌意识调查研究”为课题，搞出的科研成果经鉴定被认为“设计周密，材料充分，结论可信”，达到了国内先进水平。河南省新乡市中医院支部通过“争当学术带头人活动”，开展医疗咨询服务和社会调查活动，为经济建设做出了一定的贡献。湖南省双峰县总支部充分发挥自身的政治优势，积极参政议政，建言献策，为全县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傲出了显著的成绩，还利用医卫方面的优势，组织党员到边远乡镇进行义诊，受益群众达五千多人。北京市冶金总支部坚持把学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放在组织生活的首位，各个支部都组织党员在本单位为经济创收，疏导关系、化解矛盾等做了许多细致的工作，得到中共支部的好评。湖北省黄冈支部利用党员的有利条件，重视“三胞”联谊活动，做了许多“牵线搭桥”的工作，由于他们的努力，台湾的政论作家欧阳一、青年企业家孙国河专程从台湾来到大别山革命老区，为罗田县、红安县两所希望小学的80名优秀学生颁发奖学金。江苏省中国药科大学支部利用党员从事中西药教学与科研的群体智慧优势，向江苏省科委申报了“中西结合研创开发新药的对策”的科研新课题。在得到批准并获得阶段性成果后，于1993年11月在深圳召开厂由国家医药管理局、中国药科大学、农工党江苏省委会和广东省委会联合主办的“全国中西药结合研制开发新药的对策研讨会”，来自各省市和台湾、香港的医药专家和企业界代表100多人出席了研讨会，取得了圆满的效果。《中国医药报》在头版报道说：“这次研讨会为政府的决策提供了有益的意见和建议，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四、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1997年，我国社会主义事业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社会主义在我国显示出了蓬勃生机和活力；中共十五大的召开，确立了把邓小平理论作为指导思想，对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跨世纪的发展提出了奋斗日标。农工党为了学习贯彻中共十五大精神，总结十一大以来的实践经验，确定今后一个时期的政治任务，修改党的章程，选举产生跨世纪的新一届领导机构，动员全党围绕中共十五大提出的战略目标，全面推进自己的工作，于10月27日至11月1日，在北京召开了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有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各地选出的和特邀的代表丁传贤、王好明、周正、陈浪等617人。大会由卢嘉锡主持开幕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罗干代表中共中央向大会致贺词，对农工党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并提出了殷切的期望，全体代表深受鼓舞和激励。民盟中央主席丁石孙代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向大会致贺词，表达了兄弟党派的深厚友谊和热情支持。全国人大、全国政协、中共中央统战部领导人王丙乾、王兆国、钱正英以及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出席了开幕式。

在会上，卢嘉锡代表农工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作了《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认真履行参政党职能，为实现跨世纪宏伟目标贡献力量》的工作报告。大会审议通过了卢嘉锡的工作报告、经过修订的农工党章程和十二大《决议》。《决议》号召农工党全党紧密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切实贯彻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基本方针，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加强自身建设，认真履行参政党职能，为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为振兴中华、统一祖国而努力奋斗。大会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领导机构中央委员会，王树芳等188人当选为中央委员。一致推举卢嘉锡为农工党名誉主席；大会还通过了给不再担任农工党领导职务的老同志的致敬信。在10月31日举行的十二届一中全会上，选举蒋正华为中央主席；姚峻、章师明，陈灏珠、阎洪臣、宋金升、李蒙、朱兆良、陈建生、陈宗兴、张大宁为副主席；陆道培、王传琛等41人为常委；于生龙被任命为中央秘书长；推举方荣欣、田光涛、翦天聪、郭秀仪为名誉副主席；由于不再设咨监委员会，还推举了5位顾问。

农工党这次代表大会是具有深远意义的跨世纪大会。大会在中共中央的亲切关怀和有关方面的大力支持下，开得圆满成功。大会的鲜明特点，首先是代表们通过学习中共十五大精神，对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的重大意义加深了理解。深切领悟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实现民族振兴、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行动指南。农工党的工作也只有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才能跟上时代的步伐不断前进，才能在国家的政治生活和经济建设中很好地发挥作用；二是在修改的党章中确定了“本党在邓小平理论指引下”的政治原则，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定”的基本方针等重要条款写进了党的章程，表明了农工党坚持正确政治方向的决心和立场；三是一大批德才兼备、年富力强的同志进入了跨世纪的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稳步推进了领导班子的新老合作交替和政治交接，这届领导班子的平均年龄有所下降，群体结构进一步调整，体现了农工党朝气蓬勃的活力。